

2013 年第 2 期

		责任编辑：	编辑部主任：	副主编：	特约编审：	主 编：	副总编：	总 编：	
	杨 赟	李业 潘庆磊 吉强	魏方	陈思 魏方	贾梦玮	彭慧	唐旭明 黎玉林 彭慧	周和平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增刊

主管主办：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

江苏中华文化学院

编辑出版：《雅集》编辑部

地址：南京市苜蓿园大街 51 号

邮编：210007

网址：<http://www.jssy.org.cn>

电子邮箱：yajis@163.com

电话：025-84287248

传真：025-84287242

封面题字：徐邦达

装帧设计：朱赢椿

杨杰芳

印刷：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刊号：ISSN 1672-3163
CN 32—1559/C

出版日期：2013 年 5 月

定价：18.00 元

C O N T E N T S

本刊特稿

收藏：文化传承的重要形式——宋玉麟先生访谈 / 沙 洲 / 001

人物春秋

多情“人瑞”周有光 / 张 跃 / 015

曾氏兄妹 / 叶兆言 / 021

罗振玉淮安遗事片断 / 陈鸿祥 / 025

艺术人生

我画《水浒》 / 周京新 / 030

寂寞修正果 妙手绘众生——“刘振夏现象”解读 / 强亦忠 / 035

历史遗韵

南京：两座洋楼的延续 / 贾梦玮 / 042

物铸藏史——从文物看西藏与内地的密切关系 / 殷志强 / 049

文苑纪事

十年浩劫中名家珍藏的“劫中劫” / 徐 雁 / 057

钱钟书“文革”轶事 / 徐兆淮 / 063

城市文脉

台城悲歌 / 诸荣会 / 069

何处病梅馆 / 陈 益 / 076

苏州的端午龙舟 / 陶文瑜 / 079

读书岁月

读书旧记四则 / 顾 农 / 084

《闲话扬州》的闲话 / 丁 帆 / 088

乡村记忆

红豆树下 / 邬丽雅 / 090

水生食物四题 / 刘仁前 / 095

西渚的果 / 徐 风 / 099

文化论坛

文学、启蒙与图书馆阅读推广 / 赵普光 / 102

五行试读 / 张正海 / 108

海外传真

一哥面 / 谢 舒 / 115

两岸三地

你一定要读香港 / 刘鲁会 / 120

拜访周勋初先生——关于《雅集》之六 / 周和平 / 126

收藏：文化传承的重要形式

——宋玉麟先生访谈

采访：沙洲

编者按语：

宋文治先生是新金陵画派的一代大师，同时，他又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大收藏家。宋玉麟先生作为宋文治先生的长子，他继承父辈的不仅是高蹈的画艺，还有收藏的爱好。他是名符其实的“画二代”、“藏二代”。这种对文化的相续守望精神，令人向往。

玉麟先生的这篇访问记，娓娓道来，引人入胜。他的回忆，打开了时代的闸门，让我们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穿越，许多耳熟能详的名字，一个个如雷贯耳的人物，来到了我们的面前；一件件收藏故事重新出现，不但有趣，更让我们想成为其中的一个角色，置身其中的一个场景。这么多的细节，有的甚至有些琐细，但我们仍然觉得弥足珍贵，因为亲历而真实，因为真实而珍贵，感谢玉麟先生让这一切复原了。

虽然动人，但这是过去的故事，然而正是这些过去的故事，还能让我们见识中国文化的魅力，知道我们也曾产生过许多美好故事，而不是只看到现在那些真假难辨的所谓神话。

我们愿收藏这一高雅的文化活动，能够向真向善向美，能够为我们民族为历史留下珍贵的印记，并因此产生出更多的艺术家、收藏家、鉴赏家。

父亲是一个有艺术天赋的人，这种天赋遇到合适的氛围就被激发出来了

《雅集》（以下简称“雅”）：您在《娄江宋文治——忆我的父亲》一书中，讲到宋老有三大癖好：戏曲、美食和收藏，他是怎么走上收藏这条路的？

宋玉麟（以下简称“宋”）：我感觉在艺术家特别是大艺术家身上，天才肯定是存在的，当然后天的勤奋也很重要，但是前提肯定是必须要有这种天赋。

前几天我到省美术馆去看陈丹青、林建东、韩辛的展览，感触很深。当年他们都是十几岁、二十岁不到的一批青年学子，画的东西真是精彩。但是他们当时没有接受过正规训练，凭着对艺术、对绘画的一

种热爱，和自己对艺术的感觉和理解，不停地去画，去追求，去表现，真是无师自通。现在来看，恰恰是这批东西，是最感动人的。

我父亲热爱收藏，我认为也是一种天赋，也是与生俱来的，因为我们祖上也没有人干艺术这个事儿。当然任何天赋的激发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太仓这个地方文化氛围非常浓厚，使他从小就得到文化的滋养。他和当地的文人墨客很是亲近，参加他们组织的“同期”活动，就是每逢星期天或者假期，大家轮流做东，一起欣赏收藏，唱唱昆曲，品尝主妇烹饪的美食。今天来看，就是乡间的文化活动，是一种雅集。父亲热爱艺术的天赋，遇到合适的氛围就被激发出来了。

1942年，24岁的父亲到上海去拜访著名画家朱

杞瞻先生。朱杞瞻当时已经 51 岁了，是个大收藏家，他对这个小同乡很是欣赏，拿出了徐青藤、石涛、金冬心等的作品给父亲看，让他大开了眼界。先生还以青藤笔意作了两幅水墨花卉送给父亲，以后，父亲就成为了先生梅花草堂的常客。先生还介绍父亲去跟张石园先生学画。

1948 年，父亲在上海安亭师范当老师，一次学校组织活动时，在南翔古漪园见到了陆俨少的字画，大为钦佩，就“三顾茅庐”，一定要认识他。当时我父亲不到 30 岁，陆俨少比他大 10 岁，也就三十几岁。当我父亲第一次看到陆俨少作品的时候，就认为他是自己一生中最崇拜的国画家。此时陆俨少还默默无闻，但我父亲当年就晓得他好，这就说明他的眼光、他的艺术品位和他的鉴赏能力，都是很高的。我认为这是文化知识累积的结果，和收藏有很大的关系。

陆俨少自己并不收藏，但是，陆俨少介绍我父亲去拜大收藏家吴湖帆为师。在上海美术界，收藏之风是非常之甚的，包括唐云、程十发，都是大收藏家，谢稚柳，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都是了不起的大收藏家。就是上海一个普通的画家，他拿点藏的东西出来，说不定都蛮好的。在老一辈中，上海的收藏风气要比

我们这儿盛得多。南京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像上海一样的收藏氛围，当今南京美术界中喜欢收藏的并不多。

父亲的艺术天赋还反映在各个方面。他是一个很有造诣的票友，李瑞环主席曾对我说过，你父亲真懂戏。父亲对美食更是有研究，连钓鱼台国宾馆、北京饭店、金陵饭店等大饭店的特级厨师也要向他请教。

父亲收藏山水画的标杆就是陆俨少

雅：宋老收藏有些什么特点？

宋：纵观父亲几十年的收藏，一是他喜欢扇面、册页、手卷等小品，开始收藏的时候，大的东西买不起，但更主要的是父亲认为画不在大小，在于精，而小的容易精。二是父亲收藏的大部分都是花鸟（画）。比如齐白石，他的山水父亲没有的。谢稚柳、陈佩秋，他收藏的基本上也是他们的花鸟画，其实谢稚柳山水画得很好的。他收藏来楚生、唐云、程十发的作品，基本上也以人物和花鸟为主。还有南方的关山月，就是梅花。我们江苏，他收藏傅抱石一张人物册页，钱松喙的是菊花螃蟹，还有乌龟……



陆俨少《蕉阴雅集图》1963 年

父亲收藏山水（画）最多的就是陆俨少。他自己是一个山水画家，在收藏山水画的时候，肯定是一个标杆的。现在非常清楚，在他心中，这个标杆就是陆俨少。这不是说其他人的山水画不好，只是他自己喜欢，山水画能够进入他收藏范围的主要就是陆俨少。另外还有李可染的山水，他很喜欢，但是只收了两张小山水。傅抱石的山水他也喜欢，但没有条件收藏到。

今年4月16号，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办了松石斋藏陆俨少书画精品展，展品主要是我父亲从1950年开始，数十年收藏的陆俨少作品。这是能够代表陆老整个创作最高水平的一个展览。展品大部分都是陆老画给他的，还有一小部分是我父亲购藏的，也包含了我购藏的十多件作品。陆老1993年去世，展览跨度从1950年到1988年。

这次展览，共有一百一十几件作品展出。展览目的，就是弘扬和研究陆老的艺术，研究画家之间的关系和交往对艺术的重要性。从我个人来讲，就是要还陆老一个心愿。因为陆老生前，那是1987年，他本来有计划到美国去搞一次展览，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展览没有成行。当初筹办展览的时候，他准备

向我父亲借其中的五件作品到美国去展出，他点的五件作品是他最满意的，包括三个手卷，两本册页。后来展览没有搞成，因此陆老的这些作品，除了在刊物上零星发表之外，原作从来没有整体公开向观众展示过。我们后人有这个责任把它呈现给观众，让观众去欣赏，让专家去研究，让大家对陆老有一种更高、更新的认识，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雅：您刚才提到陆俨少的三个手卷，能介绍一下吗？

宋：这三个手卷分别是：《松隐图卷》、《荫山阁看云图》和《蕉阴雅集图》。

《松隐图卷》画于1950年，是在父亲和陆俨少先生认识不久后画的。先生以父亲当时的画斋“松隐庐”而命名，上面陆俨少题诗第一句就是：与子永为好，画图写此心。手卷引首为吴湖帆先生所题，卷末还有沈尹默、叶恭绰等题跋，因为这是和陆先生的订交之物，所以父亲非常珍爱。

《蕉阴雅集图》是父亲1963年将去四川写生前，写信向陆俨少先生请教芭蕉画法，陆先生就寄赠了此卷，1980年，父亲又请陆老补画了一段，合成对卷。所以这个手卷前后经过了十七年才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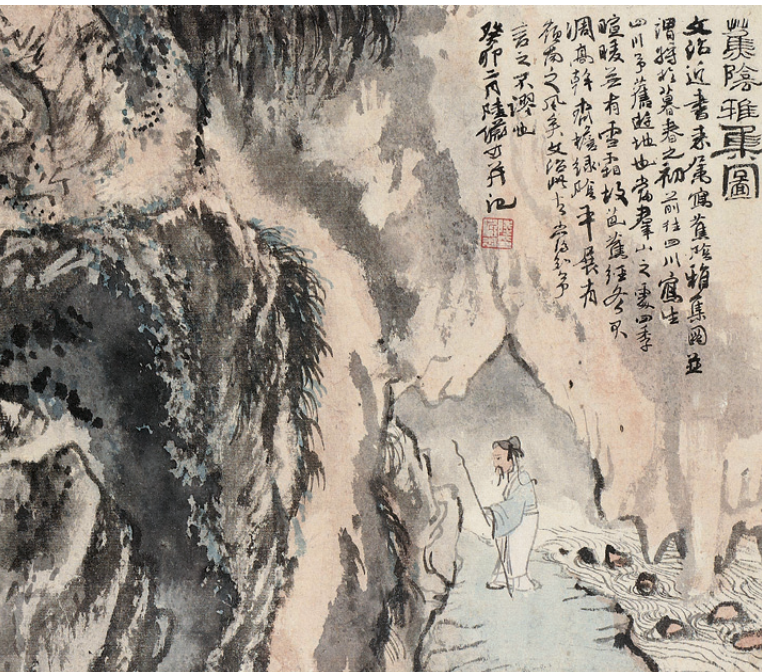
《荫山阁看云图》作于1965年，缘起于潘天寿先生送了一幅《荫山阁看云诗》书法给父亲，父亲请陆俨少先生作画相配，特别令人称奇的是，这幅画中还出现了潘天寿先生的形象，十分传神。

父亲对这三个手卷，喜欢得不得了，真是一刻不能离开啊，到哪儿都带着。有机会的时候就叫名家题跋，所以上面题跋很多。要好的朋友来家里了，就会拿出来一起欣赏。

父亲的收藏最初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后来拓展到了北方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是许麟庐

雅：宋老的收藏有个从南向北的过程吧？

宋：父亲从青少年时期，一直到进国画院之前，活动基本是以上海为中心。到南京工作以后，他的创



作中心在南京，但是他的收藏中心还是在上海。

在上海画家中，除了收藏陆俨少的作品最多以外，朱屺瞻的量也不少，还有谢稚柳、程十发、唐云、陈佩秋等等。父亲也很喜欢来楚生的画，经常用自己的画去交换，有一次用自己四尺整纸的山水交换了来先生的一张水墨《睡鸭》扇面。

在北京，父亲关系最密切的就是许麟庐先生。大概六十年代初，许麟庐开了一个“和平画店”，父亲的作品在里面出售。我姐姐1961年考上北京中国科技大学，她每年的生活费都是到许老那里去拿的。许老本身是一个很著名的画家，是齐白石的关门弟子。许老的画，我父亲拿得最多，每次到北京没有不拿的，拿回来经常送给朋友和学生。许老人非常豪爽，他的作品有人去问他要的话，他很乐意给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一次我在北京到许老家去，看到他画室墙上挂了一张民间玩具的作品，很新奇，我说许伯伯这张画我非常喜欢，能不能帮我画一张。他说拿下来，你拿去！这张画我一直挂在我画室里，天天可以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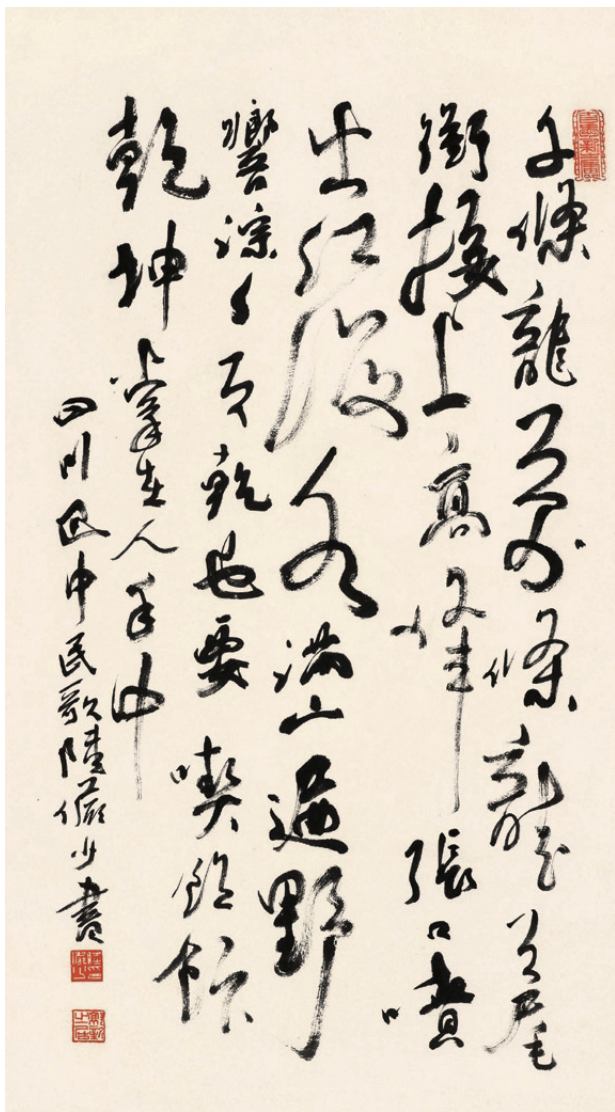
父亲一生痴迷齐白石，他甚至愿意拿八大山人去换齐白石

雅：宋老对齐白石也是特别喜欢的？

宋：他一直喜欢齐白石，在家乡的时候就喜欢。他最早收藏的两张画，其中就有一张是齐白石的扇面。

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时候，南京十竹斋有位老先生叫陈新民，他专门学齐白石，对齐白石也是特别有研究，经常会在门店里挂一些齐白石出来。有一次他收到了齐白石一张大的紫鸢花，不但大，画得也非常好。

父亲很喜欢，就拿回来。当时齐白石价格也是很高的，一下子要拿这么多钱不容易。我记得很清楚，这张画要拿的时候，家里很困难，我姐姐在念大学，一家七口人，就靠父亲、母亲两个人的工资。而且江苏当年采取了一个政策，就是画家所得稿费包括卖画的收入全部要上交给单位，就是“割资本主义尾巴”



陆俨少 书法《巴中民歌》1960年代

啦！由于经济困顿，父亲曾把他收藏的一批扇面，以民国的为主，有几十张，通过他一个叫吴云发的学生，由南京师范学院把这批作品收购了。当时父亲把这张齐白石也拿过去，准备给他们一起收购。那张齐白石我印象中大概七八十块钱，其他几十张小扇面一共才百把块钱吧。不久，老爷子叫我到南师去拿钱，找到吴云发以后，他说，小宋啊，扇面的钱我拿好了，那张齐白石给吕斯百拿到家里看去了，他可能想要。吴老师带我跑到吕先生家去了。

至今我记得很清楚，吕先生躺在一个晃荡晃荡摇的椅子上面，摇啊摇啊在看那张画。吴云发进去后



许麟庐《民间玩具》1970年代



齐白石《大公鸡》1937年

说，吕先生，宋文治儿子来了，齐白石这张画怎么说，到底是要还是不要？不要的话，就把画还给人家。当时吕斯百说，噢，拿走拿走。就这样，这张画兜了一圈又拿回来了，最后买不起还给了十竹斋。

雅：宋老比较多收藏齐白石是在什么时候？

宋：“文革”以后，那时候老爷子有稿酬了。他的大部分稿酬都放在荣宝斋，看到荣宝斋有好画，他就买回来，齐白石当然是他收藏的一个重点。包括宝古斋，也就是北京文物商店，知道父亲喜欢齐白石，也经常给他留着。应该说收藏齐白石主要是在“文革”以后。

七十年代后期还发生过一件事情，老爷子在荣宝斋买了几件东西，其中有一张齐白石，一张关良，好像还有一张关山月，然后就放在荣宝斋重新揭裱。可是后来这三张画不见了，找不到了，那个接货的裱画师傅急得团团转，领导也头疼，这可是件大事。后来老爷子表了一个态，这几张画我也不要你们赔，但是你们要批准我花钱补买三张齐白石。那时候，在内柜买东西是要总经理签字批准的，领导一听，马上同意。后来父亲就买了三张齐白石回来。当时齐白石应该是在两三百块钱一尺。

雅：听说宋老曾经拿了“八大”的东西去换齐

白石，那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宋：那是在“四人帮”刚粉碎不久。父亲在北京花了300块钱，买到一张八大山人的册页，画的是一条鱼。可是这张画当时大家有点争议，父亲也吃不准。巧的是当时父亲和唐云都住在钓鱼台国宾馆，唐云收藏“八大”，而且很有研究，父亲就把画请他去看。第二天一早唐老把画还给了父亲，说是真的，我还给你题了边跋，父亲高兴得不得了。回到南京以后，父亲一直讲唐老人好，讲真话。当时父亲正在收藏齐白石的扇面，他知道唐老喜欢“八大”，家中也收藏齐白石，就专程到上海用这张“八大”和唐老换了两张齐白石的扇面，凑成了一部齐白石扇册。

我第一张收藏的画是费新我画的《鲈鱼图》

雅：下面就讲您的收藏，您开始收藏大概是哪一年？

宋：我从小在农村长大，什么叫收藏？什么叫书画？什么都不懂。1961年我转学到了南京以后，与父亲生活在一起。当时画院在总统府里面，我家就在旁边的东箭道，我们家和钱（松喆）老、丁士青家是隔壁邻居，在那里我们住了22年。

我小时候会有机会参与画院的一些艺术活动，比如他们在西花园搞笔会，就把我们小朋友喊去磨墨、拉纸，当时非常热闹，现在想想蛮有意思的。老先生来了，傅小石就躲在边上给他们画速写。经常组织他们活动的是李进，当时的省文联主席，大家都喊他李主席。傅抱石有时候也来，钱（松喆）老经常参加。

那时候画院来来往往和父亲交往的人，都是艺术圈的，谈的都是艺术，看到他们其乐融融的样子，我听也听不懂，什么也不知道，感觉到一种强烈的饥渴感，激发了对书画的兴趣。想画画，觉得这是最开心的事情，一下子兴趣就来了。

收藏呢，那个时候当然不会有意识去收藏，因为还是小孩子嘛。如果要算的话，我收藏的第一张画是费新我先生的，当时我还在念中学，大约（19）

64、65年样子。费老这样的画家，平时住在苏州，每年有几个月到画院来创作，所以画院那里有几间房子空着，留给他们来南京的时候住，相当于客房一样的。他们画画，我就在边上看，一次，费老给我画了两条鱼，题为《鲈鱼图》，他非常得意，拿到隔壁丁士青房间，丁士青说题《鲈鱼图》没有诗情画意，应该叫“网得鲈鱼供晚餐”，费老说好好好，后来就用另外一张纸条重新题名，盖好图章，叫我裱的时候把它换一下子。那是我第一次收藏老先生给我的画。

我在上海读大学的时候，经常会到朱（屺瞻）老家去，他家离我学校很近，就几分钟路程。去了以后就在那里看他画，有时他会送给我，回到学校就给同学拿走。实际上当年他画给我的是很多的，但我送掉的也最多，但有一张我留了下来。那是在1972年12月29号，第二天我就要离开上海分配回南京工作了，到朱老那里去辞行的时候，他给我画了一张山水作为纪念，我一直珍藏着。

雅：当时将书画送人是很随意的事吧？

宋：对，范曾有张画在我手上五分钟就送人了。那是1976年1月份，我还在省歌舞团搞舞美，正好全国舞蹈单项调演，我们住在北京西苑宾馆。我去北京前，父亲说范曾问他要幅画，这次你去带张画给他。到了北京以后，我就打了个电话给范曾。当时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是骑着自行车来拿的。我就说，范老师，你方便的时候也给我搨两笔，他说好好好，就走了。过了几天，参加汇演的云南代表团有一个也是搞舞美的人，他同范曾认识，到他家里去玩，范曾就画了一张画，叫他带给我。我拿到这张画一看，画的是一棵榕树，一个少数民族女孩子背着身子立在树下，题款是小宋同志留念什么的。我说这张画人又小脸也看不到，只看到一个背影，口气里似乎不太喜欢。边上一个同事听到了，说你不喜欢就给我，我说那你拿去，在我手上几分钟，就没了。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朋友喜欢，随手就给。现在看就是共享吧，艺术共享。



朱屹瞻 山水 1972年

我真正开始收藏是裁点小纸头，一张一张请老先生画，最后集成了一本册页

雅：您真正的收藏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宋：我真正的收藏还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始时，裁点小纸头，利用我认识这些老先生的条件，请他们揭张把小画，像钱老、亚老的画就是这样来的。还有的就是朋友托朋友，带到外地请些画家画张把册页什么的，就这样有意识地开始收藏，一张一张地积起来。

后来，我把这些画裱成了一本册页，里面包括吴作人、李可染、朱屹瞻、钱松喦、陆俨少、程十发、叶浅予等等。我在册页前后裱了两张空白，封面有个签条。我认识的省某医院老院长李茂元跟林老关系极好，有次他主动说，玉麟啊，你有什么东西要林老弄的，我帮你去搞。我说好啊，你请林老给我藏画册题个签，然后我把这本册页交给了他。

过了几天，李院长把这本册页带过来。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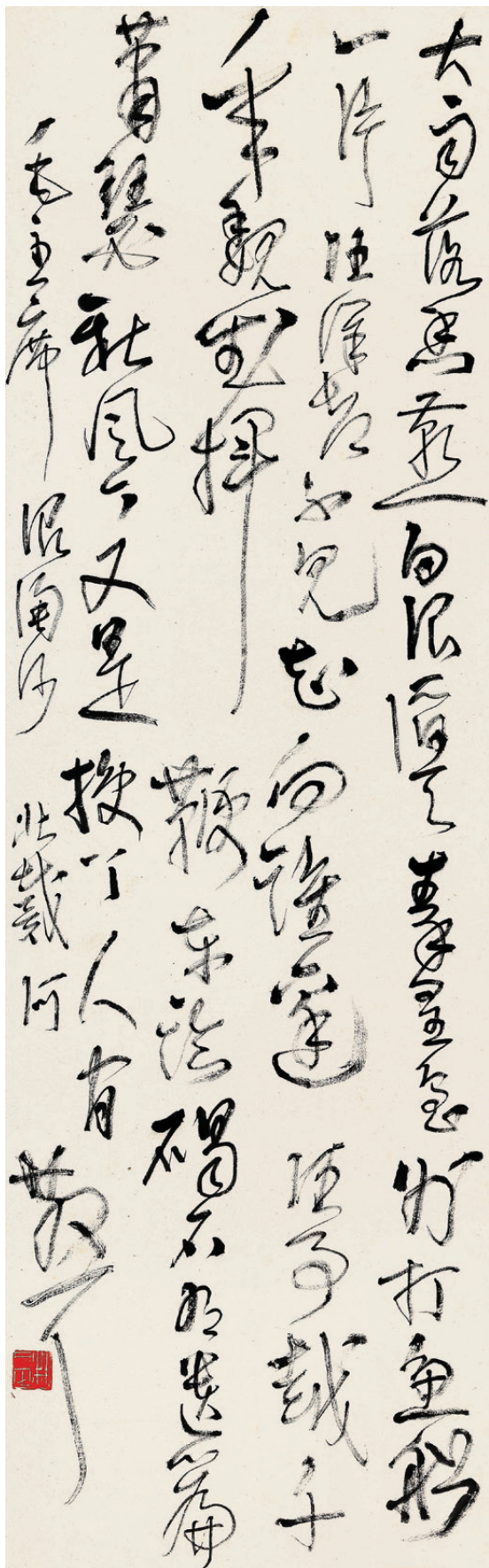
林老讲签就不题了，给你里面写了张字，画了张画，把两张空白全部干掉了。我真是喜出望外。最后这部册页的题签，还是陆俨少先生1978年来南京的时候题的，就“玉麟藏画”四个字，很明了。如果讲收藏呢，真正收藏就是从这本册页开始的。

收藏林散之出于偶然，但当我认识到他是一个多少年才能出的大书法家后，开始了比较系统的收藏

雅：您有意识地收藏林散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宋：1979年我调入画院以后，感觉到需要补课、提高的东西太多了，所以精力更多的是放在艺术创作上，出去写生，参加一些展览活动等等。1984年我担任副院长以后，又负责基建盖房子，忙得很，也想不到收藏这个事情。

1989年12月，林老刚去世没几天。我有个好朋友，他说安徽当涂有个收藏家，手上有不少东西，他



林散之 书法《毛主席〈浪淘沙·北戴河〉》1960年代

要去买，让我陪他去，帮他掌掌眼。

到了当涂，朋友买了一张谢稚柳的牡丹花。这人家里有两张林散之，一张四尺三开挂在墙上，一张卷起来的，没拓也没裱。我问他林老的东西卖不卖，要多少钱？他说裱好的这张不卖的，那张卷起来的可以给你，是一张条幅，写的是杜甫的《秋兴八首》，当时他要650块，我还价600块，他不肯。我那朋友就说了，你卖吧，他是宋玉麟，宋院长。他说，你是宋院长啊，好好好，我给你。东西买了，我们以后也成为朋友了。

从当涂回来，我开始关注林老的东西，并且作了一些研究，我觉得林老是当之无愧的当代“草圣”，在5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没有书法家的艺术成就能超过他。当时收藏的条件比较好，第一是他的东西不算很贵，那时千把元就能买到他的非常精彩的手卷，一般的也就是几百块钱一幅。第二是量比较多，林老刚去世时，社会上他的书法很多，他的画也不少。人家知道我喜欢以后，每个星期少说有几十件东西送到我家来，你就可以尽情地挑。那时候这种机遇给了你，就是看能不能抓住。

应该说，我抓住机遇，收了林老的一些精品。不久，我忽然意识到，林老的画也是相当不错的，那时他的画已经开始贵了，要一万块钱左右一尺。这样赶了一个末班车，买了他十来张画，基本上把林老的一个系列收得比较完整了。

在和李可染比较以后，我发现钱松喦作品的价值被低估了

宋：后来，收林老东西的人越来越多了，作品也开始贵了。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钱（松喦）老价格一直上不去，就开始关注钱松喦。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国画界有“南钱北李”的说法，荣宝斋给他们两人的润笔费也是最高的，千把元一尺。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两人在市场上的差距就拉得非常大了，我觉得钱老作品的价



钱松岳《常熟田》1965年



宋文治《山川巨变》1960年

值被严重地低估了。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扬子晚报》上，对这个现象进行了一些分析，主要还是充分肯定钱老的学术地位，分析他作品的价值，也包括对他今后市场的前瞻。可能由于我的持论比较公正，这篇文章客观上推动了钱老作品的市场表现。

我非常幸运的是收到了钱老的一些代表作，收藏他的那张《常熟田》还有个故事。2000年的时候，有朋友介绍我到杭州去买了父亲的一张四尺整幅的山水，画廊经理又给我看了一些照片，都是些大名头，我看中了钱老的一张《常熟田》，经理说这些作品都在海外，待回来以后我通知你。这样过去了三年，这件事情我也慢慢淡忘了。有天晚上十点多钟，画廊经理给我打电话，说钱老的《常熟田》回来了，同时还有你父亲的作品，但这两张都被上海一位游客看中了，明天他就带钱过来买，你先到我就卖给你。第二天一早，我就买了火车票往杭州赶，途中我打电话给杭州的朋友，问上海游客来了没有？他说已经来了，我把你父亲的那张卖给了他，《常熟田》我留给了你。我很感谢这位朋友，虽然与父亲的作品失之

交臂，但买到了钱老的一张代表作，心里真是开心。十多年过去了，我和杭州的这位朋友一直还有来往。

收藏钱老作品比较复杂一些，因为他有的作品存在代笔现象，所以收藏就要小心，要深入研究。

当然我花力气最大的是收藏我父亲的东西，除了感情因素，也是为了研究整理和展览活动

雅：收藏您父亲的作品，应该是在他去世以后开始的吧？

宋：是的。他在世时你不能做这个事。父亲留给家里的东西也不多，他把自己许多重要的作品都捐献给了国家，像太仓宋文治艺术馆、江苏省国画院、江苏省美术馆等。留给我们子女的大部分都是一些册页、镜片。有一次我回家乡，想要借父亲的作品做展览，但被有关部门很不客气地拒绝了。当时我就下决心，一定要自己有能力独立地给我父亲办展览。当然，收藏父亲的东西，对我来讲是责无旁贷的，但有了这件事的刺激，就成了当务之急。我前后花了将近十多



年的时间，做成了这件事情。

雅：去年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办的您父亲的绘画艺术展，应该是您收藏的一次集中展出。

宋：是的，这次展览包括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一直到父亲去世的那一年（1999年）的作品，里面一大半都是我收藏来的。那本《文治风华》画册里面，第一张是他早期作品《黄鹤山樵笔意》，是我从苏州拍买来的，最后一张是我从十竹斋画廊买来的，这些都是很珍贵的。我下功夫收了他不少精品力作，如六十年代的《山川巨变》、《江南春晓》、还有大幅作品《群岚叠嶂 云壑松风》等等。

其中有一张父亲上世纪七十年代画的《太湖胜揽图》，曾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这是一张手卷，有370厘米长，画的是太湖。太湖是父亲擅长的题材，人称“宋太湖”，但父亲经常画的是苏州洞庭的太湖，而这个手卷画的是无锡太湖。在表现手法上，这幅画更为写实，展现了无锡太湖两岸辽阔秀美的景色，是非常难得的珍品。但收藏这张画确实不容易，我第一次在藏家那里见到就想买下来，但对方要我拿我父

亲收藏的李可染先生的一张山水画来交换，李先生这张画只有0.7平尺，但画得很精到，所以我没有同意。一直到三年后，藏家再次提出来交换，我也实在不想放弃父亲这张代表作，这才交换成功。

雅：您现在宋老的收藏，这个体系已经形成了。

宋：是的，因为目的、目标比较明确。我非常注意系统性，各个时期、各种面貌的都要有，这是其他机构和个人的收藏目前都做不到的。我对作品进行研究和整理，包括为他搞展览、搞活动，意义就跟一般的收藏又不一样了。

现在要搞书画大家的书画展，借作品就很难。原因可以理解，因为这些作品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艺术品。另外因为我们国家有很多制度和措施跟不上，比如保险啊，安全保障啊，等等，这些不是很完善。根本原因还是经费有限，比如陆俨少这个展览，我如果要北京画院保险，一百多件，大家都知道价值连城，你说他要花多少钱买保险？所以现在借画非常难。我有了父亲比较完整的一批作品，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因此今天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我收藏父亲的画，

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收藏除了眼力、财力、魄力以外，机遇也非常重要

雅：在收藏界流行一句话，就是收藏要有三个力，即眼力、财力、魄力，对此您怎么看？

宋：除了眼力、财力、魄力，还有一个机遇也很重要。很多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还有很多偶然性，讲缘分嘛。

比如说我收藏的父亲那张代表作《山川巨变》。这张画是我认识的一个人因为孩子要出国，急着要筹钱，所以要出手。我有一个企业家朋友曾经托过我，说有宋老的好作品，你就推荐给我。这张作品的确是够得上我父亲顶尖的作品，于是我就打电话叫他来拿这张画。结果他们两人就在我那儿，开始讨价还价。卖家要43万元，买家坚决要砍掉三万块钱。两个人讨价还价大半个小时，谁都不肯让步，我实在受不了，说你们不要再讨论了，这张画我买，就这样买下来了。

现在看，当时我的决定完全对了。

比如说我与潘天寿就没有缘分。我很喜欢潘天寿，我曾到杭州三次，都非常诚心地想去参观潘天寿纪念馆，但都没有参观成，第一次是休息关门，第二次是开会闭馆，第三次是装修闭馆，到今天都还没有去过。潘天寿的作品我很喜欢，也有过几次机遇，但都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拿到，最后失之交臂。当然这种事情，退一步想，你一个人不可能得到所有的好东西，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就是缘分不够，总会留下一些遗憾。

如果要把收藏引入一种健康的轨道，就必须注入人文精神

雅：您父亲和您的收藏，是属于人文收藏，这种收藏您认为有些什么特点呢？

宋：我觉得人文收藏这个命题很好。收藏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形式，从我父亲到我们这一辈，为什么能够把收藏这件事坚持下来，并且还有发展，我觉得

链接：

宋文治，1919年出生于江苏省太仓城厢，苏州美专毕业。先后拜张石园、吴湖帆为师，并得到陆俨少、朱屺瞻的指导。曾长期在太仓和安亭两地从事美术教育工作。1957年调江苏省国画院。历任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中国美协理事、江苏省美协副主席、江苏省政协常委、江苏省文史馆副馆长、南京大学教授、国家一级美术师等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深入生活，形成了苍沉俊秀的个人艺术风格，他的作品在国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代表作有《山川巨变》、《江南春朝》等，尤以描写江南水乡的作品为人们喜爱，有“宋太湖”之美誉，是“新金陵画派”的砥柱人物，也是“娄东画派”文脉的当代传人和“新娄东画派”的杰出代表人物。

宋玉麟，1947年12月出生于江苏省太仓市，自幼在其父著名山水画家、收藏家宋文治指导下学习绘画。1969年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毕业。曾任江苏省美术馆馆长、江苏省国画院院长。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副院长、江苏省文联副主席、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江苏省海外联谊会副会长、江苏书画家联谊会会长、江苏省美术馆艺术鉴定顾问、南京博物院书画鉴定顾问，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作品参加第六、八、九、十一届全国美展，百年中国画大展，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并获得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三等奖。2012年应邀出席第三届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并作电视讲演。

最关键的是对文化的热爱、喜欢，这是最大的动力。有了这种热爱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风浪，还是生活困顿，还有其他的什么问题，都会坚持下来。在五六十 年代，父亲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什么收入，有许多作品是靠省吃俭用买来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整天担惊受怕，就怕那些东西被抄家抄走了，就把有的东西藏到上海我那里。父亲到外地去，他都会把陆俨少几个手卷放在小手提箱里，随身带着，到了须臾不可离开的地步。没有这种癖好，甚至是痴迷，也就不会有他收藏的这些成就。

雅：现在人们一谈收藏，首先是它的经济价值。

宋：我始终认为我们的收藏，目的不是为了盈利。收藏家有的时候也会（卖）出些东西，但与画商不一样，一个目的是资本的积累，为了利润，另一个目的是为了更多、更好地调整自己的收藏，两个角度是不一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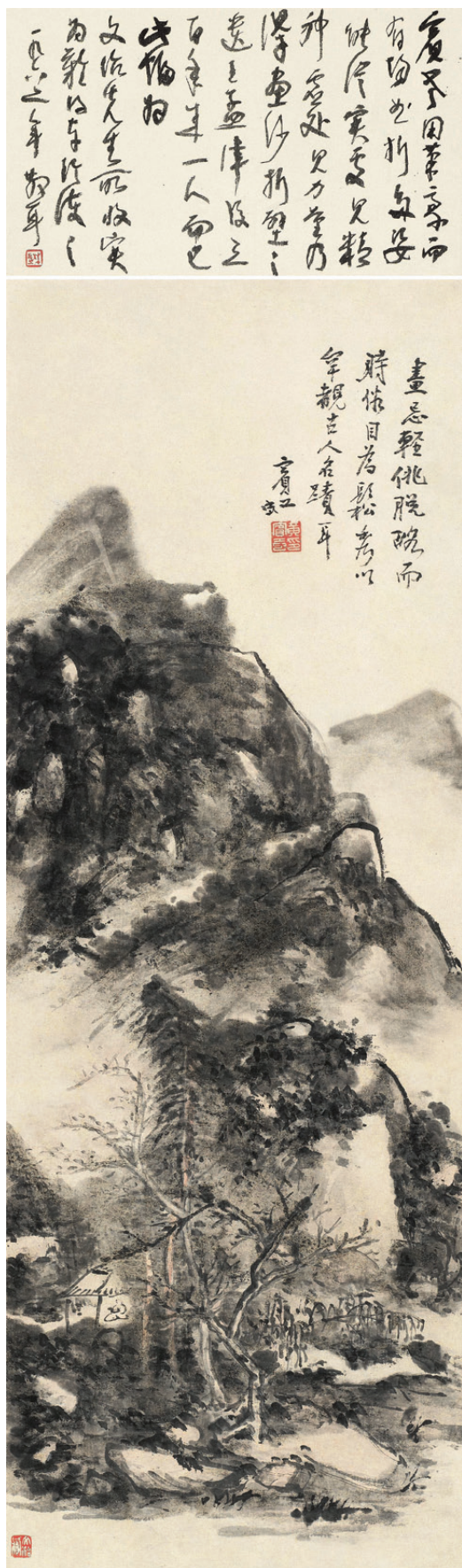
我自己有一点收入的时候，就会把它放到收藏上面去。如果一座豪华别墅和一个陆俨少好的手卷放那里，我肯定会毫不迟疑地选陆老的手卷的。

我一直主张，要把收藏真正引入到一种健康的轨道，必须注入人文精神。书画当然有经济价值这个属性，但也不能当作股票那样去炒。同时，你要想成为真正的收藏家，那你就要真正热爱它，喜欢它，去享受收藏整个过程。

雅：您认为收藏的收获主要有哪些呢？

宋：父亲收藏书画是为了借鉴和学习，他说过，“求得佳作，置于案头，信手可翻，似师似友，获益匪浅”。天长日久，父亲不仅成为一个有影响的画家，也成为 一个收藏家和鉴定家。他鉴定的眼光，得到谢稚柳、徐邦达和启功等前辈的肯定。

我认为自己在艺术上是有眼光的，其中收藏是起了关键作用的。我父亲经常讲这样一句话：眼高手低是形容一个人水平不行，但是对画家来说，眼高手低是件好事情。他说你眼界不高，你永远画不好，所以眼界一定要高，眼一定要在 手的前面。我认为 是很有道理的。



黄宾虹 山水 1940 年代

雅：听说您还为省美术馆收藏了一批画。

宋：2001年12月，我从省国画院调到省美术馆任馆长。美术馆和国画院两个单位的性质是不一样的，美术馆肯定是以收藏、展览、研究、交流这四项任务为主。美术馆的地位，靠什么来奠定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藏品的数量和质量。那国画院不是看这个的，国画院看你有没有好画家，有没有大画家。江苏省国画院、北京画院能够有今天，就是因为有齐白石、傅抱石、钱松喆等等大画家，他们人不在，但影响还在。所以根据美术馆的特点，我把收藏作为省美术馆的一项重要工作。

我确实也是抓住了这个机遇。我的设想是要比较系统地收藏新金陵画派的钱亚宋魏的作品，应该说，通过几年的努力，很有成效。原来美术馆有六七十张新金陵画派的作品，我离任时翻了一倍。其中我父亲现存最早的一幅画，是1948年的，也收藏到了。又收藏了一批油画作品，包括詹建俊、黄永玉、靳尚谊、杨飞云、罗中立等等名家。

雅：收藏如何考虑发挥社会功能呢？

宋：通过展示、出版、研究和其他方式，让收

藏品能够与公众分享。前面也讲过，我收藏的林散之、陆俨少和父亲的作品，就分别在北京展出过。

我父亲给家乡太仓市捐献了不少东西。包括有他收藏的30件明清书画，其中有文徵明、董其昌、文彭、王铎、郑板桥等大家，还有他自己的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60件代表作品。有意思的是，父亲还把他收藏的几十件彩陶、古瓷等也一起捐献了。太仓宋文治艺术馆已经成为太仓一个很有影响的公众文化活动场所。

但当时在建宋文治艺术馆时，父亲没有捐他收藏的现当代的一些著名画家的作品。父亲以为这些作品大都是朋友画给他的，他不能用朋友的作品来给自己建艺术馆。

雅：您对后来的收藏者有什么建议？

宋：主要有三点：一是收藏首先是自己要真正的喜欢，二是收藏的机缘永远存在，三是向有经验的收藏家和鉴赏家请教。

雅：感谢您接受采访。

（本文图片由宋玉麟先生提供）

沙洲男，在省级机关任职，业余写作。

简讯：

江苏书画家联谊会五位名家 荣获省首届“紫金文化奖章”

本刊讯 5月22日上午，江苏省纪念毛泽东同志5·23讲话发表71周年座谈会暨“紫金文化奖章”和“江苏社科名家”表彰会在南京西康宾馆举行。江苏书画家联谊会名誉会长尉天池、会长宋玉麟、副会长言恭达荣获首届“紫金文化荣誉奖章”，副会长孙晓云、理事薛亮荣获首届“紫金文化奖章”。

省委、省政府评选“紫金文化奖章”（首届含荣誉奖）和“江苏社科名家”，旨在表彰在文化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文化工作者和社科工作者，以进一步调动全省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快建设文化强省。首届“紫金文化荣誉奖章”获得者共有17人，首届“紫金文化奖章”获得者共有5人。（庆磊）

多情『人瑞』周有光

三
张
跃

刺绣《周有光与张允和》，常州乱针绣大师孙燕云历时近7个月绣成的作品。

周有光右手执书，左手指点书中文章，神情平和专注，夫人张允和轻偎在身旁，白发梳辮，面目清秀端庄，紫色碎花的中式上衣与周有光的白色衬衣相映相衬，身边粉红的月季开得正艳，身后层层树叶叠成一道浓得化不开的绿山墙。

我端详着这幅根据周有光夫妇花前共读照创作的乱针绣，心弦再一次被画面流露出的和美气韵拨动了。宝黛共读西厢记的定格以其凄美的旷世爱情流传千古，那是文学作品的魅力，而这幅画面记录的是一对凡间夫妻普通的生活瞬间，他们年至耄耋，历经人世沧桑，却有着年轻率真的心、豁达疏朗的情性。尤其是画上的老人周有光年过百八依然充满活力，且放眼世界著书立说不断。

我与周有光有缘。工作的变动让我有幸在

2011年走进了统一战线这个多姿多彩的部门。对这位身为民盟盟员的常州籍文化名人，我非常期盼和他的相见。2012年的1月6日，我手捧一本《今日花开又一年》，坐火车千里迢迢到北京为周有光祝寿。今年的1月6日，我带着这幅乱针绣再一次乘动车去看望周有光。7天后就是1月13日了，是周有光108岁生日。活到茶寿这把年纪，“人瑞”周有光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传奇的人生。然而，震撼我心灵的是他平和淡然中老骥伏枥、心忧天下的志士情怀。

—

周有光，清朝光绪年间（1906年）出生在江南名城名巷——常州青果巷，后迁居苏州，求学上海，留学东洋，再后来游历欧美，离家



周有光近照

乡越来越远，他的世界也越来越宽广。前半生搞经济，担任过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周恩来、陈毅都曾侧耳聆听过他对中国经济的建议。50岁后因国家需要中途改变学术方向，专职从事语言和文字研究，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既藏有周有光的经济学著作，也藏有他的语言学著作。有“周百科”之称的周有光还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三位编委之一，他出版的仅语言学方面的专著就达三十多种。

在那个群英荟萃的时代，以专业领域的业绩和贡献，周有光在圈内是有国际影响的老一代学者，但在圈外还算不得特别有知名度。真正让周有光成为媒体的宠儿、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还是他百岁之后。人活百岁已是不多，周有光百岁后依然思维敏捷，身体健康，电脑写作“机耕”不辍，开博客，出版《见闻随笔》、《朝闻道集》、《百岁忆往》等八本热销专著，几乎是一年一本，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也是一大奇迹。

2012年1月6日那天，时任常州市长姚晓东、秘书长徐新民和我专程去为周老过107岁生日。走进他家，周老坐在书桌旁边等我们。初次见面，我一看，好个神清气爽的百七老人，淡定中透出童真般的可爱，真当人中之瑞、国家之宝。

听我们谈及常州对大运河遗产实施长效保护工程，周有光说：“运河对于中国关系重要，因为中国河流都是东西向的，南北要通就是靠运河，中国的发达跟运河有密切关系，后来有了火车情况变了，所以运河经过常州，历史上是一个大事情啊！”寥寥数语已是涵盖历史、地理、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令我等后生晚辈大为感慨。

今年我们再见到周有光，他先是打趣上帝把他给忘掉了，随即和大家谈到，“现在这个时代，手机改变世界，中国是个大国，中国人打手机一般是国内通信，小国家的人一打就打到国外去了，对小国家影响很大。整个世界都在改变，不得了，将来还要变。”老人家对世界形势的关注和把握真可谓不出门尽知天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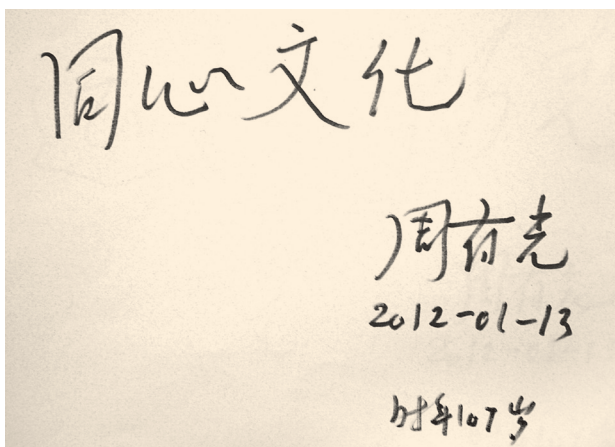
翻阅新近出版的《周有光年谱》，得知周有光83岁离休，“事实上，我的学术研究在离休以后就结束了”。离休后，周有光开始涉猎各种书籍，他跳出专业，漫游在世界历史和世界文化的海洋，不想这成了他晚年研究的一个重要兴趣点。他总结自己的学习经历，提出“一个人要终身教育，百年自学，一直到死还要学”。

我浏览了一下周老书房内一大三小四个书架，《全球通史》、《世界文明史》、《文明的狂飙疾进时代》等这类历史、文化方面的书籍很多。周有光将中国文化放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进行纵横比较，主张从世界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看世界。他105岁时出版的新书《朝闻道集》，表达了对语言、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思考和真知灼见。书的扉页上写着：“朝闻道，夕死可矣。壮心在，老骥千里。忧天下，仁人奋起。”正是有着这般心忧天下的情怀，加上他以世界的眼光、历史的分析方法，百岁周有光超越了时代。

周有光历经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和新中国时期，被友人戏称“四朝元老”。这样一位百岁元老，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跑过上海、纽约、伦敦等世界大码头，是屈指可数的与爱因斯坦面谈过的中国人。阅尽人世间的繁华与凄凉，他的身体和灵魂非但毫无暮气，反而通体率真，淡然从容中尽显睿智。

周有光不喜欢官场那一套。“国民党里好多重要人物都是我的同学、好朋友，要做官早做了，我不加入。跟共产党很多重要人物也是好朋友。我跟周恩来在重庆就认识，1945年国共合作谈妥之后政协成立，他开座谈会总有我。陈毅在上海当市长时，开座谈会总请我，我给他提经济方面的建议，他在很多场合说，‘周有光的建议都很好，但我不在他也实现不了！’但我也没加入共产党。政协开会，我跟毛主席也碰到过，拍了几次照，但从来不挂。许多人把重要人物的照片挂在墙上，我只挂家里人。”

没有加入共产党的周有光是党的挚友。他参加过“救国会”活动，他曾经回忆说这与主张抗日的中坚人物章乃器有直接关系。周有光与章乃器相识于上海的“中国征信所”。“征信所”是银行界创办的信用和市场调查机构，为各银行提供每天的信用调查和市场调查报告。“征信所”创办之初，由上海银行界选出几家有代表性的银行，各出一人组成董事会管理所务。周有光代表江苏银行，章乃器代表浙江实业银行。章乃器因“才能出类拔萃，被推举为董事会的董事长”。因为敬佩章乃器的才华，周有光与章乃器常相过从。交往后，两人发现不仅专业见解相同，政治见解也相同，遂成为说得来的朋友。章的夫人胡子婴与张允和也成为一生的知心朋



周有光题写的“同心文化”



2012年1月，时任常州市市长姚晓东（左一）为周有光祝寿，周有光欣然题写“同心文化”。



2013年1月，常州市副市长方国强（左一）、本文作者（左三）和民盟常州市委主委赵忠和（左四）、常州市文广新局局长陈建共（左二）向周有光赠送乱针绣作品。

友。后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救国会“七君子事件”，周有光夫妇参与了营救“七君子”。由于参加民主救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周有光工作的新华银行暗中安排张允和与儿子周小平秘密离开苏州，到香港与周有光团聚。这段经历，周有光很少提及，在他看来他只是在尽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他的人生理想是无意于政治的。

我在《周有光年谱》和百度上都查阅到“1948年周有光在香港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的纪录，可惜没有找到他加入民盟的记载。周有光曾经很坦率地谈起，“胡愈之说，没有一个组织关系不方便，我就参加了民盟，其实什么都不管。《群言》是民盟的刊物，我给他们写文章，20个编委现在就剩我一个。”至今，周有光还在给《群言》写文章。

周有光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他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关心下一代的成长问题，写信呼吁中央解决学生睡眠健康问题。他提出：“欧美式教育，称博雅教育。要给孩子自由，培养自觉能力；知识基础要广，便于将来发展。”“我认为中国的未来跟世界的未来是一致的。社会的发展有一个规律，规律可以暂时离开，不能长期离开，迟早要按照规律前进。世界都向民主制度前进，中国的方向也一定是一样的。”简约的言语中透出深长的意味。

两次拜访周有光我都请他题词，他其实很少写字，这个新潮老人运用电脑打字已20余年。提起碳素笔来，他不好意思地笑了：“字都不会写了，人过了100岁就退化，自然的，我退化到小学生了，明天要进幼儿园了。”随后，认真写下“运河畅想”、“常州我的故乡”、“人文荟萃青果巷”。他为我们题写的“同心文化”派了大用场。常州市委统战部的网站更名为中国常



周有光与本文作者亲切交谈

州“同心”网，统一战线的同心实践活动设计了“同心”标识，“同心”二字都是周老的亲笔。好多次，看到周老那自成一体的“同心”，都会想起和他交谈时的情景，他深邃的思想、豁达的人生态度都对我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启迪。

三

周有光让世人倍感兴趣的还有他的情感和奇特的遭际。他娶了淮军名将张树声的孙女，民国教育家张冀牖的二女儿——张允和，和文学大家沈从文是连襟。叶圣陶说过，“九如巷四姐妹，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生。”张允和80岁时回忆昔日恋爱情景，写了篇《温柔的防浪石堤》，“当她的第一只手被他抓住的时候，她就把心交给了他”。从此他们相濡以沫、举案齐眉70年，直到2002年张允和以93岁高龄在北京去世。

在周有光看来，幸福要靠自己。夫妇之间，“既要爱又要敬”，这是婚姻幸福的密码。他与张允和细水长流的爱情和婚姻生活透出的是这对百岁佳人对生命的理解和包容。

2012年我第一次见到周有光，是在他那间9平米的书房里。佳人已去，但斗室之中随处可

见张允和的影子，他们在花丛中浅唱低吟的照片挂在周有光书桌后面的墙上，顶天立地的大书柜上有多幅他们的合影照，似乎女主人只是刚出门，房间里还留有她温润的气息。那一次，我就想好了，要请常州的乱针绣大师绣一幅花前共读图，用家乡独特的艺术形式为周老夫妇留下一件值得记忆的东西。

他们70年的美满生活并不一帆风顺，周有光曾经感慨：“遇到许多大风大浪。八年抗日和十年文革，是两次最大的灾难。”

抗战期间，日本人的炸弹在周有光身边爆炸，旁边的人很多都死了，他侥幸活了下来。张允和独自带着一对幼小的儿女历经艰辛避难到四川，临近6周岁的女儿小禾因艰苦的条件患盲肠炎在重庆夭折。周有光悲痛欲绝：“坟外一片嫩绿的草，坟中一颗天真的心。摸一摸，这泥土还有微微的温暖，听一听，这里面像有轻轻一声呻吟。”

失女的伤痛尚未抚平，唯一的儿子小平在成都被流弹击中。正在重庆出差的周有光听到消息后，冒着漫天的雨雾往回赶，经过4天的雨天路途，到家门口时，周有光没有进门，带着一颗沉重似铅的心，隔门在门洞里问房东家的男工：“小平怎样？”男工说：“在医院里。”在他的语音里，周有光听出小平安全的消息，这才松了一口气。否则，他怎么敢进这个大门。后来，周有光在写给妻妹张允和的信中表露了自己当时的心情：

汽车的颠簸叫我疲倦，叫我麻木，这也帮助我心情平静下去，但我无论如何不能鼓起积极的生活兴趣，也不能自己接受自己的积极人生观，我逐步步入宗教的安慰里去。我在教会学校读书多年，但是没有信教，小禾死

了第三年，我才受洗礼，但我没有做过祈祷，这次我为了小平，做默默第一次祈祷，我渐渐失去了对人力的信赖，我只有茫茫地信赖神力了。真的，假如我一到家门口问着那个房东家男工，如果他的答复是另一种，那么我眼前的世界将是完全另一种色泽。

再积极的人生观在面临亲人生离死别之大难前也会崩溃。周有光是个凡人，有着作为一个父亲、一个丈夫的普通情感，小禾之死和小平之伤或许是他人生中最大的苦难，他内心的无奈、恐惧与彷徨正是一个男儿的真情。从此，再苦再难他都乐观豁达地看待了。

“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十年“文革”，一家五口分居三处，下放干校时，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社会渣滓”，他是抱着再也回不来的想法的。他在苦难中微笑，和老友在高粱地里高谈阔论中国语言，在白菜窖边引发“白菜理论”的思考，在平罗遭遇一万年才遇到一次的大雁集体粪雨的奇事。他相信祸福相依，当年为了国家的需要抛开自己喜爱的经济去搞语言研究，却躲过了“右派”的帽子；下放到宁夏改造，却治好了困扰自己多年的胃疾和失眠；离休后赋闲在家，却写出了多部著作。这一段段人生的“错位”在今天引为一个个奇迹和一段段佳话，可是在当时是需要何等的胸襟和智慧去包容、去担当！

2002年盛夏，他数着张允和渐渐微弱的脉搏，看着自己深爱了一辈子的老伴儿踏上了天国之路。“两个人少了一个，好像自行车的轮子忽然掉下来了，你怎么走？”然而这位通达的老人半年后就稳定下来了，他想到一位哲人的话：个体的死亡，是群体进化的必然条件。

释然、安然。曲终人不散，他把自己和张

允和的散文编成一本《今日花开又一年》。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四

周有光诞生在常州青果巷礼和堂。“我们家在运河边上，前门在路上，后门在水边。记得后窗外是运河，可以看到来往的船只，有的船头两边画着眼睛。”他在《我居住青果巷的岁月》中深情地回忆：“我大概三岁开始，常常跟祖母在一起。我的祖母住在河旁边的房子，大玻璃窗，有月亮的时候特别好。祖母教我念唐诗。”

青果巷历代名人辈出，明清至现代，走出了百余名进士和几十位享誉中外的知名人士。周有光说：“青果巷有意思，瞿秋白、赵元任、我都住在青果巷，我们三人都搞文字改革。”

今年1月6日我见到周有光，说起常州老家的名人，他称赞，“赵元任了不起。上世纪四十年代我在美国工作学习时，常常去看他，请教他问题。赵元任在美国教书，我的夫人上过他的课。中国语文现代化，是他开头的。赵元任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我们设计拼音方案时主要参考了他的学术成果。后来我在北京大学上课，出版了一本《汉字改革概论》，赵元任看了以后，就从美国写信给我。可是碰到了‘文化大革命’，这封信我在四年后才收到。”

说到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周有光非常高兴，他说和吴稚晖见过面，称赞吴稚晖走在时代的前面，是有新思想的人。

对故乡的记忆伴随周有光一生。两次为周有光过生日，我都精心准备了大麻糕、萝卜干、梨膏糖和横山桥百页等常州特产。看到包装精美的贴炉大麻糕，周老笑了：“好漂亮的，麻糕也现代化了。”看到萝卜干，他说：“萝卜干也

很好的，现在日本萝卜干销到北京了。”从小萝卜干洞悉世界大经济，周有光不经意的一句话不禁令我等汗颜。

周有光是常州的骄傲。2012年底我带领常州同心文化团赴台湾访问，在阿里山下避雨时，和一位卖土特产的小商贩聊天。我问他知道常州吗，他马上列出了常州的天目湖、恐龙园。列数常州名人时，他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周有光，并当场写下周有光的名字，称周有光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功劳大。随即这位叫姚巨纶的台湾朋友在周有光的名字下写了几个“注音符号”，他说，这是你们常州人吴稚晖发明的，现在台湾人还在用，对在台湾普及推广汉语普通话功不可没。我当时非常感慨，祖国之大，在宝岛台湾的阿里山脚下，一个普普通通的百姓竟如此知晓常州、了解周有光，名人周有光不正是常州历史文化名城创建的一张名片吗。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周有光听时，老先生孩子般地笑了。

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哪一天不忙的时候，我一定要再去拜访周老，坐在他的小课桌对面，北边的窗户打开着，暖风吹进来，静静地听他纵论古今天下，听他讲与老伴儿张允和的故事，听他说说儿时的青果巷。如果可以，我希望有一台摄像机记录下周老睿智风趣的笑谈，趁着周老还健在，制作成一部纪实片《周有光》。这定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毕竟，时光不等人，岁月不饶人，我希望我的愿望尽早实现。

张跃女，中共常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曾氏兄妹

III 叶兆言



1951年，曾昭燏（1909—1964）摄于南京博物院。

先从妹妹说起

长期以来，对于曾昭燏先生，一直有两个错误印象。首先，她不是曾国藩的曾孙女，是曾国藩弟弟国潢的后代。中国现代史上的狠角色，对曾国藩都十分推崇，蒋委员长读书不多，喜欢把曾文正公挂嘴上。毛主席他老人家对这位湖南老乡推崇有加，干脆就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他的几卷《曾国藩家书》，扉页上都写着“咏之珍藏”字样。毛还说过“在曾国藩的后代中，还有一个叫曾昭燏”，正是这句话，我有了第一个错误印象。

其次，曾昭燏并非死于“文革”。到过中山陵，一定知道灵谷塔，南京人俗称为“九层塔”，很高很巍峨。我们读书时郊游，有一次排球掉下去，发出的巨响跟打炮一样，想起来后怕，落人脑

袋上，后果不堪设想。曾昭燏正是从这塔上一跃而下，然而她的死，与习惯思维中的受迫害，不甘凌辱自杀无关。陪朋友去游览，卖弄过去掌故，我不止一次误导别人，把她的死列入“文革”受迫害名单。

很显然，说到曾昭燏，一定会和曾国藩有关系。曾国藩影响很大，对自家人的影响更大。男人该怎么样，女人不该怎么样，有许多苛刻规定。男人不说了，关于女人非常具体，要做手工，要织布，要下厨。湘乡曾家一门人才辈出，有口皆碑，到曾昭燏已第四代，与曾国藩相差99岁，时代完全不同，良好的家教遗风还在。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北京医院病房，我曾见过一位曾家后人，当时也还是弄错，说是曾国藩玄孙女儿，叫曾宪植。后来查资料才明白，不是曾国藩，是他的另一个弟弟曾国荃。也就



1953年南唐二陵工地，后排右二为曾昭燏。

是说，是曾昭燏的堂侄女，实际年龄却只小一岁。这是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风度极好气质非凡。病房过道上有个长椅，每到黄昏时分，便坐在那休息，她是叶剑英的前妻，全国妇联副主席，据说是曾家的第一位共产党员。

湘军领袖曾国藩是老大，有四个弟弟，每人都能说几句。老三国华，战死三河镇。老四国荃，族中排行为九，当年正是这位九爷，率湘军攻破了南京城，官至两江总督。老五国葆，病逝于军中。曾家五兄弟都是读书人，能文能武，皆有军功。老二国潢没在战场上久待，他是家族大总管，兄弟前方厮杀，他在后方照顾父亲，督课子侄，对曾氏子弟教育贡献最大。

曾国藩曾夸二弟“劳苦最多，好心好报”。由于长年在外，如果说种种家规是老大曾国藩制定，真正让它贯彻和执行，却是这位国潢。1868年初夏，剿灭了太平军，曾国藩功高盖主，即将调任直隶总督，上任前，为本家女性定了非常具体的“功课单”。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这是食事。接下来纺花或绩麻，这是衣事。中

饭后做针黹刺绣，这是细工。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缺一不可，曾国藩很认真地说，“自后每日立定功课，吾亲自验功”。

这个当然只能嘴上说说，不过规矩还是规矩。曾氏一门出了太多人才，不能不刮目相看。身为女人，更该说的，恐怕还是嫁人，与曾家结亲同样不同寻常，查联姻的关系网，有关的名门数不胜数。光说曾昭燏这一家，哥哥昭抡娶了俞大綱，妹妹是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的媳妇。俞大綱又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女，本来就是一家人，她哥哥俞大维，后来的国民党国防部长，蒋经国的亲家，姐夫傅斯年，著名的学界领导人。

能攀上亲的还有陈寅恪，还有一大堆名人，不过曾昭燏终身未嫁，始终是个做学问的老姑娘。长沙的艺芳女子学校，首任校长曾宝荪是她姑姑，也是杰出的老姑娘。曾昭燏几个姐妹都从这学校毕业，1929年，她考入中央大学国文系，成为胡小石先生的得意弟子。

师从胡小石是她人生的转折点，曾昭燏的

学问落实在考古学上，无疑与老师深厚的文字学功力有关。作为胡的入室弟子，研习碑帖是必须的，然而曾昭燏并不以书法见长。她有很好的古文字基础，诗词文章都相当不错，最后却成了非常专业非常有成就的考古学家。

曾昭燏的求学经历，有两事值得一提。一是读书时，为了便于请教，干脆住恩师胡小石家里。在当时非同寻常，大教授都是有脾气的腕儿，不是最欣赏的弟子，享受不了这耳提面命的待遇。一是去英国留学，最初也没想学考古，那时候经费不足，她的目的不在学位，只是为了学习西方学者的治学方法。胡小石教会她如何在案头的书本上做研究，西方的考古学教会她走向田野，直接面对地底下的实物，而这两者恰恰是中西学问的最高境界。

考古学谈不上显学，要坐冷板凳，要在野外挖掘现场吃苦头。曾昭燏属于中国第一代考古专家，很有成就，参加和主持了一系列重要挖掘项目，譬如南京人熟悉的南唐二陵。她在考古界的地位不可动摇，曾被誉为“华东门神”，“南霸天”，这些都代表了她的学术影响。

曾昭燏死于1964年，她的绝然而去，有种种猜想，没一个标准答案。

哥哥曾昭抡

曾昭抡先生是曾昭燏的哥哥，提起此马来头大，他是我国现代化学界的大佬，当年的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中国化学学会会长。1949年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化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关于曾昭抡，有一段轶事总是让我觉得可



曾昭抡（1899—1967）

疑。据说朱家骅当中央大学校长，有一次开教授会议，看见有个人穿得很破烂，十分不屑地问你是谁。对方说我是化学系的，朱板着脸说，好吧，回去叫你们系主任来开会。结果那人扭头就走，第二天递了一份辞职报告，原来这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曾昭抡。

我不相信这段子的理由有二。第一，朱家骅绝非平常之辈，不说别的，能当中统的特务头子，眼神就不该这么拙。很多年轻人已不知道中统怎么回事，我们小时候看电影，都知道国民党最厉害的狠角色，就是中统和军统。第二，曾昭抡的家世如此显赫，别人提起了，如数家珍地说这是曾国藩家的谁谁，又是留美的化学大博士，而且常青藤名校，这样的人穿得再破烂，毕竟是系主任，名士的架子还在。

那年头，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系主任，尤其化学系系主任。程千帆先生高中毕业升入金陵大学，原本想学习化学，可是去注册的时候，发现要读化学，活生生比学习中文高出一百多大洋。程千帆出身贫寒，窘迫于这白花花的银子，只能去中文系将就。前些日子大家聊天，说现如今中文系不行了，其实几十年以前，中文这专业已窘态毕露，早就不怎么样了。

曾昭抡生于1899年，与闻一多和老舍同岁。他和闻一多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清华出身，都是留美。闻一多在美国学美术，前后也不过三年时间，或许美国佬的绘画远不能和法国相比，叫不太响，因此闻回国以后，基本上与美术绘画无关，玩的都是文学。当年的留学生真是快活，太让人眼红，国外镀点金，一回国就大教授，就文学学院院长，随时可以跳槽。像闻一多这样的资历，1925年回国，又没什么像样文凭，短短几年，中央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长，最后才又



1945年曾家兄妹合影，前排左一为曾昭燏，后排左三为曾昭抡，后排左二为俞大綱。

回到清华。

曾昭抡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苦读六年，货真价实的博士。这样的才俊学成归国，前程怎么能不似锦，事业如何能不辉煌。他到中央大学，化学系系主任，非他莫属。不想在中央大学玩了，北上进入中国第一大学北京大学，原来的系主任必须得赶快给他挪位子。

风水轮流转，时至今日，研究生背后都叫导师为老板。老板们的日子很爽，地球人都知道今天的教授，尤其著名教授，皆是既得利益的成功人士。中国真有中产阶级，首当其冲的是教授，然后才是公务员，才是别的什么人。

说起过去历史，总喜欢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文化人的黄金岁月。教授真金白银，国外回来的才俊，年纪轻轻，薪水动辄几百大洋。在哪儿混都系主任，住舒适的小洋房，娶美丽的外国老婆，生一大堆儿女。

历史常会有惊人相似，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际大环境，仿佛今天的重演，都是国际金融不景气，西方普遍遭受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国却欣欣向荣，恰巧遇上了良好的发展机会。那个年代的海归占了大便宜，很轻易就把各行各业的好位置给占了。机会就是机会，机会真

是机会，好机会一过去，过眼烟云，海归立马变成海待。

抗战爆发，海归们好日子到了尽头。像蔡威廉，名媛名教授，住院生孩子的钱都没有。穷困成了文化人普遍现象，教授的手杖还在，雪茄已没得抽了，要想出各种法子挣外快贴补家用。朱自清不得不去中学兼课，再编点教材。闻一多玩美术的底子终于派上用场，自称手工劳动者，公开宣布润格，替人篆刻图章。

玩化学的人让大家羡慕和眼红，因为很容易转化为实用技术，譬如制造味精，制造肥皂。据说美国人曾向北大化学系求教过“味精”工艺，对于这种虚心求教，曾昭抡只要让弟子出面就足以应付。抗战期间，教授们穷得不像话，他在内地帮人开办了一家肥皂厂，立刻成为教授中的“富翁”，每月居然能多吃好几顿肉。

曾昭抡是与政治无关的人，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他那学问，是政府就该喜欢。按说国民党共产党，没有不用他的理由。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中央专门发文件，撤销高教部副部长一职。不当官是种解脱，北大不要了，武汉大学还当块宝，他便去了武汉。

右派有些糟糕，不过当教授的右派中，曾昭抡境遇相对还好。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或许都不能算悲惨，毕竟是搞研究，只要有书和实验室就行。1966年8月，红卫兵冲进北大，他妻子俞大綱遭到暴打，忍受不了污辱，仰药自尽。第二年，饱受批判的曾昭抡也在武汉告别人世，他患癌症已五年，所有人都瞒着他，一个居心叵测的造反派故意公开了这个秘密，往他心上扎了最后一刀，曾昭抡终于彻底崩溃。

叶兆言 男，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煞》、《别人的爱情》、《苏珊的微笑》等，散文集《南京人》、《旧影秦淮》、《陈旧人物》、《江苏读本》等。

罗振玉淮安遗事片断

III 陈鸿祥



罗振玉 (1866—1940)

罗振玉 (1866—1940)，字叔蕴，以雪堂之号著称于学界。享誉中外的“甲骨四堂”，罗氏名居榜首，“导夫先路”；新版《辞海》给予罗氏的学术定位，则是“中国金石学家”——这“金石学”显然是广义的，内含青铜甲骨、流沙坠简、敦煌经卷，等等。所以，近人综览罗氏一生学术业绩，赞之为“藏书盈库，著书满家”；“传古之功，居当代第一”（张舜徽《罗振玉学术论著集总序》）。我认为，这是并不过分的。

淮安乡音永丰人

不过，也不必讳言，在当今高调倡导的“国学热”中，若问：学界对于很早就被誉为“国学大师”的罗振玉其人其事，究竟知之多少？可以这样说，纵有所知，亦不多也。当然，知

人论世，首先不可不问：罗振玉究竟为何方人士？罗氏晚年撰《集蓼编》，自述身世，开门见山道：

予家自先曾祖由上虞侨寄淮安，至予凡四叶。同治丙寅（按，1866年）六月廿八日子时，生于淮安南门更楼东寓居。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记忆。淮安位于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与滚滚东流的淮河交汇处，自古就有“淮水东南第一州”之称。据记载，雄峙于淮水之侧的淮安城，周长十一里，城高三十尺，东南西北各有门，且门各有楼，“新旧城楼绕夹城”，可以想见当年包括“南门更楼”在内的城门构筑之坚固宏伟，只是世变沧桑，原有的城垣早已毁坏。而在旧城改造中被重点保护修缮的镇淮楼，则成了淮安古城旧貌换新

颜的标志，更见证了新中国建立以后根治淮河水患的壮举。

罗振玉生于斯，长于斯，真可说是推窗面城墙，举首见更楼，他所记“南门更楼东寓居”，即今淮安区罗家巷罗振玉故居，罗氏且将他在淮安所编第一部文集命名为《面城精舍杂文》；而他那部被近人谓之“笔洁味永”的金石学专著《俑庐日札》，虽撰于京师学部做官之时（1908年），犹多涉笔居淮往事，例如：记述“淮安府城，筑于南宋，故宋专（砖）甚多”，并写《淮安宋专》一则，迻录如下：

淮安宋专，多在城趾及府学，镇淮楼与漕督署亦有之。近城人家，犁地亦往往得之。黄氏所藏诸专，后归亡友山阳邱于蕃直刺（崧生），又增益之。予载入《再续访碑录》者，大抵

其所藏也。邱君尝与予及蒋君伯斧相约续《金石萃编》，积稿数寸，乃以薄官僚倒，中岁以没，其藏专今又不可知矣。书之令人腹痛。

对镇淮楼、漕督署（即总督漕运部院）、淮安府学，以至淮城遗址之忆念，对早年在淮安交结，并协同其在沪创办农学社及东文学社之邱崧生（于蕃）、蒋黼（伯斧）二位亡友之痛切缅怀，具现于笔端；而早年（1892年）作为《淮阴金石仅存录》附刊之《楚州城砖录》，则是罗氏于弱冠之年，“周巡城垣，遇文字新异者，携褚墨就壁上拓之，朔风炎日之不畏”，辛勤蒐访所得（重刊《楚州城砖录跋》），于淮安乡土文物之珍存传世，厥功至鉅。

但是，罗氏生前所刊著述，咸署“上虞罗振玉”，并撰家谱寻根追宗，称：“吾宗自南宋



淮安罗家巷的老房子，依稀可见当年风貌。（本文罗家巷图片引自“行摄埽地 旅行影记”的博客）

时有曰元（善）者始由慈溪迁居上虞三都之永丰乡，是为迁上虞之始。”（《上虞罗氏枝分谱》）是故，他自号“永丰乡人”，而以淮安为“侨寓”或“寄籍”之地。1980年，其长孙罗继祖为之撰年谱，书名就叫《永丰乡人行年录》（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应当指出的是，罗氏虽未入淮安籍，却在淮安城内历经三十寒暑，度过了最可宝贵的青年时代，奠下了一生学问的根基。溥仪《我的前半生》说他出生于“旧式书商家庭”，固属不知罗氏家世的“向壁之谈”；又称他“觐见”时“一口绍兴官话”，则纯系由罗氏“原籍上虞”而衍生之“想当然耳”！实则青年迁居淮安的刘鹗，在《老残游记》里尚且有着“颇具淮安方言特色”的辞例。自幼饮淮河水，于淮安语境中成长的罗振玉，纵然“鬓毛衰”而乡音不改。曾于罗氏晚年追随其左右的知情者说，“一听即知为淮安口音”，乃是实情。他怎会去说隔了四代人的“绍兴官话”？笔者生也晚，于上世纪80年代，曾与寓居南京山西路人和街的罗氏侄女（罗振常季女）罗守巽老人时相往还。盖老人年届八旬（辛亥东渡离淮安时尚不足十岁），犹操一口淮安乡语，可佐证。

三字对里有学问

罗振玉自述，他四岁随长姊认字，至冬识字千余。五岁入塾读《诗经》，六岁读《四书》，七岁读《尚书》……他就读的私塾办在自家院子里，俗谓家塾。祖母方老太太，出身桐城方家，家规至严，并亲自督责诸孙学业，要求晨入课堂，“暮始归寝”，不得任意旷课，不许外出游冶，不为非礼之事，不出非礼之言。这样的封闭式教育，一旦走出家门步入闹市，难免“少见多怪”了。例如，《永丰乡人行年录》记有，“八



罗家巷当年只住了罗姓一家人

岁，端午节，李师偶携乡人入市，乍见工人锻铁，怪问：‘赤者何物？’”这是说，塾师李老先生带着年方八岁的罗振玉，随同父亲、叔父上街，路过一家铁铺，见工人举锤锻打烧得通红的铁块，惊问：这是干啥？李老师告诉他，这叫打铁，于是他信口吟出了三个字：“铁打铁”。叔父闻声笑他“呆”，并以此三字为题，命他对对子。兹将罗氏晚年所记打铁铺前应对情状，照录如下：

过铁工肆，叔父忽谓予曰：“汝能作偶语乎？”时，师尚未授予四声，然闻师授先兄，故亦知之，乃对曰：“稍知之。”

师亟曰：“我未授彼也。”

叔父曰：“彼既自谓能矣，”乃出“铁打铁”三字命对。

少选，予应曰：“柯伐柯。”

叔父曰：“此非汝所能，必汝兄为之。能再对乎？”

予复对以“人治人”。

师益惊喜，曰：“吾往昔但期其为学者，今观其吐属不凡，异日必能成大事业。”顾先府君曰：“此子善视之，必亢汝宗。”（录自《欽枕录·李岷江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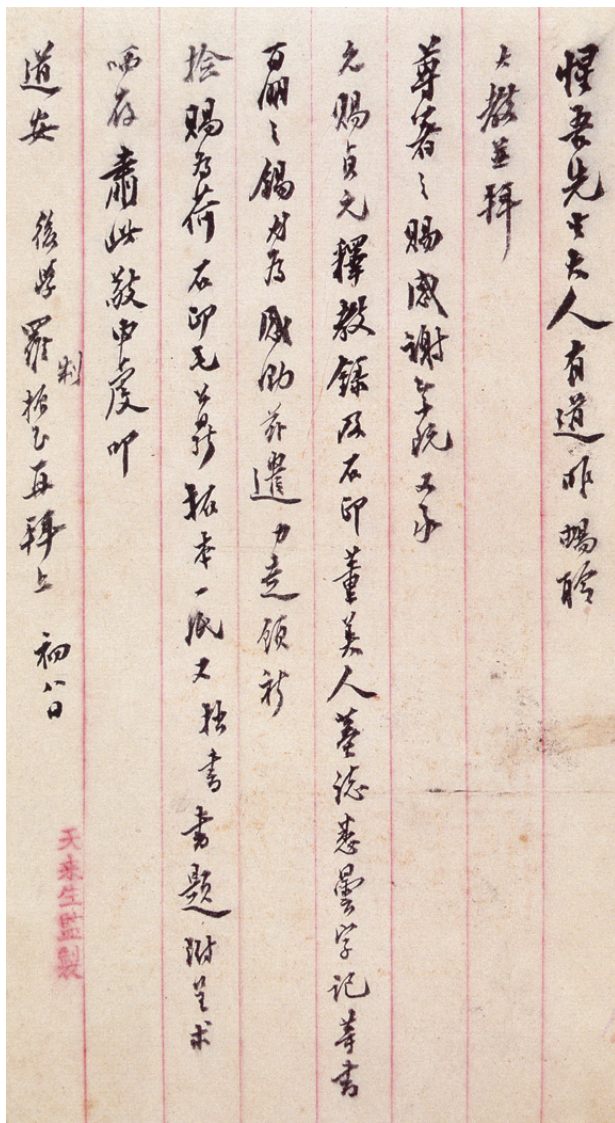
李老先生名导源，字岷江，山阳（淮安旧称）河下人，是位取得了拔贡资格的老秀才，早年曾教罗振玉父亲、叔父读书，故为罗家两代人的塾师，此时已年近七旬。他闻“人治人”之对而赞叹“异日必能成大事业”，是因为罗氏此时虽为“童言”，却非“戏说”。盖其所对，乃文有所本，言有所出，即《中庸》阐发的为人之道，原文如下：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对于这席话，朱熹注以“执柯伐柯”出《诗经·幽风·伐柯》之篇，并特就“君子之治人”，予以诠释：

若以人治人，则所以为人之道，各在当人之身，初无彼此之别。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中庸章句》第十三章）

当然，罗振玉绝非“生而知之”的“神童”，而是屡以“困而学之”自况，在当时也不可能说出朱老夫子所谓“即止不治”的儒家“忠恕”之类大道理。只是，由“铁打铁”而“柯伐柯”、“人治人”的三字对中，确乎表现了他以七八岁髫龄而熟读经书、才思敏捷，故思维超卓、应对如流。因此三字对而特嘱罗父尧钦公（树勋）善待此子、加意培养的塾师李老先生，当然更不会想到：事隔一个甲子之后，曾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陈寅恪，为清华大学文科招生拟了个国文试题曰：“孙行者”，标准答案：“祖冲之”，盖以祖孙为对。这个迥出常规、颇显另类的“对对子”考题，至今仍是广为传颂的学界佳话。而后来成为著名语音学韵学家



罗振玉手札

的周祖谟，乃在试卷上对以“胡适之”，并为出题者陈氏大加赞赏，则又成佳话中之美谈。

看来，“三字对”中有真学问，始作俑者，其殆罗氏欤？值得一提的是，罗氏早年撰《存拙斋札疏》，曾取《北梦琐言》载“王建微时好行小窃，时号‘贼王八’”，与宋人小说载“韩世忠少贫无行，人呼‘泼韩五’”为对，赞之曰：“贼王八、泼韩五，天然佳对”，这又显现罗氏虽少寅恪老人那样的“雅人深致”风采，却亦不乏嗜偶语、做对子之雅兴耳。

史称：“终、贾扬声，亦在弱冠。”说的是汉代终军、贾谊，皆十八岁扬名。罗振玉自称“夙嗜金石之学”，“年甫十九”（1884年，按实龄十八岁），写成了他平生第一部专著《读碑小笺》。次年，复将其“循览碑版”、“必疏之札”的笔记数十则，“理而存之”，辑成《存拙斋札疏》。按罗氏所说，少作问世，“海内多疑予为老宿”，经学大师俞樾曾“采予《札疏》中语，入所著《茶香室笔记》中”（参见《集蓼编》），云云。

“删雠旧稿，善存百则”的《读碑小笺》，以“考文订误”为宗旨，通过精密的考证，匡正前人著述中讹误，而被梁启超推为“荟录众说，颇如类书”的金石学权威著作《金石萃编》，尤为罗氏考订之重点。据我考核，初刊《读碑小笺》整一百则，考订《金石萃编》谬误，或辨其失考者，即有二十九则。为使读者有感性的认知，不妨举今仍通行于众口之两则称谓。

其一，“舍弟”之称：

临高氏碑，常允之撰，允之弟口口篆额，其署款称“舍弟承奉郎某”。《金石萃编》云：“兄称弟曰‘舍弟’，初见此碑。”予按：《魏略》载文帝《与钟繇书》：“是以命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转言鄙旨。”是此称曹魏已然，不始是碑。

其二，“公馆”之谓：

殷君夫人碑：“卒于口尉之公馆。”《金石萃编》云：“‘公馆’二字，初见。”予按：《礼记·杂记》：“为君使而死，公馆复，私馆不复。”公馆之称，始此。魏邈墓志：“卒于宣州宣城县之公馆。”韦应物诗：“公馆夜云寂。”是二字唐人习用之，非创见。

所谓“初见”，或曰“始见”，就是前此无有，未见未闻。然而，“说有易，说无难”。“予按”即罗氏通过按语的方式，敢对前人之“创见”说“不”字。并以确凿的证据，考其所是，正其所误，非常可贵的是，罗氏能以新的发现，订正原先之考证。例如，关于“三教”：

《唐书·艺文志》有卫元嵩《齐三教论》七卷；《隋书·李士谦传》载士谦答客问三教，有佛日、道月、儒五星之说，三教之称始此。《金石萃编》云始见唐叱干公《三交道场》文，误。

以上，乃《读碑小笺》正《金石萃编》之误；而《存拙斋札疏》，亦有“三教”云：

《北周书·武帝纪》：“建德二年二月癸巳，集群臣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为次，佛为后。又《韦夬传》：“武帝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诏夬辨其优劣”，“夬著《三教序》奏之”。予按：“三教之称当始此”。

《札疏》以“当始此”，正《小笺》之“始此”；一个“当”字显示了扎实的考证功夫。经笔者查证，俞樾《茶香室笔记》有《三教》条，全文录入上引“三教”之说，并于《札疏》“三教之称当始此”下，加“按”云：“此亦罗氏说，乃自正《小笺》之误也。”由是，又可窥知俞樾硕学鸿儒而读书细心，为学一丝不苟，其勸勉后学，循循善诱，不吹不捧，岂后世专以“红包批评”欺世之“名家”“大师”所能同日而语哉！

我画《水浒》

III 周京新



周京新《吴用、李逵》

在小学、中学读书时，每到上自己不爱上的课，我就在下面给老师画像，而且必然把他（她）画成一个“坏人”。有一次被老师发现，把我和我画的“坏人”一并拎到了办公室，当我正心惊肉跳的时候，老师却捧着我的画哧哧地笑开了。从此我画“坏人”的瘾更大了。我感觉，这比画一本正经的“好人”有趣得多，画起来开心。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把人画得像“坏

人”的画叫做“漫画”，也是画里的一行呢。

在开始搞本科毕业创作之前，我鬼使神差地画起了《水浒》。在我看来，《水浒》的人物虽然也分着“好人”和“坏人”，但并不全是界限分明的，有的“好人”身上有“坏”的一面，有的“坏人”身上有“好”的一面，另有许多人物则是不“好”不“坏”的，所以正合我的胃口。最先，我画了一幅“智取生辰纲”。画到那些做配角的“坏人”或是不“好”不“坏”的人物时，感觉很顺手，效果也来得好。也许



周京新《水浒-33》

因为他们不是主角，不那么重要，画起来就没有什么压力。画到像晁盖、杨志这样的“好人”时，就比较拘谨，常常要反复修改才能满意。也许因为他们是主角，比较重要，画起来就会有压力。

漫画叫人发笑，往往是因为把好人好事画得“坏”，显得“丑”，却十分可笑而可爱，这时的“坏”和“丑”，其实是很真切的“好”和“美”。我想，人常常是在“丑”的时候才露出真相，才感动人，才更加显得美。所以，从开始画《水浒》的时候，我浑身涌动着的就是一股漫画情结，

一心要把《水浒》里的人物画得“坏”一些，“丑”一些，可笑、可爱一些。以至后来一动手画画，自己就总想笑，还常常对着画稿扮鬼脸、做怪样儿，《水浒组画》里的许多人物、道具的造型就是这么来的。其实，《水浒》中的许多人物都是因为可笑而显得可爱，再者，现在谁都没有见过八九百年前的宋朝人是什么模样，这就给我的杜撰、发挥留出了空间和余地。

不过，真正动手画的时候，我还是竭力想把《水浒》人物的感觉搞得“准确”一些，比

如，要把人物和场景的整个气息，远远地推到八九百年前的那个时间去。第一步要做的是，把各色人物的造型捏出来，我在速写本上勾了大量人物造型，从眼睛、耳朵、手指，到毡帽、箭袖、朴刀都反复琢磨，满意了一个，就圈定一个。第二步是将草图上的人物、道具和场景编排到正稿上去，从故事情节、画面构造、设

色制作、题跋用印到托裱格式，都一一推敲，进前一步，想后几步。到了第三步制作阶段，为了达到色彩浓烈的效果，层层罩染的确需要耐性和细心，但面对清清爽爽的正稿，我直感到轻松和惬意。那阵子虽然画得挺苦，但自我感觉特别充实，自己喜爱的创作题材、造型趣味和制作方法对上了号，整个过程就顺通畅意。



周京新《水浒组画-1》

有时，我觉得自己比影视导演还要“横”，演员、道具和场景全依自己的喜好生造，要他们咋样就咋样，想他们干嘛就干嘛，过瘾！

古装戏的水浒人物身上，虽然也会有“坏”的“丑”的、可笑而可爱的东西，但他们的服饰装扮和声形表演，都具有强烈的舞台装饰味道，看惯了戏的，总会以为水浒人物就是那般模样。而我画水浒人物，却无意再跟着家喻户晓的舞台戏剧后面走，我要把自己感受到的那些“坏”的“丑”的、可笑而可爱的东西，按照自己感觉到的画意造型一一塑造出来，并统统装到自己规划好的画面里去。我就是要标新立异，不落俗套。虽然这样做挺不容易，但这却令我刺激、兴奋，有了一种“当家作主”的快感！

二

从1983年至今，我的画作中一直没有间断过《水浒》题材。虽然这二十几年来自己的画路几经调整，从工笔重彩到水墨写意，从古代人物到现代人物，但《水浒》人物和故事总是诱我迭出新意，百画不厌。

回想起来，最初的十幅工笔重彩《水浒组画》是笑着画完的。在那三年中，我始终沉醉在诙谐情趣的游历之中，忘我动情，无所顾忌。《水浒》给了我一个精彩纷呈的艺术舞台，“野猪林”、“狮子楼”已然好戏连台，应接不暇；“豹子头”、“花和尚”个个神完气足，占尽风头。他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已然添满了油，加足了料，只要抓得住那只盛油装料的瓶口顺势抖动一下，就能让好情、好趣、好形、好画源源流淌，神采四溢。

记得定稿前，为了讨个如实的验证，我只身北行上了梁山，一心想要会一会“黑旋风”、

“豹子头”似的好汉，瞧一瞧“水泊寨”、“忠义堂”、“八百里水泊”。然而，此行可谓乘兴而往，扫兴而回，一条“好汉”也没会着，一里“水泊”也没瞧见。所幸，这一次失望，反而逼我坚定了“别无投靠，自立山门”的自勉，并在其后结交“绿林”、闯荡“江湖”的甘苦中悟得了一个道理：要将《水浒》人物故事服服帖帖地以自己的画法搞到一块，不可乱出招数，肆意胡为，亦不必拘泥考据，生搬硬套。一点一画，一青一赭，一形一态，一庄一谐，必须既点踏着书本的文脉，又施展开画法的路数，鱼与熊掌兼得。画中的笔、墨、形、趣，得由自己用心经营出像模像样的货色，而且还要经得住原著隐匿于字里行间、散布在人物周身的神形气象的核对。在我看来，任何一种创作题材，都会暗藏着与表现手法合拍入调的“板眼”，只是，它们往往狡黠游离，并非随手可以拾得，需要潜心着意地找到切入点，从那里去挖掘、去淘洗、去提炼，去一招一势、一板一眼地积蓄、清理、构造。或许，同一创作题材上各人积蓄、清理、构造的“板眼”都不相同，但我相信，入骨三分、正中下怀的“板眼”其实不多，所以想得到它就十分不易。一因自有一果，这大概正是机缘造化的公允之处。

我在决意将这条名家高手足迹密布的“老路”走到底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应该让自己“混”到“忠义堂”的人堆里去，与梁山好汉们厮守盘桓，交心结谊，装一腔“侠肝义胆”，染一身“绿林豪气”。这也是淘炼自家“板眼”的必修课目。我真切地感受到，这些令我着迷的“板眼”只藏在书本里就是死的东西，一旦拿到手上并用它敲打出精彩的节拍来，就活了。我时而将这种“纸上谈兵”的勾当也视为“深入生活”，心思在这样的“生活”里扎下了根基，长出了枝叶，结出了果实，才不枉此行，才理

直气壮。

《水浒组画》之后，我弃工从写，并陆续创作了《忠义堂人物全图长卷》、《水浒叶子一百零八图》、《水泊梁山组画》、《忠义堂巨幅立轴》、《水浒人物册》、《水浒人物线描80图》等等，至今案头牍尺纷纷，腹稿源源不竭。每每想到有这些精彩画题待我去演绎，就会摩拳擦掌，心里都痒痒的。不过，对于这样一种画前状态，我已十分谙然，并总爱有意识停住手熬它一熬，让它熬足精神、熬尽杂质、熬透味道了再说。而此时，我则沉浸在一种被滋养和补益的享受之中。

三

1983年开始画《水浒》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料想到，自己后来竟然能翻着花样、毫不厌倦地在这片“快活林”里盘桓了二十多年，真是缘分。虽然我时常正儿八经地提醒自己：“画《水浒》只是你耕耘土地里的一块自留地，不要顾此失彼哦。”但是我手里痒痒熬不住，不断地要钻到这片“快活林”里来过过瘾，因为，在这片奇妙无比的“快活林”里，我能得到的“快活”太多太多。如今，在享受许许多多精彩故事，交往形形色色鲜活人物的同时，我已然在这片“快活林”里张罗出了一块自己当家作主的小舞台，把《水浒》里那些既有的故事和人物当作生活素材和角色原型，用自己的笔墨语言操演起了添油加醋、节外生枝、无中生有、妙趣横生的各类节目……令我得意的是，武松、燕青、阮小二等诸位好汉待我不薄，对我导演的各类节目都十分地关照，但凡用得着他们，一准儿随叫随到，而且，任凭我将他们怎样妆俊扮丑、煽情逗趣，都十分配合地听从调遣，不辞辛劳，

不计得失，卖力气表演。和他们交往愈久，交情就愈深，诸位好汉对我导演的节目也愈加心领神会，一旦登场，也就越发地一个比一个出彩，一个赛一个有戏了。

有了这样一个任我自说自话的舞台，我便又有了一个可以自在地爱，自在地恨，自在地喜，自在地忧的大好天地！画《水浒》的感觉真好！好得令我时常暗暗窃喜——天助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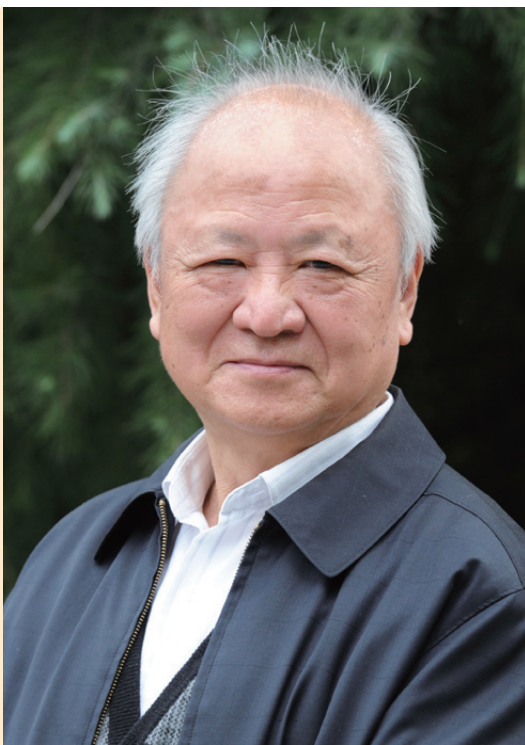
感谢施耐庵老先生留下了那么好的一部《水浒》，给我多姿多彩的笔墨生活配给了一片如此殷实而享用不尽的“快活林”。

周京新 男，江苏省国画院院长，艺术委员会主任。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国家画院特聘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美术创作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画作品多次在全国美展中获奖。

寂寞修正果 妙手绘众生 ——“刘振夏现象”解读

III 强亦忠

刘振夏，1941年生，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画学会理事。历任苏州市文联主席、名誉主席，苏州工艺美术职工大学校长，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市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苏州市委主委、江苏省委副主委。出版《刘振夏中国画肖像作品选》《情画未了》《刘振夏人物画集》《刘振夏水墨人物画集》等，曾应邀参加首届杭州中国画双年展，曾在苏州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



刘振夏近照

真是机缘巧合，去年我因公出差北京，正好赶上8月21日上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寂寞修正果——刘振夏水墨人物画展”的开幕式，作为刘振夏的朋友和“粉丝”，我感到十分幸运。

那次展览是在中国美术馆中央圆厅及两个侧厅举办的，展出约150幅作品。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开幕式之隆重，观众之热情踊跃，专家之不吝赞誉，在中国人物画界是不多见的。刘振夏的画再一次从苏州小巷走出，登上中国美术的最高殿堂，傲然挺立于中国人物画之林，得到了美术界和社会的广泛认同和称颂，真是可喜可贺。

我在开幕式上获赠《刘振夏水墨人物画集》和宣传册，在宣传册所加的编者按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在艺术品市场由“经济价值”逐

渐回归“文化价值”的调整期，聚焦、探讨“刘振夏现象”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广大读者、艺术家、艺术爱好者、市场从业者都会有所启示。

那么，我就以普通读者，或者一个处于初级阶段的艺术爱好者的身份，谈谈刘振夏从1980年代初隐退画坛至今，这30年来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哪些启示。

首先，他确立了一个必须为之终身奋斗的远大目标

刘振夏1962年从苏州工艺美术学校毕业时，已经打下了扎实的素描、写生功底。当时他就喜欢人物画，并在人物油画上初露锋芒。但今



《侧坐的水乡村姑》1985年

后的艺术道路到底该怎么走？他经过反复思考，左右权衡，结合自身条件，遂决定投身中国人物画的创作。可惜没过几年就遇到“文革”，他不仅停止了一切艺术活动，还因家庭出身问题遭到了很大冲击，受尽了政治迫害和精神凌辱，但他仍把艺术的理想埋藏心底。“文革”结束，平反昭雪，一下子把他的艺术创造力释放了出来。他创作了《渔婆》、《张寒月》、《乐趣》、《荷塘晨曲》等一批画作，声名鹊起，轰动一时。中国人物画名家方增先教授曾高度评价刘振夏的画：“一是人物生动；二是造型能力强；三是水墨技法表现力好”，进而夸赞：“如果说，刘振夏的造型能力比之古人高明而不算稀奇，那么，比之现代画家的优秀者，他是堪称优秀者的。”社会上的赞誉只是进一步增强了他的自觉性、自信心和责任感，他认为自己还可以画得更好，并立下宏愿：要为中国人物画“自立于民族之林”并“与西方人物画相媲美”而不懈努力，乃至贡献生命！于是他婉言谢绝了多个开个展和发表作品的邀约。为了彻底斩断名利场的诱惑，远离喧嚣社会的干扰，排除浮躁风气的影响，他和家人约定了“四不原则”，即“不发表、不展出、不卖画、不应酬”，下定背水一战的决心，隐居小巷，闭门谢客，甘守清贫，全身心地投入创作和研究之中，争取三五年能有新的突破。

但世事难料，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三五年的计划竟变成了三十年。人生几多三十年！从“不惑”到“古稀”之年，这一晃就是艺术生命的大半辈子。细细分析起来，一方面是完美主义的个性和对艺术追求好上加好的“贪欲”心使然；另一方面，作为杰出人才，画界看中他，政界也选上了他。1985年起，他先后出任苏州工艺美术职工大学校长，苏州市文联主席，民进苏



《渔婆》1980年



《乐趣》1982年

州市委主委，苏州市政协副主席等职，虽多为兼职，但政务的繁忙是可以想见的。他往往白天忙于政务，晚上关在画室，夜以继日，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非常辛苦。日积月累，身体就慢慢垮下来了，高血压、肺气肿等症状都出来了。我曾多次警告过他，不能再这样拼命了！他总是不以为然地回答说：我的时间不多了，没有办法。他是在和时间赛跑，用生命拼搏啊！这就是“刘振夏现象”的核心——“刘振夏精神”。

有人对他涉足政坛表示惋惜，否则也许他的艺术成就会更大。但我不完全同意这样的看法。因为一方面作为知识精英，也是社会的一员，组织信任你，群众推选你，你就要有社会担当，要尽社会责任，就要有无私奉献的精神。且不要说他的政治业绩可圈可点；就他的艺术成就而言，也不能说与政治毫无关系。好的人物画家离不开对社会的研究，和对人性的理解，他的政治身份和艺术角色是重叠在一起的，不可能白天投身政治，关注社会，晚上“躲进画室成一统”，变成了“绘画呆子”。他积极向上的态度，犀利独到的眼光，捕捉画题的精准，开掘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刻，总比别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这与他的政治素养是密不可分的。我认为，他的天赋、勤奋，包括政治素养在内的品格，远大的目标追求和执着的探索精神，五者结合才成就了今天刘振夏画艺的辉煌！

其次，他在中国水墨人物画的艺术探索上实现了新的突破

去年元旦看过“首届杭州中国双年展”中刘振夏的画作之后，曾激起了我写一篇观感的强烈愿望，题目都拟好了：《从渔婆到鹅公》，但我虽感觉到与《渔婆》（1980年）相比，《鹅公》

（指《阳澄湖畔牧鹅人》，2007年）等一批画作有了新的突破，但到底好在什么地方，一时说不清楚。这次，我有《画集》在手，可反复研读，包括方增先写的序和几位名家的评论文章，还请教了刘振夏本人，才逐渐弄清了其中的一些奥秘。

我觉得，作为普通读者，要看懂水墨写意人物画，就要在“读意”上下功夫，也就是要解读画家“写”的是什么“意”，他使用什么方法来“写”所立之“意”。方增先在画评《寂寞修正果》一文中指出：“优秀的人物画家不仅仅具有文人画家那样‘随笔生发趣味，巧写胸中逸气’的能力，而要在看似随意而又酣畅的笔墨中，把握严格的布白和复杂的形体，体现画面完美节奏和传神达意的效果。那就必须在长期刻苦练习当中才能慢慢达到。这就是‘功夫’，中国人讲‘功夫’就是既准又狠，下笔到位。我从刘振夏的画里看到在深入严谨的结构下，外松而内紧，一气呵成，达到下笔如有神助的境界。”这段话既是对刘振夏人物画的艺术分析和高度评价，也为读者读“意”赏画指明了方向。就拿《渔婆》和《鹅公》来说吧，这两幅画都是江南水乡农民朴质、敦厚的形象，都具有江南浓郁的乡土气息。但《渔婆》带有女性的温柔，《鹅公》则显示男性的刚毅，而两者更大的不同反映在笔墨的技法和意韵上。《渔婆》是刘振夏1980年代的巅峰之作，但多少还有素描的痕迹，用笔还显得有些稚嫩拘谨，不够果断坚决。而到了《鹅公》就不一样了。首先，人物形象彻底摆脱了模特的拘束，完全是靠平时观察积累而孕育塑造出来的，早已成竹在胸，因此用笔果断老辣，下笔准确到位，笔墨语言更丰富，笔墨意趣更加酣畅。再看《慈祥的岳母》和《瑞宝》这两幅画。前者从亲切的微笑、慈

善的目光到庄重的体态，表达了作者对岳母敬重的情感，因此用笔细腻，谨慎；而后者画的是患难与共几十年的夫人，作者怀着一种怜惜、感激的心情，突出了爱妻的朴实、持重、勤劳和沧桑，笔墨苍劲而凝练、浑厚而华滋。如果说，画家先前谈过的几次恋爱因种种原因未能成功是他的不幸的话，那么最后找到了农家女瑞宝，在常熟水乡来远桥互表心迹，许诺终身，那就是画家的万幸了。因为这不仅是在他最困难、苦闷的时候得到了家庭的温暖，精神的慰藉，而且还在今后几十年艺术探索的艰辛道路上得了夫人全心全意的支持，无怨无悔的帮衬，她默默无闻地守护着默存斋（画室名）的宁静。如果没有这些，也许就不会有画家今天的成就。所以在《瑞宝》中画家才会用如此独特凝重的中国画笔墨来表达如此厚重的情感。正如画家在题诗中表露的那样：“年年忙碌伴人劳，日日辛勤手似樵，莫道妻原庄稼女，炎凉识得来远桥。”

中国水墨人物画的技巧，无论是线条画法（长短、粗细、曲直、刚柔），水墨运用（浓淡、干湿、皴擦、渲染），还是布局章法（疏密、虚实、繁简的对比、呼应和节奏的变化），都需要勇于探索，不断实践，才能驾驭自如；都需要大胆创新，不落窠臼，才能实现突破。就拿墨的浓淡来说吧，刘振夏告诉我，光墨水由浓到淡他就调制了五六种之多，此外，从笔尖、笔肚到笔根，墨的浓度也不一样，具体运用起来全凭感觉，其难度可想而知。他坦承，自己在探索中也走过一段弯路。曾有一段时间，他想运用偏向制作的方式营造效果，从而背离了中国画的写意精神，那段时期绝大部分的画作都被销毁了。这也是我们展览中较少看到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末画作的原因。



《红樱桃》2001 年

纵观刘振夏隐居 30 年间的变化，其在水墨写意人物画上的突破与创新，既反映在“写”（书形写体）上，更反映在“意”（传神达意）上。他打通古今，融会东西，继承和发扬“以形写神”、“神形兼备”的中国画优良传统，努力追求造型结构与中国笔墨相结合，写实与写意相结合，以写意精神塑造人物的艺术形象，渗透意韵，孕育意趣，营造意境，把中国水墨写意人物画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你看那幅《寒山



《阳澄湖畔牧鹅人》2007 年



《降龙尊者施法图》2010 年

拾得》，两个僧人一胖一瘦，一坐一站，一仰一俯，一问一答，问者满腹疑惑、满脸愁云：世间有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骗我者，如何处之；答者满脸笑容、胸有成竹：只要忍他让他避他由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构图简洁，笔墨洗练，节奏明快，线条流畅，画面生动，一气呵成，达到了意到笔随、得心应手、妙趣横生的境界，有一种吸引人、打动人的力量。这就是“刘振夏现象”的本源所在。

第三，他开拓了中国水墨写意人物画的新天地

去年 8 月的画展，从刘振夏几十年来创作的几百幅作品中挑选了近 150 幅，《画集》又从中精选了 65 幅，分成“远去渔歌”、“西北风情”、

“难忘印度”、“古风传奇”和“朝夕采撷”五个部分，1980 年代隐居前的作品仅为 14 幅，其中 13 幅属“朝夕采撷”，其余绝大部分作品为 21 世纪的新作，从中认真分析比较，可以看出画家对水墨写意人物画所作的开拓。

一是人物画题材的开拓，由以前主要画江南水乡农民的形象拓展到北方农民的形象（“西北风情”），地域特色十分鲜明，人物“味道”迥异；由主要画现代人物拓展到古代人物（“古风传奇”），写意风格特别突出，使人过目难忘；由主要画汉族拓展到藏、维等少数民族（“西北风情”），民族特色非常显著，让人陶醉；由主要画中国人拓展到画外国人（“难忘印度”），异国风情浓郁，令人倾倒。他的这一大批题材不同的画作，不仅开拓了他的创作空间和视野，也展示了他捕捉选题的敏锐性和驾驭题材的超

强能力。

二更重要的是对人物画经典力作的拓展。如果说1980代初期,《渔婆》是刘振夏的一幅经典力作的话,那么由于题材的拓展,成就了刘振夏一批经典力作。刘振夏善于抓住人物的特征,突出人物的个性,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因此塑造的人物个个鲜活生动,性格各异,神采飞扬,特色鲜明,毫不类同。他不仅善于发现美、捕捉美,而且善于用不同方式呈现美、升华美,既有源于生活本真的形态美,又有运用艺术手段的笔墨美,更有倾注画家情感的神态美。在运用艺术手段上,他调动笔墨的各种技巧在不同的表情和体态上狠下功夫,特别是抓住人物眼睛的描绘,凸现人物的不同性格,起到“画龙点睛”的奇特效果。你看那罗汉愤怒的目光(《降龙尊者施法图》),钟馗威严的目光(《神威》),转经老嫗虔诚的目光(《祈福》),陕西老汉幸福的目光(《山沟沟里果儿红》),印度少女羞涩的目光(《妙语》),印度耍蛇艺人专注警觉的目光(《街头蛇舞》)……无不符合人物的身份,突出了人物的性格,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还有头发(如《祈福》等)、胡须(如《修行者和神牛》等)、手(如《大漠鼓乐》中三十个维族同胞那一双双千变万化的手)等的画法。在刘振夏的经典力作中,往往是笔墨技巧熟练驾驭与创作激情饱满迸发处于最佳结合状态下的妙手偶得,飞来神笔,达到了出神入化、难以重复的地步。

“梅花香自苦寒来”,如果说坎坷经历对刘振夏的磨砺是被动的的话,那么树立远大目标,设定“四不原则”,用生命去拼搏就是自讨苦吃了。他的吃苦的主要表现在勤奋上,一是勤于实践,他利用一切可用的时间,画了大量的素描、速写、草图,打下了扎实的艺术功底,积

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二是勤于观察,体验生活,直至古稀之年,从未停歇,使他的创作广接地气,有真切的体验和感受;三是勤于学习,不仅学习绘画知识,学习与艺术相关的知识,还学习其它科学知识,使他具有广博的识见和宽阔的眼界,这从他撰写的自传性著作《情画未了》的厚重和精彩足以得到佐证;四是勤于思考和总结,及时将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把握艺术规律,使他在探索的道路上具有持久的自觉性和自信心,少走弯路。“寂寞修正果”,由于刘振夏耐得住别人耐不住的寂寞,吃得了别人吃不了的苦,所以他才能修得别人难以企及的“正果”。这也是他之所以能不断超越别人,超越自我,创造“刘振夏现象”的奥秘所在吧!

艰难跋涉,走向辉煌,刘振夏的艺术道路是崎岖曲折的,他也经历了如国学大师王国维所描述的做学问的三种境界:经历了“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那种寻寻觅觅、路在何方的困顿和迷茫,经历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那样的辛苦和坚持,最终才迎来了“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喜和惊艳。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画作传播的普及和研究的深入,他的艺术地位和价值将会得到更高的评价和推崇。

强亦忠 男,苏州大学教授。

南京：两座洋楼的延续

三 贾梦玮



原江苏省咨议局大楼的“莎式屋顶”

在南京、在中国，没有哪座楼能像这两幢楼那样见证、延续了南京甚至中国的近现代史。它们是最早一批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西式官府建筑，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天灾人祸，由晚清而民国再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们竟然都几乎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历史因此不再仅仅在纸上、在传说中。它们是屹立的历史，是流淌不断的血脉。我有时是看到它们，有时是想到它们，恍惚之间，它们竟是两个人——他们是那么苍老，饱经沧桑；可又是那么年轻，血气方刚。有时为他们感到振奋和骄傲，有时因它们而气馁和颓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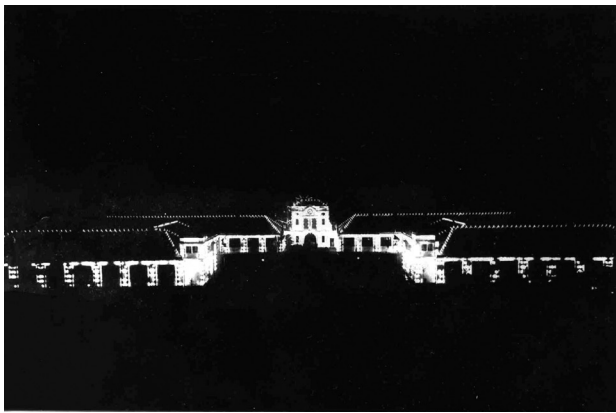
上世纪初，中国的大门已经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清朝末代的统治者和士大夫已被迫“向西”。以建筑为例，连新盖政府建筑都常取西式，甚至以此为时尚。清末两江总督在辛亥革命的前一年在南京建造的这两座楼，都是西式：一座是端方时期的“江苏咨议局大楼”，不久被用为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一座是张人骏时期的两江总督府西花厅，后用作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办公室。一为议会，一为政府，是由大清而民国改朝换代的标志。都说清政府如何如何保守，顽固不化，其实也不尽然；特别是在东南地区，欧风美雨已经刮了不少年，“淋”了很多年，朝廷的命官也不都是榆木脑袋，铁板一块。

江苏省咨议局——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

1910年，南京玄武湖往西不远，那时还比较荒凉；但就在此处，一座法国宫殿式的“洋四合院”不久拔地而起，全城为之轰动。这新鲜玩意儿是苟延残喘的清王朝预备立宪的产物，当年是“江苏省咨议局”大楼。

1906年8月，慈禧根据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的建议，仿效西方君主立宪，下诏实行君主立宪；1907年在中央筹立资政院，在各省筹设咨议局。1909年（宣统元年），江苏先是成立了江宁咨议局和苏州咨议局，不久合并为江苏咨议局，状元张謇被推选为第一位议长（也是清朝江苏最后一位议长），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奏请朝廷准予建筑咨议局办公用房，张謇于是开始物色大楼的设计者。就像当时中国没有人知道咨议局究竟该如何运作一样，也没有人知道一座议会式的建筑究竟该是什么模样。张謇一生办学无数，这当然是锻炼学生展示才华的绝好机会。最后选中的是南通工程技术专科学校的毕业生孙支夏，其毕业时是测绘科、土木工科双料第一名。孙支夏以“大清国专员”身份，先到日本考察西方建筑；回国后，孙吸取西方议会建筑特色，设计了江苏咨议局办公大楼，法国宫殿建筑风格，这也是中国最早由中国建筑设计师设计的西式建筑之一。1909年开工，1910年竣工。这西式的“四合院”由四幢长长的洋楼围合而成，作内院回廊式，造型为法国文艺复兴式样，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前、后、进面阔均有十间，楼身清水墙面，镶着清一色圆拱形窗户，足有上百扇之多。正中间耸起一座高高的砖楼，四面各嵌一只西洋钟，钟楼的瓦顶呈穹窿形，和两侧对称布置的坡顶一样，都覆盖着草绿色的铁皮屋瓦，最顶端还围了一圈镂花的铁栏。这种铁皮方底穹隆顶最早出现于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时期，为当时的著名设计师孟莎设计，后成为流行式样，也被称为“莎式屋顶”。差不多两个半世纪后，这种样式终于被“借鉴”至南京。

“东南互保”后，“东南”特别是江苏已在全国占据了更加突出的地位，不仅经济发达、



首届南洋劝业会正门夜景，这是中国建筑物最早的电灯亮化场景之一。



摄于 1998 年

人文荟萃，而且展示出全面改革的势头，推动着立宪运动蹒跚向前。张謇是在籍状元，又是兴办近代教育、工业卓有成绩的东南名流，在皇权逐渐式微的情况下，对在朝、在野的社会名流和达官贵人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正是因为张謇等立宪派的不断呼吁与策动，清廷才作出了遣使出洋考察政治的决定，标志着清廷在政治上由保守转向开放和变革。朝廷 1906 年发布了“仿行宪政”的上谕，开始实行立宪的基本国策，国家由此进入了预备立宪时期，开启了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的大幕，使封建专制政治向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过渡成为可能，中国的专制权力第一次有可能受到监督。立宪派为此欢呼庆祝，江苏当时的场面尤为动人，张謇“感

动发奋，不能自己”，进而“奔走相庆，破涕为笑”。政治上的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动人力量。

1910 年，还有一件大事：首届南洋劝业会在南京举办，盛况空前，其主要地点就在江苏咨议局所在的丁家桥和三牌楼地区。“南洋劝业会”是清末规模最大的全国性博览会，持续了近五个月之久，除边疆省份外，各省均建有自己的博览馆，日、英、美、德各国也有展品与会，前来参观二十余万人次，展品十万余件，获奖展品五千余件。南洋劝业会的举办对“振兴实业，开通民智”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后来成为文化名人的鲁迅、茅盾、叶圣陶、郑逸梅等等都曾辗转到会参观，并为之震撼。由于是多国参展，那时的南京（江宁）已经有了国际化的色彩。张謇作为东南绅商的领袖，又是江苏咨议局议长，利用南洋劝业会之机，与美国实业代表团开展了“中美国民外交”。当年 8 月 22 日，咨议长张謇在咨议局大楼宴请参会的美国实业代表团一行。张謇所看重者，不仅在实业、教育，尤重在政治改革，想必这也是他在创办实业和教育过程中的切身感受：政治制度不改，其他一切改革都将流产；所有弊端都可以在政治体制那里找到根源。选择在江苏咨议局宴请美国实业代表团，也可见张謇的良苦用心：南洋劝业会应不仅局限于经济的合作与交流，而且希望通过工商界的对话交流、参政议政，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美国人也似乎看出了里面的玄机，美商代表朋汉（George Burnham）在答谢辞中说：“中国政治进步日著，必以民造咨议局为代表，江苏咨议局尤属首屈一指。深望咨议局他日与弗兰费亚（即费城，引者注）之自由厅相颉颃。”费城的自由厅我访美时曾专门去看过，小得很；厅中的自由钟与中国的煌煌巨钟相比，就是一铃铛——但它却是美国自由民主的源头之一；

那些宏伟的、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当的东西只有在专制之下才能造出来。

当时的《申报》也曾刊登《劝业会与立宪》：“国民之政治责任心必后于经济竞争心。唯因经济竞争心之发达而政治责任心常不知不觉之间增进而未有已。故在今日欲引起国民之政治责任心，必不可不先引起国民之经济竞争心。劝业会之作用在招致全国之物品萃以一堂，以比较优劣。因比较之故而竞争之心乃生。”（1910年1月7日）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省、特别是东南地区纷纷响应；12月3日，江苏省议会在原江苏省咨议局内成立；12月29日，全国响应辛亥起义的17个省份的代表聚集在江苏省议会会议厅内，宣布改朝换代，国号定为“中华民国”，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1912年1月28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在江苏咨议局旧址办公，并举行开幕典礼，首任议长为林森。南京与北京之间虽然相距遥远，但南京发生的事情对北京的震动是巨大的，2月12日，清帝及两宫太后在内外交逼之下颁诏退位，民国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第二天，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举荐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政府大总统。2月14日，孙中山亲临议会辞职，并得允许。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11日，临时参议院通过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现资产阶级民主的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4月1日，孙中山再至参议院行解职礼；次日，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4月29日，临时参议院迁至北京。半年的时间，在这座法国宫殿式的大楼里，古老中国翻天覆地。

但这次“迁都”并没有开启太平盛世，清朝拱手让来的民国依然只是蓝图，而且几乎是

混乱的蓝图，世事甚至变得更糟。中国人在血雨腥风又过了15年，终于迎来了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改称“北平”。15年前参加南京临时参议院开幕礼的一批人如蔡元培、胡汉民等，又加上了一批新人如蒋介石、何应钦等，又来到这座大楼，参加国民政府在这里举行的定都南京典礼。此后，这里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办公地，大门牌坊上“中央党部”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

18年后，孙中山又回到这里，不过这次回来的是他的灵柩。孙中山在这里缔造了民国，国民政府为他举行的奉安大典选择在这里举行。1929年5月28日，孙中山灵柩由北平西山碧云寺运抵南京后，国民政府在中央党部设置了灵堂，进行为期三天的公祭。除了中国国民党及社会各界代表到灵堂祭拜外，另有18个国家的专使及罗马教皇特使致祭，蒋介石等孙中山的追随者以及孙中山的亲属轮流守灵。1929年6月1日凌晨举行起灵典礼，狮子山炮台鸣礼炮101响，灵柩沿中山大道归葬中山陵。从1912到1929，是一场就职典礼到一场葬礼的距离，也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从宣告诞生到完成国家统一、开始走上国际舞台的漫漫历程。

24年后，以孙中山传人自居的汪精卫，也是在这里被人射入那颗最终让他毙命的子弹。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中央党部举行开幕式。开幕式结束后，中央委员们走出大礼堂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合影，据说蒋介石感到现场秩序混乱而没有参加，汪精卫因此坐在第一排正中，在第一排就座的还有林森、戴季陶、孙科、阎锡山、张学良、张继等。摄影完毕，正当委员们转身走上台阶时，晨光通讯社的记者孙凤鸣从大衣口袋里掏出手枪，向汪精卫连开三枪，汪精卫应声倒地，场面大乱。

据记载，当时是立于汪精卫声旁的张继迅速奔到袭击者身后将其拦腰抱住，随后奔过来张学良飞起一脚将孙凤鸣踢倒，汪精卫的卫士连开两枪，致孙凤鸣重伤，第二天凌晨殒命。汪精卫后来虽然暂时保住了性命，但射入背肋间的一颗子弹始终未能取出，多年后因其发炎，于日本不治身亡。

南京沦陷期间，这里成为汪伪军事训练部、侨务委员会、边疆委员会、社会部、军政部等机构所在地；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回办公。1949年4月23日，共产党的军队占领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在这里当然就成为了历史。

这座建筑原来编为丁家桥16号，现在的门牌号码为湖南路10号，为江苏省军区司令部，主体建筑大体保留了原来的模样；只是1949年以后因扩建道路，拆除了大门牌坊和大门口的弧形照壁。因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不出意外的话，这座100多年前的法式建筑还会存在下去，历史的活剧还会在这里上演。

两江总督府西花厅——临时大总统办公室

也是在辛亥革命的前一年，南京两江总督府（后来的总统府）里面也建起一座西式的楼房，法国文艺复兴样式，在一大片中式大屋顶的房子中间，特别醒目。因在总督署的西面，又称西花厅，设计者已不可考。建造者是清朝最后一任两江总督张人俊，他是张佩伦的侄子也是张爱玲的叔伯。在完全中式的大院中，这西式的房子完全是新鲜玩意儿。人其实都有“喜新”的一面，两江总督府的许多重要活动都选择在这里举行。孙中山在丁家桥16号临时议会（江苏咨议局旧址）就任大总统后的第一次内阁会

议就是选择在这里举行，两江总督西花厅成了临时大总统府。临时大总统府北迁后，这里是南京留守府，北洋政府时期是江苏都督府；国民政府时期也曾作为蒋介石的办公室、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总统府军务局等。由于后面的这些辉煌历史，大多数人已经忘了它的建造者。

世纪之交的南京，已有不少西方人在南京居住，既有传教士、外国公司派驻南京的代表，也有水师学堂和陆师学堂聘请的德国教习、基督学校聘请的外国教员等，张人俊作为地方最高长官，和其中不少人有交往，基督医院（又称马林医院，今鼓楼医院的前身）的加拿大籍传教士兼医生马林等甚至是他的朋友。张人俊选择建造西式房屋，并不奇怪。西方人在南京，不仅影响着建筑风格的选择，也影响着生活习惯、教育理念甚至文化取向，当然这也是与张人俊相对开明的态度分不开的。

但是好景不长，随着辛亥革命的兴起，由同盟会组织的江浙联军打到江宁城下。“战”已不可能胜，“降”又与他的道德理念相违背，只好选择“跑”。张人俊先是请马林这位洋人医生朋友出城跟革命军说和，赢得了时间，最后是用箩筐从南京城墙上缒下去，逃到长江上的外国军舰上，到上海做了寓公，后流寓青岛，晚年在天津定居。张爱玲在《对照记》里回忆说，她小时候在天津，“二大爷”（即张人俊）每次听她背诵“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时，总会流泪。亡国之臣的他，多情伤故国，掉眼泪是可以理解的。

张人俊（1846—1927），字健庵，取“人中骏马，驰骋千里”之意。历任山东布政使、漕运总督、山西巡抚、两广总督等职。由于他在担任两广总督时曾乘坐兵舰巡视南海诸岛，宣示主权，中国政府公布的南海诸岛中有一块岛



南京总统府景区内的临时大总统办公室（吉强 摄）



清两江总督张人骏

礁被命名为“人骏滩”。1909年改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七月农工商部奏议在南京筹设南洋劝业会，树各省之模型，会长是张人骏，开幕时他亲任主持。

或主动或被动，张人骏也是清末最早开眼看世界的人之一。在清末君主立宪筹备之际，张人骏曾上过三次奏折：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两广总督张人骏奏广东设立咨议局筹办处情形折》，又于宣统元年二月二十九日《奏广东第一年筹办宪政及第二年开办各事情形折》，再于三年七月二十五日《两江总督张人骏奏厘定外省官制宜以旧制为本量加损益折》。曾提出五则：一曰督抚权限（1为奏事权，2为军政权，3为外交权）；二曰司道分合；三曰道府存废；四曰审判办法；五曰地方自治实行监督，颇有创见。民国中期掌故大家徐凌霄、徐一士兄弟所著《凌霄一士随笔》载：“清末督抚中，张人骏以恂悞无华，端重老成著，不随波逐流，迎合风气。历督两广、两江，均大疆繁剧。时髦政客屡攻之不能动。固以久为循吏，资望较高，

而鹿传霖重其廉正，引为同调，在枢府中时加维护，极言其贤，其见信于上，不易动摇，亦多赖是也。庚戌七月，鹿卒于位，张挽替联云：‘溯太公急难以来，忠节相丞，名德有达人，特钟圣相；自先帝登遐而后，台衡代谢，中原正多故，又丧老成。’以圣相称之，亦见气谊相投。”

1917年，张勋复辟时，授张人骏为协办大学士，他拒不受职。张人骏与袁世凯曾是盟兄弟，后来成为儿女亲家；但是老年之后，因与袁世凯政见不合而“老死不相往来”。袁世凯称帝之后，为了“不肯与袁同在一个城市”，张人骏甚至从来不去北京。张人骏的理念是“食君之禄，当报王恩”，对于袁世凯连番背叛朝廷，先当大总统，又称洪宪皇帝的做法极端鄙视。

张人骏还是近代教育的支持者。1905年，山西巡抚张曾扬在令德堂书院旧址创办了山西省第一所官立师范学堂，这是我国最早的六所新式官立中等师范学校之一。起初，由于资金困难而举步维艰。第二年张人骏到任后，马上为学堂筹拨巨款，使校舍条件大有改观，规格

大幅提升,管理日趋完善,师资力量增强。学校聘有中国籍教员十人、日本籍八人、英国籍一人。当年招收学生 220 名,毕业 165 名,这些毕业生全部被派往全省各县高等小学校担任教员,成为近代教育的星星之火。此校为太原大学外语师范学院的前身。1908 年,张人骏委派留美归国的康乃尔大学农学博士唐有恒负责规划筹建广东全省农事试验场及其附设的农业讲习所,1910 年 4 月正式开学。其办学宗旨是:培养近代农业技术人员,为推广农学新理新法,普设州县试验场储备人才。农业讲习所成为我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开始,也是华南农业大学的前身。1907 年 7 月,英国人卢押到香港就任港督后,号召社会人士热心教育,集资捐建香港大学。在捐献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两广总督张人骏慨然捐出 20 万元,成为第二大捐款个人。正是有了张人骏的带动作用,捐款资金才源源而来,直到 1912 年 3 月 11 日香港大学开学,共收到捐款 147 万多元。同时,张人骏还出资在港大设立了 25 个奖学金(每年每人 300 元广东币),远远多于孙中山 1915 年在港大设立的 5 个奖学金,成为香港大学的奠基人之一。

张人骏在道德上堪称楷模。他一生不纳妾,也不许家中子弟纳妾。蓄养婢女虽然不绝对禁止,但各房使用婢女很少。袁世凯的长女嫁到张家,也是一个婢女都没有。张人骏不允许子弟吸鸦片。他从不办大寿,家中禁止赌博,唱戏也被视为不屑之事。张人骏的孙子张象耆回忆祖父说:“一家人大有过着清教徒生活的味道,他本人晚年在天津,除了每天写写字外,诗酒风流的事是没有的。因此他不是一个过潇洒生活的逸老,而是一个典型的旧式正人君子。”

晚清时期,中国遭遇亘古未有之巨变,内忧外患,有识有权如张謇、张之洞(曾任两广

总督、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刘坤一(曾任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张人骏们,内外兼修,大力创办民族工业,废科举创办大批新式学堂,推动君主立宪,中国特别是东南地区确有颇有生气的一面,中国人正努力从“旧”中走出来,虽然“新”尚不明朗。他们恪守为臣为人的理念,做了他们自己所能做的,对国家对民族多有贡献,我们实在不应苛责古人。中国曾经是一个敬老的民族,但是在经历过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重创之后,凡中国“老”的东西包括“老”人,都成了坚决革命的对象。因此在张之洞、张人骏一代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后,有了“全盘西化”的提倡。姑且不论“全盘西化”的是与非,作为中国人,“全盘西化”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与顽固守旧派相比,与张勋、袁世凯出尔反尔的复辟相比,甚至与盲目革命派相比,恪守传统道德而又务实求进的他们确有其可贵、可敬之处。即使在今天看来,张謇建起的江苏省咨议局、张人骏建起的西花厅,仍是南京最西化的建筑,在杂乱无章的民房中间,在一片大屋顶的中式大院里,扎眼而明亮。至少是在建筑风格上,张謇、张人骏们的西化力度超过了后来的人。“恋旧”和“喜新”其实是人的本性之一,残酷的现实更迫使晚清的重臣和有识之士不得不向“西”、求“新”。关键是如何“新”——这永远是摆在每个民族面前的课题。只知道革祖宗的命,而不去弄明白祖宗们曾经的努力(张謇、张人骏们的理想至今未曾实现),我们就不可能知道在何处着力。

我们的血管里流着祖先的血,而血脉是不可能被完全割断的。

贾梦玮 男,《钟山》杂志主编。

物铸藏史

——从文物看西藏与内地的密切关系

III 殷志强



文载史事，物铸史迹。

具有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珍贵文物，包含着大量的历史信息，是重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重要见证。地下出土、博物馆收藏、寺庙供奉的一件件西藏文物，既是西藏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西藏与内地紧密联系的重要纽带。

天珠的密码

西藏与内地的联系始于何时？这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十分关心的问题，一般认为始于唐代。但唐以前是否有联系，文献上没有明确记载，只能从考古遗迹与出土文物中寻找蛛丝马迹。

考古学家在西藏那曲地区申扎县多格则、日喀则地区定日县苏热、阿里地区日土县扎布等地点，均采集到了石核、刮削器、石片石器 etc 石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数量有数百件之多。这些遗址均在海拔 3500—5200 米间，表明在 5000 年前旧石器时代中晚期，雪域高原已有人类活动。西藏东部澜沧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较多，以昌都县卡若遗址为代表。遗址海拔



陕西咸阳出土西汉天珠玉石串饰



唐 阎立本《步辇图》



拉萨大昭寺内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塑像

3100 米，规模大，遗存丰富，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陶器、石器、骨器、饰品等器物，以及房屋、烧灶、粟粒、谷灰、动物骨头等遗存，说明在 4000 年前已有较多人类在此生息繁衍。考古学家认为，卡若遗址出土的干栏式建筑、贝饰品表明，卡若文化与南方原始文化已有过交往，因为干栏式建筑、贝饰品最早由南方先民发明使用。

进一步的证据来自内地出土文物。2000 年 5 月，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马泉镇发现了 3 座西汉古墓。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清理，发

现了较多的文物，其中有一件串饰，文物工作者将其命名为“玉水晶玛瑙琥珀琉璃串饰”，但没有指出其中有天珠，说明当时没有人认识天珠。其实，位于串饰左侧带有白色条纹的柱形珠，就是天珠，当为雪域高原特有的天然两眼珠。2012年初冬，笔者在咸阳博物馆看到了这串玉石饰，兴奋之情难于掩饰，因为同年仲夏笔者在西藏亲眼目睹、反映观摩、精心购藏的西藏天珠，竟然西汉先民就视为珍宝了，好似自己意外获得了一件宝贝。出土天珠的西汉墓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汉武帝茂陵附近，地位重要。埋葬于这一带的人，身份显赫。此天珠并非孤例，中原地区西汉墓中出土天珠还有数例。西汉时期西藏天珠如何到达中原地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当下还无法说清楚，应当与西汉时期扩大对西域的交往与控制有关，是其时青藏高原原住民与中原地区文化交流、人员往来的重要历史见证。

文成公主的功劳

公元七世纪初，西藏与内地开始真正进入密切联系期，演出了一幕幕雪域高原的历史剧，写下了一部部友好往来史。出生于墨竹工卡的松赞干布将青藏高原上的众多部落逐渐统一起来，建立了吐蕃王朝，这是藏族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政权，定都逻些（今拉萨）。松赞干布为了使吐蕃获得快速发展，采取了一系列内政外交措施，特别是通过政治和亲，松赞干布既获得了风情万种的异域美女，又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左右逢源，一箭双雕。635年，松赞干布派使者到尼泊尔迎娶赤尊公主为妃，获得了尼泊尔的佛像与工匠，并在拉萨玛波日山上兴建宫堡居住。同时松赞干布感到，位于亚洲

中心的文明富强的大唐帝国，是吐蕃发展不可或缺的依靠力量，于是屡次遣使向唐朝求娶公主。640年，唐太宗终于下旨，许宗室女文成公主嫁松赞干布。641年，吐蕃大臣禄东赞到长安迎文成公主去拉萨。唐朝大画家阎立本根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创作了《步辇图》，生动地再现了这一历史场面。《步辇图》以人物为中心，描绘出坐在步辇中的唐太宗，在众宫女簇拥下显示出的至尊风范与威仪，同时刻画出典礼官、禄东赞（中立者）、通译者三位娶亲宾客面对唐太宗时的谨小慎微、彬彬有礼的神态。画面对比强烈，神情生动，色泽绚丽，是中国最珍贵的名画之一，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唐高宗时，唐王朝又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从此确立了吐蕃对唐朝的臣属关系。707年，唐中宗又以金城公主许嫁给吐蕃赞普尺带珠丹。唐蕃“遂和同为一家”。（《旧唐书·吐蕃传》）

文成公主远嫁入藏，带去了许多内地的书籍、精致手工艺品、药材、菜种、蚕种，以及许多会酿酒、造纸、造墨、炼金的工匠。内地的历法、算学、医学、文学、音乐、佛教等在吐蕃广泛传播。茶叶也大量输入吐蕃。文成公主带来的汉族工匠修建了拉萨小昭寺，供奉她带到吐蕃的释迦牟尼佛像。她还协助赤尊公主修建拉萨大昭寺。

盛唐时期内地大量的文化艺术、能工巧匠进入吐蕃，不仅密切了两地联系，也促进了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交流始终是双向的，吐蕃的珍贵动植物、金银器、珠宝、药材也不断输入内地。唐代大都会长安的不少妇女还喜欢模仿吐蕃人在脸上涂赭色，时称“吐蕃妆”，在唐代人物画、壁画、陶俑中常见这类“吐蕃妆”贵妇。

国师玉印的权威

元代（蒙古）朝廷与吐蕃的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蒙古汗国在征服全国的过程中再次统一吐蕃。1251年，吐蕃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圆寂，临终时传衣钵给八思巴，八思巴继任为萨迦派教主。从此，八思巴成为吐蕃与蒙古汗国、元代朝廷密切联系与合作的重要人物、关键人物。1252年，忽必烈与八思巴在甘肃六盘山进行了历史性会面，双方就佛教和藏族历史进行了广泛交谈。八思巴深得忽必烈的信任与尊重。今西藏日喀则德钦颇章宫，还绘有反映这一历史事件的壁画。

1260年，忽必烈即蒙古大汗位，成为蒙古汗国的最高领导人，封赐八思巴为国师，并赏玉印。玉印呈方形，边长11厘米，高8厘米，青白玉质，上雕蹲龙纽，雕阳文“国师玉印”，用的是蒙古新字八思巴文刻成。1269年，八思巴抵达元大都，献所制蒙古新字。1270年忽必烈再次接受八思巴灌顶，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大元帝师，再赐玉印。自此，元代朝廷都尊奉吐蕃高僧为帝师，从国师、灌顶国师、大元国师、到帝师、大元帝师等，尊号不断增高。

元代帝师是佛教的最高领袖，统领全国佛教，还是吐蕃的最高政教首领，掌管吐蕃军民世俗事务。朝廷常以赏赐玉印的形式给吐蕃高

僧授予尊号。目前所见元朝所赐重要玉印还有“大元国师”白玉印、“统领释教大元国师”青玉印、“灌顶国师之印”、“桑杰贝帝师”白玉印、“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等，大部分收藏于西藏博物馆。所赐玉印，圆雕蹲龙纽，是当时最高等级的玉印。方方玉印，是坦诚相见的信符，是至高无上的荣誉，更是权威、威严的象征。

元朝除委任帝师对吐蕃地区统治外，还在中央专门设置宣政院，行使对吐蕃事务的直接管理权。元初任命八思巴统领宣政院事务，职位很高，权力很大。八思巴成为元代朝廷级别最高的吐蕃高僧。从元代开始，西藏地区正式成为我国行政区划的一部分，西藏社会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阐化王象牙印的份量

明代称西藏为乌斯藏。

明代基本上承袭了元代在西藏地方的行政设置和政教制度。政府与其往来更密切，对其关注更全面、措施更扎实，进一步拓展了内地和西藏地方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联系。

明朝政府为了加强对西藏的统治，封授西藏高僧官职很多，前后册封大宝法王、大乘法



1260年忽必烈赐八思巴“国师玉印”



“国师玉印”印文



“灌顶国师阐化王印”印文



“灌顶国师阐化王印”象牙印



承德“小布达拉宫”

王、大慈法王“三大法王”，以及阐化王、护教王、赞善王、辅教王和阐教王“五王”。法王是最高僧官，但无固定封地；其它五王均各有封地，分别统辖一定区域。这实际上是明朝廷采用内地“藩王”分封制方式加强对西藏管理，不同之处，内地分封给宗室成员，西藏分封给宗教领袖。

1403年，明成祖朱棣即位不久，闻悉藏传佛教噶举派第五世噶玛巴活佛却贝桑波（《明史》称哈立麻）道法甚高，遂遣司礼少监侯显前往迎请。1406年却贝桑波来到南京，明成祖在城内和灵谷寺建造营盘式住地，供其一行居住。却贝桑波率领僧众先后在南京灵谷寺和山西五台山设普渡大斋，为高帝、高后“荐福”。由于“多有灵瑞，帝大悦”，故赐予“如来”名号，封其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自在佛”，统领天下释教，并赐玉印等宝物。此玉印，扁方形，边宽13厘米，高9厘米，新疆白玉质地，双蹲龙纽，现藏西藏博物馆。此后，历辈噶举派噶玛巴活佛都被明朝封为“大宝法王”，成为当时藏传佛教领袖人物中的最高封号。这个封号一直沿用到现在

的第十七世大宝法王。

西藏博物馆还藏有一方阐化王象牙印，在众多中央朝廷赏赐印中别具一格，罕见其类。印呈正方形，边宽4.5厘米，通高8厘米，印文两行，行四字，为九叠篆书“灌顶国师阐化王印”八字。双盘龙印纽，以覆莲和缠枝纹作龙座，色泽自然，雕刻精美，保存完整，为1563年明嘉靖皇帝赐封西藏阐化王之印。阐化王是明朝朝廷敕封西藏地方帕木竹巴政教首领的世袭封号，原是永乐四年（1406年）封帕木竹巴第四任教主吉刺思巴监藏卜的爵号，为“明封八王”之一，历代赐有玉印、象牙印等。明代分封王位的继承必须经皇帝批准，遣使册封，新王才能即位。

承德藏式庙的承载

1644年，清王朝取代了明王朝，清朝中央政府更大力度加强了对西藏的管辖，设立并派出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管理、监督西藏地方行政；推行“金瓶掣签”制度，规范“灵童转世”程序；由中央政府敕封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1793年，清乾隆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

程二十九条》，对西藏宗教、外事、军事、行政和司法事务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从此，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走上了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清初称西藏为“卫藏”，“卫”即“前藏”，“藏”即“后藏”。后来清政府正式定其名为“西藏”，缘因位于中国西部，同时也有前后藏加强联系、融合团结的意思。

随着清朝辽阔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边疆民族事务越来越多。同时，随着藏传佛教在民族地区影响越来越大，僧众越来越多，宗教事务也越来越多。为了适应这一变化的形势，清政府除了派驻封疆大臣外，还在清廷夏宫承德避暑山庄外大兴土木，建造寺庙，为前来的蒙藏上层宗教领袖进行瞻礼、膜拜、朝觐等活动提供场所。清政府先后于康熙、乾隆年间陆续建成外八庙，成为清政府处理边疆事务、宗教事务、接见宗教领袖的重要活动场所，它们见证了内地与边疆特别是与西藏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

1771年，乾隆皇帝为了庆祝他本人60寿辰和他母亲皇太后80寿辰，在承德建普陀宗乘（“普陀宗乘”是藏语“布达拉”的汉译）之庙。庙宇依山就势，逐层升高，气势磅礴，宏伟壮观，布局、气势仿拉萨布达拉宫，俗称“小布达拉宫”，是承德八大庙中规模最大的一座。

1780年，西藏政教首领六世班禅要来避暑山庄为乾隆70岁祝寿，乾隆对此极为重视，为了隆重接待班禅，特别仿照班禅所居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形式，兴修了须弥福寿之庙。乾隆在《须弥福寿之庙碑记》中写道：“布达拉既建，伦布不可少。”由于兴建此庙是为了接待班禅，所以又俗称“班禅行宫”。从此，承德既有“达赖行宫”，又有“班禅行宫”。

清代顺治、康熙、乾隆皇帝在北京、承德

举行了许多与西藏有关的重要政务活动。1653年，顺治皇帝敕封五世达赖，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的封号，授予金册和金印。从此，清代历任达赖喇嘛登基后接受中央政府金册金印成了一种定制。1713年，康熙皇帝敕封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正式确定了班禅喇嘛的名号。自此，达赖喇嘛在拉萨统治西藏的大部分地区（前藏），班禅额尔德尼在日喀则统治西藏的另一部分地区（后藏）。乾隆于1781年、1783年两次特赐八世达赖玉册、玉宝，两方玉宝现存西藏博物馆，均为白玉质，方形体，双龙纽，穿黄丝绳，保存完整。

金瓶掣签制度的由来

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宗喀巴是杰出的一位，他于明初创立了黄教格鲁派。格鲁派提倡学修并重、讲修并重的学风，戒律严格，虽是藏传佛教中最后兴起的一个教派，但一经兴起就迅速取代了其他各教派的地位，成为后期藏传佛教的主流教派。宗喀巴圆寂后，格鲁派以“活佛制度”解决掌教的传承人问题，他的两大弟子分别转世为“达赖”和“班禅”。

用金瓶掣签的方式认定藏传佛教最高等的大活佛转世灵童制度，于1792年由清乾隆皇帝



1956年毛泽东主席赠送达赖喇嘛的翡翠提梁壶



清金奔巴瓶

正式设立。1793年，清朝政府制定《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第一条就规定了金瓶掣签制度：“大皇帝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由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佛像前正式掣签认定。”

根据乾隆旨意，清宫造办处制作金奔巴（“奔巴”，藏语意即“瓶”）。查清宫《活计档》可知，当时清宫制有两个金瓶，一个送往拉萨，用以掣定达赖和班禅大师转世活佛；另一个供于北京雍和宫，用以掣定蒙古、四川、甘肃、青海等地藏传佛教区各大活佛之转世灵童。送往西藏的金瓶和牙签，现藏西藏博物馆。举行金瓶掣签仪式时，把金瓶、牙签从西藏博物馆护送到大昭寺，在释迦牟尼像前隆重举行确认转世灵童仪式。

现藏西藏的金奔巴，重78两5钱，敦厚庄重，由身和盖两部分构成，通体饰阴阳如意纹、佛字纹，瓶盖嵌白玉、绿松石、密蜡、珊瑚、青金石等藏族喜爱的玉宝石，益显华丽珍贵。金奔巴由乾隆皇帝亲自设计、亲自督造，工艺一一过问，流程一一指示，既体现了乾隆对工艺美术的精深造诣，又反映出清朝廷对金瓶掣签制度的高度重视。

苏州缂丝唐卡的技艺

唐卡是藏族特有的悬挂供奉的绘画艺术形式，题材神秘，用料讲究，色彩华丽，形式类似汉族的卷轴画，多画于布或纸上，然后用绸缎缝制装裱，上端横轴系有细绳便于悬挂，下端横轴两端饰有精美轴头。画面上覆有薄丝绢及双条彩带，既显庄重，又便保护。

唐卡源于吐蕃时期。据《大昭寺志》记载，



清苏州缂丝密集金刚像唐卡

吐蕃松赞干布在一次神示后，用自己的鼻血绘制了《白拉姆》像，由文成公主亲手装裱。明清时期，唐卡创作进入繁荣鼎盛时期，还涌现出了不少唐卡艺术流派。这一时期，随着内地与西藏关系的日益紧密，藏传佛教受到内地的接受与推崇，唐卡这一特色明显的艺术形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成为宫廷的重要收藏品。清宫佛殿中收藏的唐卡也越来越多，一部分由达赖、班禅呈贡，另一部分由内地艺术家创作，其中一幅清乾隆苏州缂丝艺术家制作的密集金刚像唐卡，弥足珍贵。

苏州缂丝密集金刚像唐卡，长100厘米，宽74厘米，画幅较大。画面由上中下三界构成。上界正中为端详坐佛，两旁为藏密高僧。下界为具有超自然力的护法神，左右把持。画界正中为密集金刚，为藏密本尊之一。密集金刚结

跏趺坐于莲台上，头戴五瓣冠，蓝、白、红三色面，六臂分持各种法器，主臂拥抱明妃金刚母。此幅唐卡造型严密，色彩艳丽，形象生动，由于采用了技艺难度极高的“通经断纬”缂丝工艺，画面层次丰富，产生立体视觉效果，犹如雕刻一般，是清乾隆时期苏州缂丝艺术的杰作。1781年，乾隆皇帝钦命三世章嘉活佛在宫内鉴定了这幅罕见的苏州缂丝唐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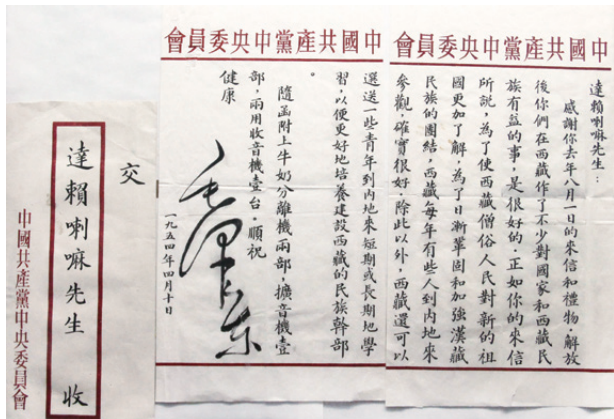
毛主席信函的诚意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7月，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张经武到达西藏。1954年4月，毛泽东主席致信达赖喇嘛。7月，达赖、班禅分别启程赴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9月，十四世达赖喇嘛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2月，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当选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西藏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1954年4月，毛泽东主席致达赖喇嘛信函全文如下：

达赖喇嘛先生：

感谢你去年八月一日的来信和礼



1954年毛泽东主席致达赖喇嘛的信（作者摄于西藏博物馆）

物。解放后你们在西藏作了不少对国家和西藏民族有益的事，是很好的。正如你的来信所说，为了使西藏僧俗人民对新的祖国更加了解，为了日渐巩固和加强汉藏民族的团结，西藏每年有些人到内地来参观，确实很好。除此以外，西藏还可以选送一些青年到内地来短期或长期地学习，以便更好地培养建设西藏的民族干部。

随函附上牛奶分离机两部、扩音机一部、两用收音机一台。

顺祝健康。

毛泽东 1954年4月10日

1956年4月，陈毅副总理率领中央代表团到达拉萨，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达赖喇嘛就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毅副总理带去了中央人民政府“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公章、毛主席送给达赖喇嘛的翡翠提梁壶等贺礼。

从政治安排、信函和贺礼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主席对十四世达赖喇嘛是无限关怀、无限信任的，寄予无限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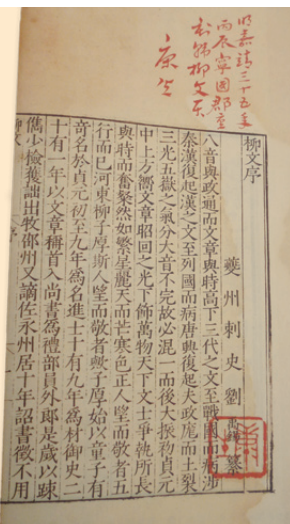
看不完的文物，说不全的历史，道不尽的故事。一言以蔽之，自古以来，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与内地联系非常密切，西藏的每一个重要变革、每一次重大进步离不开内地的政治关怀、无私支援与真心帮助。

祖国的强盛需要美丽西藏的稳定，西藏的繁荣需要伟大祖国的恩泽。

殷志强 男，民革江苏省委副主委，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特约研究员，著有《古玉鉴定通论》、《中国古代玉器》等。

十年浩劫中名家珍藏的“劫中劫”

III 徐雁



康生在古书上的图章和写在天头的眉批

曾经在神州大地上发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今将近半个世纪了，当年随着“红卫兵”破“四旧”行动而发生的若干文化上的“劫中劫”案，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湮没。在当前举国上下追求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社会氛围里，回忆当年向达（1900—1966）、阿英（1900—1977）等文化名家私人藏品被抄遭劫的一幕幕，触目惊心之余，或能起到以史为鉴、昭示来者的警世作用。

1980年2月29日，杨献珍（1896—1992）在致时任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匡亚明（1906—1996）的信中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包括你在内的许多老同志遭受残酷迫害，无情打击。我自己则是更早地（从1959年底）就开始受迫害打击。迫害打击我们的，都是那个古今中外历史上罕见的权奸康生，即被称为‘文革’顾问的‘狗东西’（他自己会刻图章。他是光绪戊戌年生，自己刻了一个‘狗’字图章。‘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派人到处抄家，把北京几家大藏书家的善本书都抄到他家里去了，他把抄到的每本书都印上那个‘狗’字章，

表示为他所有。北京故宫把他抄去的书籍、文物搞了一个展览，我参观过一次）。所幸我们经过这场浩劫，都能活过来了，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其中被杨献珍称为“权奸”，又一语双关蔑称为“狗东西”的康生（1898—1975），原名张宗可，字少卿，曾用笔名“鲁赤水”，出生于山东胶南县一个曾为名门望族的富裕地主家庭。在1966年，得到毛泽东的大力支持，与林彪、江青等相互勾结，成为积极推动“文革”的主要当权者之一。

康生以其家学背景和少时所受教育，于文物收藏与鉴赏甚精，擅长真、篆、隶、草四体书法，尤工章草和中国画，在中国传统文化鉴赏方面确有一定的艺术造诣。1980年夏，为昭示其“雅盗”的罪恶，在北京紫禁城的故宫后院的东宫，曾举办了一个康生非法窃占的珍贵文献、文物的“内部展览”，展品有宋、元、明各种刻本的《史记》、《汉书》，各种木刻版画插图本的小说、戏曲，以至《春宫图》等历代“禁物”，仅清代以来各种《红楼梦》版本就有69种（其

中精刻的“程甲本”是曹雪芹去世28年后的刻本，也是现存最古老、最珍贵的一个版本），计有12080册。此外，还有玳瑁化石、青铜器、唐代陶龟，及历代图章、名砚、碑帖等各种珍奇古玩古董1102件，陈列在几间大屋里。据林青山在《一个阴谋家的发迹史——康生外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说：“从法律的角度看，得到这每一件珍贵文物的手段，都可以称为‘文盗’，可以判十年、二十年，甚至无期徒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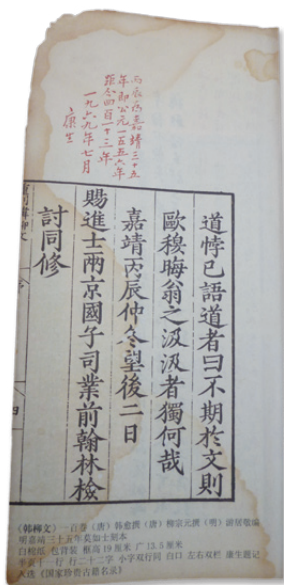
自1968年至1972年，康生先后到僻处首都北隅的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多达32次，利用其当年显赫的地位，巧取豪夺了上述珍贵古书和文物，有的加盖了“康生”私章。它们都源自“文革”中被“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抄家物资，其中包括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惜华、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尚小云等96位知名人士私藏的书画。还有25个单位和31个仓库中所谓“无主”户的查抄文献和文物，有的也被康生看中纳入私室。当年康生占“公”为私的行劫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曰“写条霸占”。如他曾以编写《砚史》为名，从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库房写条“借”走了包括唐陶龟砚在内的三件“国宝”，国家文物管理机构慑于其淫威，只得为之办了“调拨手续”，归康生私有。

二曰“开口强要”。如1969年7月8日，他在文管处看到一本清刻《百家姓》，强行拿走。

曾经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著名历史学家向达，在“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其子女向周恩来总理申述了其生前“遗愿”，要把个人藏书捐赠给北京大学图书馆。经周总理批准后，北大图书馆得以接收这批当年已被抄没归公的藏书，其中基本上都是古籍，而其中数种珍本却早已为康生等人窃为己有，“后在拨乱反正中，陆续有所追回。”^[1]

俞平伯（1900—1990）是与胡适并称为“新红学派”创始人的现代文学家。在1966年8月下旬到当年底，其家被所在街道居民和中学生乌合起来的所谓“红卫兵”组织抄了多次。后来，俞先生在一篇专访中提到，他所藏有的一部乾



康生写在古书头上的眉批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接收的被抄没的傅增湘藏书



隆甲戌脂胭斋重评《石头记》，“文革中当作‘四旧’被抄，这回清退回来一看，这部书盖上了康生的大印。原来这部珍本，从我这里当‘四旧’抄走后，转身却成了康生的宝贝。”^[2]

傅惜华（1907—1970），又名宝泉，出生于北京满族富察氏之家，系现代著名戏曲研究家、俗文学研究专家和藏书家。在“文革”前，担任中央戏曲研究院的图书馆馆长，其书斋“碧藻馆”因藏书精良而驰名京华，有些学者因研读之需往往求借其私人藏本，傅氏乃立下借走须留借据的规矩。“文革”前，康生曾命人代表他前往傅家借阅珍贵藏本，但得知所借之书须由本人亲笔写下借据才能携走时，竟理解为此乃傅氏惜借而发的抗命托词，于是恼怒异常。“文革”中，“红卫兵”抄家的罡风刚起，康生就多次询问文管处：“傅惜华的书集中起来没有？”并一再叮嘱：“他的书一定不要丢失和分散。”

一天，一群“造反派”把傅氏及其家人全部禁闭在一间小屋里，随后把他数十年来苦心搜集入藏的数万册珍贵图书、字画以及文玩等装了满满两卡车载运而去。据其子傅珣说，当时所有的藏品均被拉走，连一本字典也没能留下。据说，1969年10月18日上午，康生得知傅氏藏书已被抄送到文物管理处管理的国子监书库中，便急急忙忙地赶过去，破捆挑书，以“鉴定”版本为名选走若干。^[3]

阿英（1900—1977），是现代知名的藏书家和学者。黄苗子（1913—2012）回忆说，阿英收藏的“许多明刻的珍、善本书，是他50多年前从南北各地、从戎马倥偬中辛勤搜购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他住北京棉花胡同，那时除了李一氓、齐燕铭、徐平羽等同志常去看他以外，还有一个福建口音的人，也常到棉花胡同借阅阿英同志的明版书”。

这个“福建口音的人”，就是当时炙手可热的又一权奸陈伯达（1904—1989）。据黄苗子披露，“文革”发动后，陈伯达给中国文联的“造反派”头头打去了一个电话，让他们把阿英的所有藏书送到某处集中，“不许散失”。“造反派”自然遵命行事。“于是一夜之间，阿英的明版书被归入福建人及其几个同伙的书架中！”黄苗子披露说：

就在这场浩劫以后，党和政府按照政策，发还曾被掠夺的宋、明古籍，却往往在原有的藏书家的印章之外，多了几方闲章。据笔者所目睹的，有白文“江青藏书印”（约3厘米），往往盖在封面显目处或“天头”（书面上面空白处）上，看来很有霸气。有朱文“伯达藏书”，大小风格和上面的相同。另有“温陵陈伯达印”大章一方，见于发还书上。此外另一家的白文“康生”仿汉小印，不到一厘米半。这方印往往盖得位置恰当，同时还赫然盖有“归公”朱文小印，大小与仿汉名章相同；出人意外，更有一方“大公无私”的方印，与名章同时盖在书上，见者莫不伸出舌头。

说江青盖印“霸气”，例子是不少的。一本盖有清代藏书家刘喜海印章的善本书，却硬被一方“江青藏书之章”覆盖在刘印上面，此种“开硬弓”的蛮横手段，将来有人写中国藏书史时，也是“史无前例”的。^[4]

作为阿英的女婿，吴泰昌也曾回忆阿英藏书在当时的遭遇，他说：

一九六六年盛夏，当社会上抄家盛行时，反革命小丑戚本禹曾在一个

公开场合，传达了陈伯达和康生的“指示”：封存阿英的书房，任何人不准动。阿英当时还以为这是一种好意的关照。阿英的收藏素负盛名，他那小巧的独家四合院弯弯曲曲的书房，吸引过不少国内外知名的人物。陈毅同志、郭老来看过书。谁知不久，陈伯达一伙的卑鄙用心就暴露了。一九六八年秋天，阿英全家从棉花胡同旧宅被扫地出门，赶到终年不见阳光的一间过道南屋。紧接着，陈伯达以“审查”为名，亲笔手谕，抢掠了阿英的全部图书收藏。^[5]

著名学者王利器（1912—1998），毕生勤勉治学，撰文著书宏富，凡逾两千万言，号称“两千万字富翁”。据记述：“他积聚多年的3万多册古书，被没收充公，其中有敦煌卷子、宋元善本、明清佳槧精刻等多种。他几十年中辛勤抄录的数万张卡片也尽皆被抄没。等到‘文革’后落实政策，发还书籍时，只归还了一部分，而在归还的古籍中，竟有一些盖有江青、康生的藏书印章，可见他们也曾向王利器的藏书伸出黑手，把一些书据为己有的。”^[6]

在《劫余话劫中之劫》一文中，王利器回忆说，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曾从鸿文旧书店老板葛鸿年处高价购得一册装裱成为“经折本”形式的陈老莲（1598—1652）手绘《水浒叶子》，多年后，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余嘉锡（1884—1955）所著《宋江三十六人考实》时，即以其中的宋江人物图像为封面，结果：

有一个和康生相熟的人，在康生处看到一本临摹的陈老莲《水浒叶子》，康生当成真的买来了，这个人向康生讲他的是临摹本，原本在王某处。于

是他来我家说：“康生要看您的陈老莲《水浒叶子》。”于是，他从我处拿去了。后来我催促还我，还回来了。未知当时康生何以尚未公然强取豪夺以去也。但在后来（指“文革”结束后“落实政策”清退抄家物资时——引用者注）北京市文物管理处退还我的图书时，没有这本陈老莲《水浒叶子》，至今还是一个谜。

我的问题平反后，北京市为了落实政策，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让我去府学胡同领取退还的书籍。我一看清单，首先注意到书不到1万册，一些文物、古董没有，我积累多年数以千计的卡片也没有……退还的书籍，经我初步检查出显然有残缺的，如明刻本《涌幢小品》就只有5本，渭南严氏刻《颜氏家训》就少了2本，《论衡校释》就少了1本等。凡是残缺的都没有列入清单。又发现有江青、康生、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打上“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横方形朱文印章和某机关已经编号的如《齐东野语》为MJ-1798/4—1等。江青拿去的日本刊安井衡《管子纂诂》一函12册，都在蓝青色（俗谓之“瓷青”）书皮上打上“江青藏书之印”白文朱红图章，叫人看不清庐山真面目，此又作俑者之一绝也（江青拿去我的书还有，此举其可笑者耳）。

至于康生，如所周知，凡在文物管理处拿去的书，每部书不管大小，都要付书价5分钱，然后打上“天下为公”的图章。他拿去我的雍正刻本《西厢记》，前有篇序文是他本没有的，他

拿去写了题跋,描绘一个“康生”图章,倒填年月,说是“文化大革命”前购买的,却又在“四人帮”倒台后退还我了,真是作伪心劳日拙的丑闻。^[7]

上述种种“劫中之劫”,正好昭示了自我标榜为“马列主义信徒”的康生、江青、陈伯达一伙人封建独裁、政治残暴和文化专制的真实面相,或如黄裳所说,这种“挂着‘风雅’招牌的大坏蛋,他们的行径比起钤山堂主人严嵩来是尤有过之的。像《一捧雪》那样的故事,三四百年以后还依样重演,不能不说是一件触目惊心的事”。^[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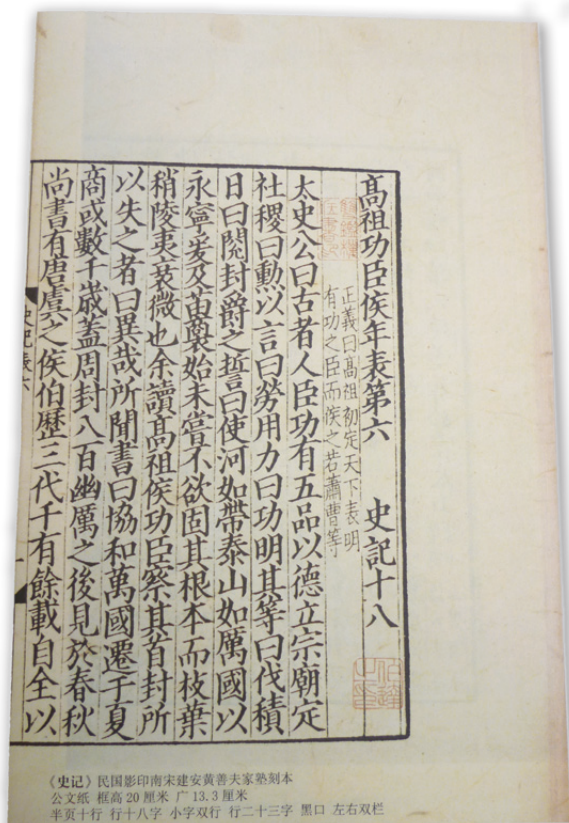
对于上述种种强盗行径,黄苗子曾多次作文谴责:

据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的报道:“这几年江青亲自或派人到文物管理处掠夺古董、文物共九十四次,拿走进表、玉器、瓷器……书画共一千零八十七件,各种图书(包括《金瓶梅》、《肉蒲团》等)四千六百多册,江青劫走的各种文物,粗粗估价,约值十三万一千二百余元了……”。画家叶浅予,在“文革”时期被抄家,事后向北京文管会追索,文管会提供叶一张“书画文物抄件”清单,记录了陈伯达、林彪、曹轶欧(康生的老婆)等据为己有的“四旧”物品。^[9]

记得一九八九年初,《人民日报》第八版还发表过一篇附图文章,记北京大藏书家傅增湘家藏的元、明版画经失主追回时,赫然加盖了“陈伯达藏书”、“江青藏书”、“康生藏书”等印章。所谓“四旧”,全部“扫”到这些人的家里去了。^[10]

其实在当年,类似的“劫中劫”在各地民间还有其不同形式的翻版本。

陈伯良回忆说,“文革”后期的1974年,“我把一些历劫犹存、舍不得卖掉的书籍等,统统无条件捐献给国家——当时的杭州市文物图书清理小组”,其中包括日本精装出版的《世界美术全集》版画分册、明嘉靖刻残本《集千家注杜工部诗》、清代刻彩印《芥子园画传》零本,以及数十种不同古籍的首页书叶等,“可惜好心不得好报,交公而不能归公,一捐出去就再也不知这些东西的下落。我后来到处追查,发现疑点(总共已以‘折价七角’的办法‘处理掉’)而写信上告时,已经徒费心力而追悔莫及……我意识到自己也不幸而遇到江青、康生式的人物了”。^[11]



陈伯达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攫取的傅增湘藏书

在另一方面，“落实政策”时所“发还”的抄家物资，其政治形式上的意义也大大超过了文化学术内容上的意义。实际上，在“发还”当年被人七手八脚乱哄哄地抄走的纸质文献时，无论是在书刊资料的品种上、数量上，还是在所发放的经济补偿上，基本上都是所“失”远远大于所“还”的。为此，叶永烈曾痛定思痛地感慨说：

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每趟进城，少不了到东安市场和西单的旧书店转悠转悠。空书包而入，满书包而出，每月除了伙食费之外，节余的钱都用在买书上……“文革”中被抄家时，我淘来的旧书，丢了一大批。仅根据抄家者很不完全的“收据”加以查对，丢失一百四十四册。“文革”后“落实政策”、发还“抄家物资”时，每本按三角钱赔偿损失。唉，有的绝版书丢了，已不是能用三角钱所能补偿的！^[12]

1972年5月12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开始“陆续发还查抄物资、书籍等”，俞平伯获退的是“数千册零乱残缺之书”。据韦柰回忆：

我还记得，到后来“落实政策”时，当外祖父听说要把书还回来的时候，他是多么高兴！但当我把不足原藏书量三分之一的书拉回家时，在翻阅一番之后，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你把它整理好，列个书目收起来吧！”那失望的神情，只有爱书如命的人才能理解。的确，在归还的书中，有价值的那些已经再也找不到了。^[13]

据说，当年“落实政策”——“退还”被抄走的藏书时，要以原主人在藏书上所盖的私

人图章，或其自编的藏书目录为凭证，且能够被主事者在抄家书堆中找得到的——而事实上，几乎绝大部分私人藏书，主人没有其实当年根本也无暇去一一盖上什么图章，或编什么书目的。^[14]

注释：

[1] 沈乃文《馆藏古籍调查报告——馆藏古籍的价值及来源》，见庄守经主编《纪念建馆九十周年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文献调查评估报告集》，北京大学图书馆1992年10月编印，第417页。

[2] 郑笑枫《佳气神州一望中——访著名老作家、红学专家俞平伯》，见《光明日报》1986年2月6日。

[3] 范凤书《“文化大革命”对私家藏书的冲击》，见《中国私家藏书史》第三编第2章第3节，大象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589页。

[4] 黄苗子《藏书和藏书印》，见周翼南主编《收藏琐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45—46页。

[5] 吴泰昌《阿英的最后十年》，见《文艺轶话》，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149页。

[6] 马嘶《学人藏书聚散录》第二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版，第253页。

[7] 王利器《劫余话劫中之劫》，见《往日心痕——王利器自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72—182页。

[8] 黄裳《阿英的一封信》，见《榆下说书》，三联书店2001年7月版，第241页。

[9] 黄苗子《特权大盗》，见《人文琐屑》，三联书店2006年8月版，第291—292页。

[10] 黄苗子《文物劫掠》，见《人文琐屑》，三联书店2006年8月版，第294页。

[11] 陈伯良《梦回杭州旧书市》，见《天一阁文丛》第一辑，宁波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259页。

[12] 叶永烈《淘书·买书·读书》，见《叶永烈自述人生》，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107—108页。

[13] 韦柰《我的外祖父俞平伯》，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8页。

[14] 郑笑枫《佳气神州一望中——访著名老作家、红学专家俞平伯》，见《光明日报》1986年2月6日。

徐雁男，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著有《秋禾书话》、《南京的书香》、《江淮雁斋读书志》、《中国旧书业百年》等。

钱钟书“文革”轶事

III 徐兆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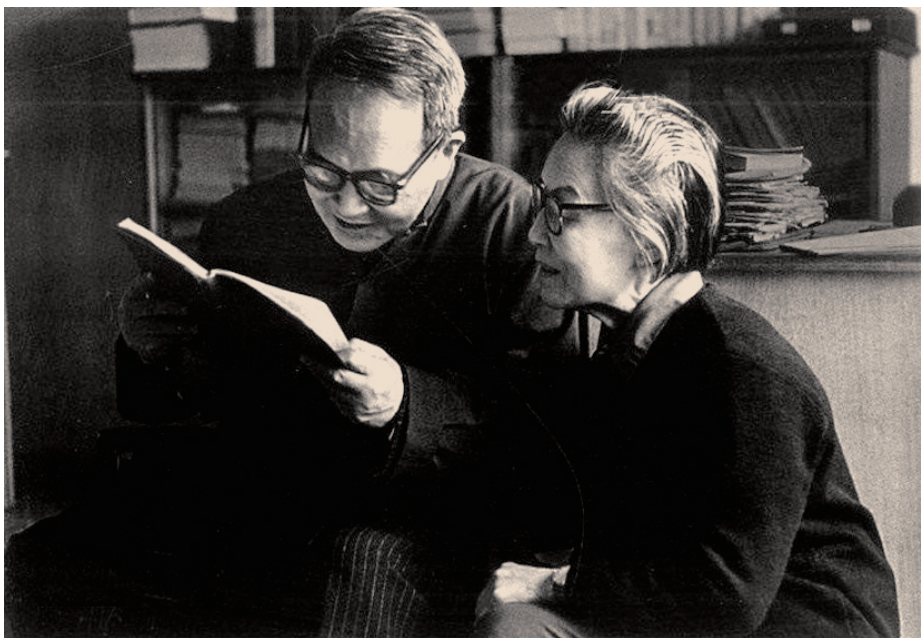
钱钟书 (1910-1998)

在“学术大师”和“科学精英”的桂冠满天飞舞之际，我们忽然间听到当代大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在临终时提出的一个令人深思的“世纪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先生留下的这道关于中国教育发展的艰深命题，不仅是一道光芒四射的世纪之问，更是一道叫人刻骨铭心的制度拷问。

学术大师或泰斗式的杰出人才，固不是自封，也不是由学界、政界和传媒吹出来的。它需有深厚的学术根基和公认的学术成就作支撑和依据的，而认识、理解大师和泰斗式杰出人才，需要经得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在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氛围中，既有造假虚妄的“大师”，也有泰斗式杰出人才不被认可不被理解的情景。十年“文革”中像钱钟书这样的学者所扮演的，

恰正是后一类学术大师所遭遇的悲剧角色。作为文学界的圈内人，我们大约都知道，上世纪末期，钱先生离世（1998年12月19日）前后，他的头上曾经戴着各种炫目的桂冠：从国学大师到中外比较文学的泰斗，直到“文化昆仑”的至高荣誉。甚至一时间在全国文学界和学术界，已逐渐形成了“钱学”之热。可人们却未必都知道这位大师或曰泰斗式的杰出人物，是怎样从十年劫难中走出来的，他头上的炫目光环又曾经发生了多么奇妙的变幻。

1964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文学所之后，前后十年间，我可算是亲眼目睹、亲耳听闻到钱钟书先生在“文革”中所经历的磨难，所发生的奇妙变幻。作为一名才疏学浅的后生学子，我自知无资格也无能力去评述钱先生的学术成



钱钟书与杨绛

就，从而全面准确地把握钱先生为人为文的特点。我只能如实地记叙我眼中心中的钱先生在“文革”十年中的一些轶闻旧事，为“钱学”研究者和文学史撰写者提供某些真实的资料。

1964年8月，我到北京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如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报到不久，即知道，在这个中央一级的学术单位里，江苏籍或与江苏有很深关系的研究人员占据着很大的比例，其中老专家学者有王伯祥等人，中老年著名学者有钱钟书、余冠英、戈宝权等人，中青年学者有蒋和森、邓绍基、蔡葵、濮良沛（林非）、许志英、董乃斌、王保生等人。俞平伯虽是祖籍浙江，但生于苏州，自小即随父生活在苏州，亦可算是半个江苏人。

对于所内的这些江苏老乡，大多数人我只是听闻其名未识其人。尤其是那几位中老年专家学者。因为根据所内的上班制度，那些中老年学者平日是不用按时上班的，只需在家完成写作和科研任务。我与所内同仁与老乡的初识

是在一次全所大会上。如今距离那次全所大会的时光已经逝去了整整48年，可我仍然依稀记得发生在那次会议上的某些生动情景。主持那次会议的是著名诗人、评论家何其芳所长。那时中外文学所尚未分家，会议室聚集着100多人，除了中国文学的名家学者，也包含着一些如冯至、戈宝权、卞之琳、李健吾和杨绛等外国文学专家。会中的一个议程是，所长将从国内各重点高校分配来所的我等12位青年学子，逐一介绍给所内诸人，同时，也向我们重点介绍了各位专家学者和学术大师。

作为中文系刚刚毕业的青年学子，能有幸调进社科院文学所从事文学研究工作，本已是令人欣喜若狂的事情，又有机会面见慕名已久的学者专家，自然更是高兴不已。那天给我印象最深，并让我铭记终身的，却仍是钱钟书夫妇和俞平伯三人与众迥异的风采。他们的穿着打扮和谈吐气质，与我们在大学读书期间见到的学者教授，真个是大相径庭了。只见，人到

中年的钱钟书西装革履，衣着平整，领带光鲜，满头黑发梳得整齐光亮，胖瘦适中的脸庞，架着一副宽边玳瑁眼镜，俨然一副儒雅博学的西洋学者派头。与钱一样显得“异类”的俞平伯则完全是一副冬烘先生的模样，身材矮小精瘦，穿着一身浅色的中式衫裤，上衣对襟钮扣，下身裤脚宽大。谈吐间一个是西洋绅士派头，一个则是满口吴语腔调。而钱钟书夫人杨绛先生则衣着典雅，略施粉黛，全然是一副大家闺秀模样。

此后，我等青年学子便时常关注这几位非同寻常的学者的言行举动。于是，我们方才陆续得知，这位学贯中西学识渊博的钱先生出身书香世家，从小便沉浸在中国古典文学的良好氛围中，清华大学毕业后，又偕同杨绛夫人在英法著名大学研习外国文学，回国后曾执教西南联大，上海暨南大学和清华大学，并写过《围城》等小说，著有《谈艺录》等著作，成为名满中华颇有影响的年轻教授、杰出学者和著名作家。当我们对钱先生何以三四十岁时获得如此声誉而感到有些纳闷之际，我们忽而从钱先生的一个独特借书习惯中，获得了些许启迪：原来，担任所图书资料委员会主任的钱先生每隔十天半月竟提着一个不小的手提袋来所里借书，读完后又按时来所置换另一批书籍。更令人惊奇的，听说他家里的藏书并不多，决不像何其芳所长那样有几间房的藏书。他的渊博学识，都主要依凭他惊人的博闻强记能力，他的学问全装在脑子里，还有读书时所做下的几麻袋的读书笔记中。

我在文学所的十年间，常听到人们流传着关于钱钟书博闻强记、学识渊博的诸多轶事。当后辈学子向钱先生求教某人或某个文学问题

时，他总能不用查阅资料立即予以回答，这问题古今中外有几种说法和观点，可查那些资料，并随即从中外资料中举出若干具体范例，加以说明和读解。这不能不使我等后辈学子惊异折服，甚至也使同辈学者赞叹不已。难怪有人说，他的一生与事无争，与书为伴，而他自己也一向以“书虫”自许。

1964年前后，我们这些刚从大学毕业来所工作的青年学子，虽然从内心深处都十分崇拜钱钟书、俞平伯这些学术大师，并把他们当作我们学习的楷模，但在“文革”风暴的驱动下，在最高指示的一再鼓动下，却大都迷失了方向，错把何其芳等所领导当作“走资派”，把钱钟书、俞平伯等学术大师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揪了出来，总之，当作“牛鬼蛇神”予以轮番批斗、游街，直到施以反复的人格羞辱。待到军（工）宣队进驻学部之后不久，我们这些“革命者”和“牛鬼蛇神”终于统统被驱赶到河南偏僻乡村，在“五七”干校度过二三年艰难而又宝贵的时光。

历史翻过去40多年，如今的年轻人（即使是文史工作者）大约是想像不到当年建国门内5号学部大院内，是如何发生那般疯狂、残酷而又荒诞不经的批斗场面的，更不会想到像钱钟书那样从来不过问政治、文质彬彬的大学者，会遭到莫名其妙的飞来横祸，被外地来京造反、串连又涉世不深的大学生和几无文化的学部工人战斗队的人随意批斗和百般羞辱。最令人难忘的是1966年夏日，一次以何其芳为首的文学所“牛鬼蛇神”队在开过严厉批斗会之后，又被勒令在学部大院内戴上高纸帽、挂着黑牌子，集体亮相，游街示众，何其芳还需敲锣带领一行被批斗者轮番呼喊“我是三反分子某某某”。之后，被批斗的“牛鬼蛇神”一字排开，站在

文学所6号楼前，继续接受革命群众的严厉指责和辱骂。

就在此刻，我眼前发生了让我终身难忘的一幕：那天钱钟书头上被戴上一顶硬纸板制成的古代官员帽，纸帽两边正好颤动着两只形同古钱币形状的帽翅，满面通红地接受一对中老年工人战斗队队员的指斥与批斗。原来，这对夫妇是学部的水电工，家居在钱氏夫妇楼下，因平日家里的收音机常发出高度噪音，而钱先生不胜其扰，有时不免予以提醒阻止。这本是极其正常的小事，可这会儿这对夫妇便围着钱先生发泄不满情绪，不断上纲上线地责问钱：你这个黑帮分子为什么不让我们收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云云，弄得钱先生真个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只好面红耳赤地低头木然地站在那里，听凭这对无理夫妇的训斥和发落。

是年钱钟书正好56岁，眼前发生的这一幕大约是这位饱读诗书、学贯中西的学者所难以想像也难以理解的。然而，更严酷的事情还在后头。就在批斗会不久，又有大字报揭发了两则让人触目惊心的材料，说的是，他在“毛选”英译委员会工作期间，曾发生两件“恶毒攻击”毛主席选集和含沙射影“诋毁”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论。第一条揭发材料说，钱在“毛选”英译委员会期间，有人问他：我们上班时总也搞不完翻译工作，只好带回家里继续搞，钱先生你怎么从不带回家？揭发材料说，钱当时用了一个英文辞汇回答，翻成中文便是“褻渎”两字。另一材料则是，钱曾同熟人刻薄议论过政治就像是厨房里的菜肴，你别看它端上来时色香味形俱佳，可你不知道，厨师在厨房里做菜时，是多么肮脏。

只要是上了年纪，经历过“文革”的人，

大约都知道这两条揭发材料的要害与份量。尤其是第一条涉及“毛选”的材料，在“文革”背景下，实可谓是属于恶毒攻击一类的“罪行”。即使是第二条材料，亦有不加区分地议论、攻击无产阶级政治之嫌。清理阶级队伍之际，适逢我在专案组分管并撰写钱钟书专案的审查结论材料，那时头脑已逐渐从狂热中冷静下来，最终我遂以“孤证”为由否定了第一条材料，对第二条材料则以“不加区分地议论无产阶级政治与资产阶级政治”，属于错误言论而结案。

好不容易度过清队的关口之后，1969年底，年近六旬的钱钟书与年届30岁的我，便一同随学部大多数干部离开首都被抛入河南信阳地区“五七”干校之中，先后在罗山、息县和明港军营，度过了近三年的时光。在农村干校里，这位出身读书世家，又先后留学英法著名大学的学术精英，又会扮演何种角色，遭遇哪些特殊经历呢？自然，像钱钟书夫妇、俞平伯夫妇这些专家学者，与我等平民出身的后辈学子，遭遇与感受又自当会有所不同的。

在干校里，我们先是当迁徙搬运工，参与脱坯盖房、下田除草割麦等重体力劳动。对我等三十来岁出身农家或平民的青年学子来说，这并不算是有什么特殊的磨难。唯是干校中期还要没完没了地搞所谓清查“5·16”反革命集团运动，无论是整人与被整，清查与被清查，倒着实让人心生厌倦，疲惫不堪。那时，经过四五年的“文革”运动，我们大都已逐渐渴望回到安静的书斋生活中去了。截至干校后期，尤其是1971年“9·13”事件后，停止一切清查“5·16”活动，进入休闲逍遥期之时，我等大多数青年学子已然逐渐醒悟到，过于频繁的政治运动，本已使我等丧失了成为学术精英的机遇，更何谈成为

学术大师？

在现在的社会里，人们自然很难想像像钱钟书、俞平伯这样的学术大师在偏僻农村“五七”干校里，会从事什么劳作，又是怎样生活的，甚至当地农民又是怎样对待这些异类人群的。

在息县东岳集小住期间，俞平伯夫妇曾住在一农舍里，因年事已高，平日不用参加什么田间体力劳作，也无需参与脱坯盖房等重活。于是，他们偷闲在农舍屋前的一块巴掌大的宅基地里散播些小菜种，不久，地里即冒出一点点小菜秧。为怕鸡鸭糟践，俞平伯老夫妇俩还赶集买了一些甘蔗杆做围栏以避鸡鸭之害，此外，他们还常到集上去购买鱼虾蔬菜，以作餐用。这对常住城市又很少亲自买菜做饭的老夫妇，一时间便在乡间闹出不少笑话轶闻，成为乡民的笑谈。农民们弄不清毛主席是怎样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有时不免围住俞平伯追问他是怎样写《红楼梦》的，结果弄得他哭笑不得，不知如何是好。

与俞平伯夫妇不同，钱钟书、杨绛夫妇俩在整个干校期间，始终是参与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的，干校期间我们始终能看到他们相伴前

行的身影，也不时传出一些关于他们夫妇的美谈。在干校艰难的岁月里，我们不仅看到钱氏夫妇相濡以沫的情景，同时也感受到，年轻学子们与学术大师之间昔日的疏隔正在缩小，“文革”之中由造反所造成的紧张对立关系，正在逐渐消失。是共同的生活命运和五七道路让我们两代文化人的心灵与情感有了接近与沟通的机会。

在罗山干校初期，钱钟书担负为全连“五七战士”烧开水营生，结果这位学术大师常常因伺候不了开水炉的火候而耽误了开水供应，全连同事们知道他已尽了力，遂戏谑友善地称他“钱半开”。不久，到了息县干校，只好另派戏曲专家吴晓铃和美学家蔡仪接替了他，而钱钟书则改任全连的信报收发和工具保管。应当说这一时期钱教授的认真勤快，是甚得全所同仁的一致好评的，且与后辈学子们的相处也是颇为和谐友好的。于是，在夏日的保管室门内外，我们常能见到钱教授打着赤臂挥扇驱蚊的情景；冬日，冒着寒风苦雨，戴着顶蓝色棉帽，从住处来往东岳集镇邮政所收取报刊书信。这一切大约是现今的学子们再也难以想像到的，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幸运的是，从文学所干校住地前往东岳集的二三里路途中，必经“威虎山”（干校学子们对附近一座小山丘的戏称）下的一畦菜园，而每经此地，钱总要到菜园歇脚小憩，与园主欢聚畅谈一番，人称之为“鹊桥相会”，那是再恰当不过了。原来，经营掌管菜园的主人，正是钱教授几十年形影不离相濡以沫的夫人——著名翻译家兼作家的杨绛先生。她当时适在外文所分管菜园。在整个学部干校，夫妻相偕同在干校者甚多，仅在文学所就有俞平伯夫妇、毛



《干校六记》书影

星夫妇、董易夫妇，还有刘锡诚夫妇等，唯独钱钟书夫妇在干校里留下了这“鹊桥相会”的文坛佳话。直到上世纪末，杨绛先生发表了《干校六记》之后，这则文坛佳话才得以广为流传。

十年“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悲剧，更是几代知识分子的一场灾难。无论是对钱钟书、俞平伯那样的学者精英、学术大师，还是对我等正走在治学道路上的青年学子，几乎莫不如此。1971年“9.13”事件之后不久，钱钟书、俞平伯等著名学者都已从明港干校陆续返京，而我等青年学子却仍在逍遥中苦度时光。直到1972年七八月间，我与文学所全体同仁方才获准返回北京，结束了那一段令人难忘、又不堪回首的干校生活。经过两年多的干校生活，此时的钱钟书似乎渐渐褪去了些许绅士派头，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倒好像是一个说话态度和藹、谈吐幽默机敏的小老头了。

在我的印象里，长期以来，我等文学所后辈学子，都喜欢称钱钟书为钱教授或钱先生，几乎从来不在心中口里称他为钱大师或钱泰斗。直到1998年钱离世后，他的为人为文，他的学术地位与影响，方才逐渐真正为后世所认识、理解。我也从文学所朱寨、陈骏涛等先生的忆旧回忆文章中得知，学术界称他为学贯中西、博大精深的一代“文化大师”、“文化昆仑”，原是都不为过的。难怪学者夏志清先生也曾给予钱钟书这样崇高的评价：“我国学人间，不论他的同代或晚辈，还没有人比得上他这样博闻强记，广览群书。现在想想，像钱钟书这样的文学奇才，近百年我国还没有第二人堪与他相比。”

1974年底，我在文学所浪荡空耗了十年的人生宝贵时光之后，终于主动要求调离文学所回到江苏从事编辑工作，再后很少有机会见到

钱钟书先生。但我知道，随着他的长篇小说《围城》改编为电视剧，学术著作《谈艺录》、《管锥篇》的再版，钱先生在国内外的声誉日隆，他为人文处世讲学，却愈加谦恭平和。曾听说，他昔日的清华同学、后来成权贵的高官，对之登门作家访，他也从不作登门回访。果然，他还是那个不为权贵折腰的名士派头。这让我等后辈学子不能不钦佩不已。

是的，一个优秀的民族，一个尊重历史传统的国家，终究应当不断地培养、发现新的大师级学者专家，并更当尊重、爱护已有的大师或泰斗级杰出人才，使他们尽量为国家民族释放出更多更大的光和热。当我们如今来怀念钱钟书先生的时候，千万别忘了钱学森先生的“世纪之问”仍在时时地警策着我们，更不能忘了，在共和国历史上，曾有过如此践踏人才的光光。

徐兆淮 男，原《钟山》杂志执行主编，文艺评论家。

台城悲歌

III 诸荣会

生活在这座世称六朝古都的城市里，自然会常常想起六朝——英雄与小人同朝共舞的政治的六朝，征伐与杀戮难分难解的军事的六朝，雕龙与画虫平行并重的艺术的六朝……每当想起，那一幕幕早已褪色的史剧常常会浮现在眼前，如梦幻烟云、流水落花，其主角们或衣冠飘忽、放浪形骸，或酗酒吃药、醉生梦死，他们崛起又毁灭、大喜又大悲、杀人又被杀的人生和命运，常常让人感慨系之，而其中尤以那位史称梁武帝的萧衍最令人唏嘘难禁。

这并非因为他的文武全才，也并非他在六朝历代皇帝中活得最长（86岁），在位最久（48年），更并非他下令编撰了世界教育史上使用时间最长、影响最广的启蒙课本《千字文》，而是因为：他作为一个人，曾尽享人世之尊又饱尝世间之苦；作为一个生命，曾尽显骠悍奋发又终归荒唐颓废；作为一个帝王，既是开国圣主又是亡国之君……

梁武帝独特的人生是在他被侯景的叛军围于台城、问计吴均时最终完成的。其实，当时他比谁心里都明白，这种时候，这位只会说大话、空议论、好作慷慨之调的江南文士是不可能想出任何妙计的。想当初，他偶然读到吴均的一首诗，其中“何当见天子，画地取关西”的诗句真是掷地有声，他一下子被这种强烈的渴望建功立业的激情所打动。此时他初登大宝，心怀大志，心想，如此英雄，正可一用！于是他将吴均招至殿下。既是英雄相见，自然不必闲话，于是他开门见山地问吴均：“天子今见，关西安在焉？”没想到吴均吱唔半天，终无言以对，这令他非常失望，惟一的收获便是从此知道了吴均一介书生的本质。是的，吴均只是一介书生，且是位

标题为作者自题



台城（吉强摄）

文才相当不错的书生，他给朋友朱元思偶尔写下的一封书信，千年之后竟能进入中学语文教材，但在眼下这种兵临城下之机，要让他来想出个破敌妙计，实在是太为难他了。果然，吴均面对梁武帝的发问，惶恐万分，不知所措，犹豫半天，踌躇半晌，扭扭捏捏，畏畏葸葸地说，还是投降为好。这样的回答自然遭到了痛斥，倒是这一阵痛斥声中依稀可见梁武帝尚存的一丝英雄气。

是的，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梁武帝萧衍的确算得上是一位英雄。

萧衍也算是皇家出身，其父萧顺之因是齐高帝萧道成的族弟而被封为侯。出生在这样的家族中，若是在别的时代，或许是幸运而令人羡慕的，但在南北朝这样的乱世，却并非一定是什么幸事。宋齐时民间有一首歌谣：“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萦。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纵观六朝列代，围绕皇权的争斗，强权的统治者似乎总爱拿自家人开刀，“骨肉相残”是那时最常见的皇家闹剧。因此，刘宋后主刘准在萧道成屠刀下留下的最后遗言竟是“愿后身勿复生王家”。天性聪慧而又敏感的萧衍早就懂得了韬光养晦、审时度势，也懂得了丰满羽翼、集聚力量，更懂得了抓住机遇，当机立断。而这一切又正是一个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年轻的萧衍给世人的印象只是一个爱好文学的世家翩翩公子，而实际上，他无时无刻不在观望，不在等待，他冷静而沉着，不急又不躁，自己的心迹决不露出半点，那怕在自己最亲的人面前。

机会终于来了，萧衍 26 岁那年，他以竟陵王萧子良西邸从事的身份被萧子良推荐为襄阳太守，出镇边城襄阳，从此萧衍弃文从武，开始了他的别样人生。

梁武帝像



齐魏两朝，隔江对峙，荆襄之地自然成了边防重地，镇守之责自然十分重大。萧衍初出茅庐即镇守襄阳，这是历史和命运赐给他的一次机遇，他当然紧紧抓住不放。初到襄阳，本是一介书生的他，在强敌面前，入兵戎之间，不仅无所畏惧，而且多次以谋略出奇制胜。据史载，萧衍每遇战争，总身先士卒，一马当先，有时，当齐军将士在强敌面前望风而逃时，他所率部队，则砥柱中流，岿然不动。正因有萧衍长期坐镇边城襄阳，南齐才获得了长江上游边防的安全，都城建康才获得了长期的安宁。不仅如此，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萧衍在襄阳守任上不仅充分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更充分显示了他出众的政治才干。在他到襄阳之前，这座边防重镇由于长期兵灾，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百姓困苦，真可谓哀鸿遍野。他到任后，一面招兵买马、整顿军务，一面轻徭薄赋，鼓励生产，安抚百姓。在他的努力下，作为边防前哨的襄阳，竟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

大好局面。他本人也因此而获得了襄阳百姓的尊敬和爱戴。这一切都为萧衍以后的起事奠定了物质和人事的基础。

公元483年初，齐高帝临终之前一下子委任了六名托孤大臣。凭借自己高度敏感的政治嗅觉，萧衍断定“齐将大乱”。看来，此时在风雨中飘摇的南齐王朝亟需要一位政治强人出来或收拾残局，或另起炉灶了——这个人除了要有过人的才干和胆识外，最好要有一点皇族的背景，如此他就比较熟悉和了解其中争斗的种种人事和机关；最要紧的是他决不要在明处，最好在政治中心之外，藏在暗处，要不，一旦进入齐明帝萧鸾和东昏侯萧宝卷这两个杀人不眨眼的屠夫皇帝的视线，他会早早的人头落地了——此时的萧衍，正是这样一位政治强人。这是历史对他的选择，也是命运为他作的安排。

萧衍一面急告远在建康的哥哥萧懿，千万不要“赴阙朝覲，静待事变”；一面在襄阳城里整军经武，厉兵秣马，静待时机，一举成事。不久，他的哥哥萧懿，因不听他的劝告果然被杀，他便乘机兵起襄阳，并联合各路反东昏侯的义军，顺江东下，矛头直指建康。由于他为这次行动作了充分的准备（据史书记载，他出兵之日，便有“铁马五千、甲士三万”），因兵力之强，他理所当然地在反东昏侯的联军中被推为盟主。

然而，萧衍发动的这一场暴动式的战争，并没能取得速胜，相反竟一打就是三年，在这三年的战争中，他出众的军事才能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梁书》上是这样描写萧衍挥师东下时的雄壮军容的：“江陵湘中之兵连旗继至，粮食既足，士众稍多，围守两城，不攻自拔。”何以如此？萧衍总结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心战为上，兵战次之”，如果达到了如此之境，“天下之事，可以卧取之

耳”！有着这样的气概的人难道还不是英雄吗？当然是，而且不是一般的英雄，而是大大的英雄！

至此，萧衍已成功地在历史的天空中完成了他的英雄造型。

二

公元501年，萧衍率军攻入建康、兵围台城，随即位居宰相——实际上齐和帝萧宝融已在他掌股之间。

就在这年深秋，萧衍襄阳旧府又传来喜讯，留在家里的丁氏为他生下一男孩。得到这一喜讯，相府上下自然少不了庆贺一番，一时间，门人故吏填塞其门，有奉承者说：“这一下相爷的事业后继有人了。”“不，应该说国家社稷后继有人了！”又有奉承者说。这话让萧衍忽然想起丁氏要他这个做爸爸的为新生的儿子起个名字，这时，他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个字：“统”——他既要一统军政，也要一统南北，更要一统天下。于是他提笔在一张红纸上写下了这个“统”字，并封好遣人急送襄阳，给儿子作名字。

此时此刻，萧衍的野心已昭然若揭，但人们似乎一点也不因此而感到奇怪，相反，倒觉得像他这样的英雄，面南称帝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

不久，台城中便又一次演出了一幕“禅代”的活剧，皇帝仅仅做了两年、人却杀了不少的齐和帝萧宝融，将还没坐热的皇位让给了萧衍。萧衍称帝，改国号梁，史称梁武帝。

此时摆在梁武帝面前的南朝可以说是一个烂摊子。由于东晋以来过于频繁的政权更迭，使得整个社会动荡不安，经济衰退，民生凋蔽。而与之相比，一江之隔的北朝，在魏孝文帝太

和十九年，即公元495年，曾进行了一场几乎是史无前例的改革——史称北魏孝文帝改革。改革的结果是，在北方不但出现了一个规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的局面，而且也为北方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发展。在这样的形势之下，萧衍执政的梁，如果不能够迅速改变自身的社会、政治、经济局面，其后果不要说北伐恢复一统天下了，即使维持对峙也会因失去本钱而不能。这无疑是十分危险的。历史要求此时的梁武帝不但只是一个英雄，还要是一位理想远大、心胸开阔、爱民如子的仁主圣君。

开国之初有一个阶段，梁武帝的确没有令他的国家、百姓失望，也没有令历史失望。

据《梁书》记载，梁武帝称帝以后，他“夕惕思治”。例如，他曾公开贴出告示，征求朝野各方对朝政的意见，并在公车府设了两个函（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两个意见箱），一个叫“谤木函”，一个叫“肺石函”。“欲有横议，投谤木函；……冤沉莫达，投肺石函。”（《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五）凡“不利于民”的政策，只要“具条与闻”，达帝聪，经过斟酌，觉得有可取之处的，便一定施行。在自身生活方面，梁武帝还十分注意约束自己，他十分勤于工作，不讲享受，几近到了苦行僧的地步。在经济方面，梁武帝实行劝农商政策。有时作为皇帝的梁武帝，还亲自“藉田耕作”。在用人方面，梁武帝设立五经博士，专司“吊有忧，贺有喜，送往者，迎来者，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意在发现和培养有用之才，实行任人唯贤的政策。这一点在十分讲究门第出身的南朝着实是难能可贵之举。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使梁朝开国不几年，就一变齐末政治动荡、经济凋蔽、人民流离的局面，使国家很快出现了国富民强的盛况。此时的梁武帝萧衍，作为一个人，其人生获得了

大成功；作为一个生命，其价值获得了大实现；作为一个帝王，其形象获得了大光辉。

这样的成功领袖，倘若再有一点艺术天分那更是一种锦上添花，无可挑剔，而对此梁武帝萧衍是一点也不缺乏。萧衍的父亲是齐高帝萧道成的族弟，因军功封侯。生于侯府的萧衍，在南朝这样一个文风盛行的时代，自然和许多世家少年一样，在文学艺术上都曾下过相当的功夫，有着相当的造诣。的确，年少时的萧衍性喜文学，且表现出很高的天分，他曾与沈约等人以文学才能而同为齐宗室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从事。尽管他后来位登至尊更多靠的是他的武功，但他最初在宗室士子中知名靠的却是文学。

另外，作为开国皇帝，梁武帝还拥有有一个黄金般的年龄，他即位时38岁。在他之前，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登基时已58岁，至于南齐的开国皇帝萧道成，登基时已年愈花甲。他们二位都只做了两年的皇帝便命归西天了，“皇祚”是那么的短，短得不仅连自己纵有万般宏图也来不及展开，而且连继承人也未来得及选好，为日后的“骨肉相残”种下了祸根，也为觊觎皇位的政治强人和野心家们留下了可乘之机。相比之下，以梁武帝萧衍的年龄，足可以使他非常从容地为自己的王朝开一个好头，为自己的子孙作一个榜样，至少可以有足够的时间为自己选择和调教一个好的接班人，将自己王朝的王祚尽量延续得长一些吧！

由此看来，梁武帝作为一个帝王或政治领袖，该有的似乎都有了，剩下的就看他大的有作为。此时，历史是很看好这位皇帝的，尽管只是一位割据王朝的皇帝。

然而，事实上这实在只是人们和历史的一厢情愿。

不知不觉之间，梁武帝变了，变得前后判若两人。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的历代帝王，大凡开国的一代多少总有些文治武功和雄才大略的，他们多数在夺得政权之后，一般也都能励精图治、轻徭薄赋、安土保民、有所作为，昏庸和荒淫一般都出现在他们身后的子、孙身上，相隔短者也有一两代，长者竟有十数代甚至数十代，而在同一个人身上出现先后嬗变的现象似乎并不多见，梁武帝萧衍可算是一个。而在封建时代，皇帝思想行为的前后突变、生命形态的先后蜕化、人格追求的前后反差，往往便注定了这个王朝的必然命运。

终于，冥冥之中注定了的事情发生了。同泰寺的袅袅香火还不曾散去，梁武帝还没想明白，听惯了的晨钟暮鼓忽然之间乱了平时的节奏，台城的紫气就突然之间被无情的烽烟笼罩

了。侯景率领叛军将台城团团围住，一场浩劫就这么开始了。

昨天还是晨钟暮鼓、经幡飘飘，今天便是血肉横飞、刀光剑影；昨天还是锦衣玉食、美女盈怀，今天便是饥不择食、四面楚歌；昨天还是万人之尊、天之骄子，今天便是我为鱼肉、人为刀俎；昨天的归降客，便是今天的夺命鬼；昨天的金鸾殿，便是今天的望乡台。

一切变化仿佛都发生在瞬间。

然而一切变化真的都是在瞬间发生的吗？

当初，侯景以东魏将领的身份拥兵十万、以河南十三州请求降梁，梁臣谢举等人曾激烈反对，但梁武帝以为这是统一中国的绝好机会，理由是侯景求降与他刚做过的一个梦相合。于是梁武帝下令收纳侯景。殊不知，此举不只是一次地地道道的引狼入室，而且立即引起了本是友国东魏与梁的反目，是一次“双赔”的买卖。侯景降梁后，总担心南北和好会使他成为牺牲品，一面竭力破坏和反对，一面准备再次反叛。

梁武帝当年多次出家的同泰寺原址，今日鸡鸣寺。（朱曦昊 摄）



侯景的行为使他的部将都看不下去了，有人偷偷逃到建康报告梁武帝，武帝竟不加过问。鄱阳王、合州刺史萧范密告侯景谋反，梁武帝仍认为不可能。侯景邀羊鸦仁合谋反叛，鸦仁被部将抓住送到建康，梁武帝仅将他关了几几天便一放了事。而对于侯景本人，梁武帝不但没作任何追究，还主动向他作了“道歉”。梁武帝如此一次次莫名其妙的“大度”，终于使自己成了一个十足的东郭先生。

太清二年（548年），侯景据寿县起兵，以讨朱异、周石珍为名，袭取谯州（今安徽省含山县），攻下历阳（今安徽省和县），引兵直趋建康台城。这时梁武帝才相信侯景叛乱是真的了，但一切已经太晚了，他只能在被围的台城中等待活活饿死。

被围在台城中的还有一个叫柳津的人。当时此人有一个儿子叫柳仲礼，正在台城外做统帅，手握重兵，但就是按兵不动。无独有偶的是，梁武帝有个儿子邵陵王萧纶，此时也手握重兵驻扎在城外一步之遥的地方，但也拥兵自重，见死不救。柳津悲哀地对梁武帝说：“您有邵陵，我有仲礼，不忠不孝，贼何由平！”

柳津一语道破了的岂止是他自己的悲哀与无奈，更道出了梁武帝的悲哀与无奈。那么曾经在荆襄大地纵横驰骋的他，曾于战火硝烟中纵论攻战的他，曾于枕席之间夺人社稷的他，一个有才能，有自信，有手腕的英雄，一个有胸怀，有爱心，有韬略的仁主，怎么会变得如此悲哀又如此无奈呢？

答案在哪儿？

答案正在于他的才能、自信和手腕上，也在于他的胸怀、韬略与仁慈上。

如果梁武帝当初对侯景的降纳，多少还有一点道理可说，那么后来一次又一次的纵容简

直就是不可理喻。那么他何以如此呢？他的自信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相信自己的判断绝不会出错，他相信自己看上的人绝不会背叛他，他更相信小小的侯景，即使反毛也绝不是自己的对手。实际上，到了这地步，英雄萧统、圣主梁武帝，已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因为自信与武断，与专横，与顽固不化，与刚愎自用，有时仅相距一步之遥。如果梁武帝只要“民主”一次，小小的侯景的确哪是他的对手！

梁武帝算得上是位“仁主”，尤其是与南朝其他的皇帝相比，更可以这样说，他在建国登基初，就不想对前朝后主格杀勿论，尽管这是南朝每次改朝换代的“惯例”，较之于他的“仁慈”之心，以文风绮靡、诗风柔媚而著称于世的文人沈约倒成了铁石心肠——是他竭力主张剪灭废帝，说：“古今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也许梁武帝见过了太多的杀戮太多的“骨肉相残”，因此，他在位期间一直奉行“骨肉相恩”的政策。事实上，与南朝皇帝的嗜杀相比，他的确不曾“拿自家人开刀”过。然而，仁慈与纵容，与昏庸，与养虎为患，有时也仅相距一步之遥。

举两个例子，让我们来看梁武帝是怎样仁慈地实行“骨肉相恩”的。梁武帝早年无子时，将萧宏的儿子萧正德收做嗣子，后来有了太子萧统，萧正德自然而然还本。梁武帝自然不会亏待他，封他为西丰侯。谁知萧正德却从此不满，不久竟自称是被废太子外逃投魏。谁知魏待他很薄，他竟又逃了回来。照道理说，对于这么个忘恩负义、外逃投敌的侄子应该就此严惩，谁知他不但没有如此，反而还恢复了其西丰侯的爵位。梁武帝有一个儿子萧综，在前线指挥作战，竟临阵投降了魏国，还谎称自己是东昏侯萧宝卷的儿子，与梁武帝有杀父之仇。

就是这样一个将忠孝二字丢至脑后的逆子，梁武帝对他的处罚只是自欺欺人地将他的名字从萧氏家谱中除去，但不久又饶恕了他。他死后，梁武帝还把他埋葬在祖坟旁边。

梁武帝对自己喜欢的官吏也是一味“相恩”。有个叫鱼弘的人，做了几任太守，公然对人说，我做太守，郡中有“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中民庶尽。但就是这样一个贪污腐败、鱼肉百姓的太守，有人把他告到梁武帝那儿，梁武帝竟以自己的省吃俭用做挡箭牌而不加惩处。

梁武帝的“仁慈”，最直接结果便是培养出了一大批萧邵陵、柳仲礼之类的掘墓人。

大概也是他的那颗“仁慈”之心的作用，梁武帝宝座坐稳后不久竟成了虔诚的佛教徒。“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而这南朝的四百八十寺，其中大多数都是梁武帝时代由他下令修建的。一个割据的王朝，修这么多的寺庙，本身就不是个好现象，可梁武帝竟还要身体力行于各种佛事之中。他不惜荒于政事而亲制了《舍道事精文》、《断酒肉文》、《发般若经题论文并问答》之类佛教文书数以百卷；还曾于普通八年（527年）、大通三年（546年）、中大同二年（547年）三次到同泰寺舍身，要出家当和尚。每次都让群臣出钱数亿将他“赎”回宫去，最长的一次竟长达三十七天后才回宫。

由于礼佛，梁武帝持戒、诵经、不杀身。只要一有犯人被宣判处决，他就会整日愁眉苦脸。为此，南宋一位历史学家斥责他说：你在洛口战败，死了多少人？你筑浮山堰又是死了多少人？你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多少无辜百姓死于战火、饥荒，你并不在意，几个罪犯死有余辜，罪有应得，你反而愁眉苦脸，你这是一种天大的自欺欺人，不

但是儒、道的罪人，也是佛教的罪人！

因此，梁武帝被围台城，虽似乎是在一瞬间完成的，但也是一种必然。

我们无法将那个在台城之中因得到侍者的一个鸡蛋而泪流满面的老人，与荆襄大地纵横驰骋、汉水岸边纵论攻战、枕席之间夺人社稷的英雄形象重叠在一起，但他们确实实是同一个人。他在临饿死时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梁之江山，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既是如此，那么他最后的流泪意味着什么呢？恐惧，留恋，后悔，抑或自悼？只有他自己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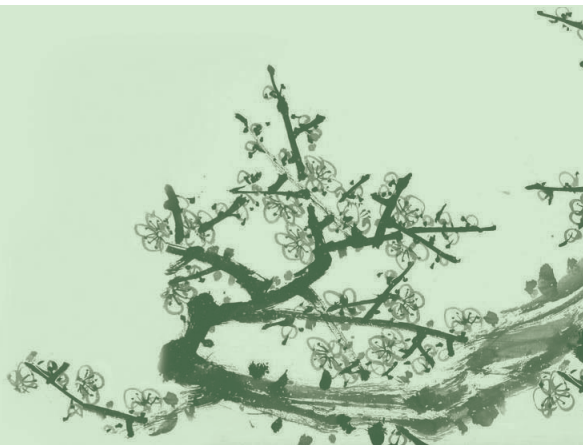
四

我每天上班的单位离台城仅一箭之地，我只要愿意，向窗口一抬眼就能看见台城的宫墙、塔影与柳色。在南京建都的王朝，其寿命总是那么的短，以至于改朝换代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在这儿似乎成了一个保留剧目。其中究竟有着怎样的原因？从古至今，许多的史家、学者都把研究的目光投给了南京，然而他们似乎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如果把一个个王朝的兴盛至灭亡比作一幕幕大戏的话，南京充其量只是这一幕幕大戏的一个演出舞台，要研究这一幕幕大戏的过门关节，最好还是研究演出这一幕幕大戏的主角们，是他们的演出心态和演出表现决定了这一幕幕大戏的风格和走向。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梁武帝倒是一个“不朽”的角色，因为他给我们的启示似乎一时很难穷尽。

诸荣会 男，江苏教育出版社副编审，散文作家。著有散文集《最后的桃花源》、《秋水蒹葭》及历史随笔《晚清背景民国脸》和长篇人物传记《叶名琛正传》等。

何处病梅馆

III 陈 益



我去玉峰山后的遂园赏梅。因阴雨而推迟花期的梅花，终于开放。点点红梅，似殷红之血；片片白萼，如圣洁之雪，一派孤傲的君子气派。遂园，曾是昆山徐氏的私家园林，人们将它精心整葺，叠石理水，遍植梅花，成为亭林园的一部分。疏影横斜间，忽然想起了龚自珍。当年，他正是从徐氏后裔手里买下房屋，名之曰“羽琤山馆”，并写下佳作《病梅馆记》，流传于世。

1839年，清道光十九年，己亥。辞官南归的龚自珍，把妻儿从京城接到昆山，安顿在修葺一新的羽琤山馆。这座别墅位于东塘街富春桥（俗称高板桥）堍，是十四年前龚自珍守母丧服满，作客昆山时，从徐氏后代手里买下的。“筑峻楼三层，最上层……颜其阁曰‘宝燕阁’。”珍藏的古玩中，有一枚汉代美人赵飞燕的玉印，他视为三大宝贝之一。但是没多久，他就回北京去了。如今，他打算在羽琤山馆长住，且以“羽

琤山民”自诩，在这里整理《己亥杂诗》。

龚自珍委请邻居徐屏山（徐圻）从苏州西南的邓尉山购买了三百盆病梅，予以疗救，使其恢复天性。购来梅树后，“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同时写下《病梅馆记》，表达自己的心志。梅树常被人弄成歪斜虬曲状，以此为盆景。但他觉得，崇尚自然、顺从天性、解放个性才是真正的美。这种理念，跟他的诗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一脉相承。

有人认为，龚自珍于道光二十年九月有江宁之行，随后写下《病梅馆记》，所以篇首就是“江宁之龙蟠”。直接起因是他看见了江宁独特的盆梅，而邓尉山民以果梅为业，顺带花期的观赏，三百盆梅花不可能是邓尉山的普通梅树。我想，这样的考据是否太过拘泥？尾句“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

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又该如何解说？岂不是真的要让龚自珍成为园艺师？

病梅馆在哪里？一般认为，龚自珍是在羽琤山馆附近开拓了一块隙地。一百七十余年前，在东塘街上寻找一块隙地并不困难。何况，一个栽种三百盆梅花的病梅馆，不需要太多面积。一些学者引用《己亥杂诗》中的一首“海西别墅吾息壤，羽琤山重拾阶上。明年俯看千树梅，飘摇亦是天际想”，描摹病梅馆的情景。其实，诗人所俯看的千树梅，当在玉峰山下。从东塘街西行至玉峰山，只消一支烟的功夫。依山而筑的遂园、附巢山园、贲园、养徐园、乐彼之园等私家园林，暗香浮动，是早春赏梅的好去处。尤其是位于玉峰山东麓的武陵园，为大学士顾鼎臣的旧业，园中水流曲折可通舟行，两岸栽

种了数百株梅树、桃树。虽然园子在乾隆年间已毁，但老树尚存，绿荫纷披。昔日的玉峰山四周，只有低矮的农舍田地，站在“峻楼三层”的羽琤山馆，他足可清晰地看到苍翠的马鞍状山岭，令神思联翩，诗兴勃发。

玉峰山腰，至今仍保留着两江总督陶澍所建的粤如旷如之亭。清道光十四年，为老百姓解除水患的林则徐途经昆山，选取范成大和陆游的诗句，组成一联“有情碧嶂团围绕，得意孤亭缥缈间”，题写于亭内。四年以后，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沿海查禁鸦片。在他临行前，龚自珍作《送钦差大臣候官林公序》，“献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主张严禁鸦片，坚决抵抗英国侵略者，主张和外国作有益的通商，严格禁止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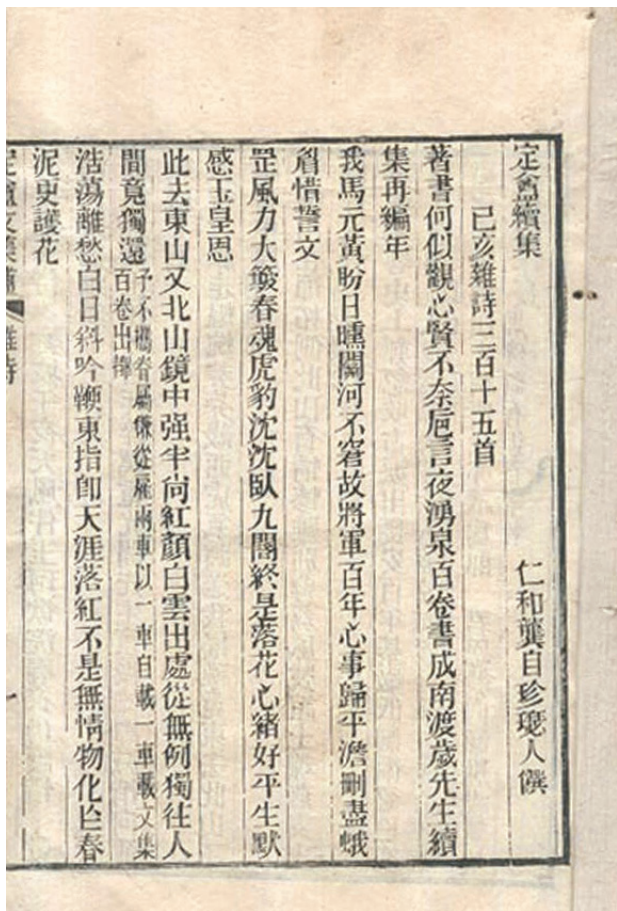


与病梅馆相邻的富春桥风貌犹存

侈品的输入，并且驳斥了各式投降派的有害论调。林则徐读后不由怦然心动，于赴任途中写了复信《答龚定庵书》。而在林则徐奔赴广东的第二年，龚自珍辞官离京，来到昆山。但，龚自珍毕竟不是为写梅而写梅，恰如他不是为了开设病梅馆而来到昆山。

龚自珍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21岁时随母亲到苏州，与文字学家段玉裁的孙女段美贞结婚，龚自珍则是段玉裁的外孙。这段亲上加亲的姻缘，随着第二年七月，段美贞被庸医误诊，在徽州过早地离开人世而结束。道光三年（1823年）七月，龚自珍母亲在苏州去世。两年多后，龚自珍守母丧服满，从苏州作客昆山。龚自珍的舅父段襄（段玉裁长子），死后葬于苏州支硎山。龚自珍曾特意前去祭扫舅父的陵墓。此外，小时候的一个姓金的保姆也住苏州。保姆87岁时，龚自珍去看望她，在《己亥杂诗》中写下这样的一首：“温良阿者泪涟涟，能说吾家六十年。见面恍疑悲母在，报恩祝汝后昆贤。”字里行间充满了怀旧的温情。按理说，龚自珍与苏州有不解之缘，然而，他却把离苏州有四十公里的昆山作为晚年归宿之地，究竟是什么原因？

我想，作为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思想家和一个时代的先觉者，龚自珍与昆山的情缘，应该从精神层面去理解。1839年，正值鸦片战争的前夜，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恶化，清朝统治阶级对内的高压政策也愈演愈烈。敏感而桀骜不驯的龚自珍，对此有切身的体验。正是由于不满官场的腐败和黑暗，与周围郁闷的环境频频冲突，他才愤然辞官南归。《己亥杂诗》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写成的。来到人文荟萃之地昆山，远离烦嚣，秀美的玉峰娄水抚慰着他痛楚的灵魂。修筑病梅馆，象征着革除时弊、挽



《己亥杂诗》书影

枯扶荣的愿望和决心，象征着以疗救病梅的心态，殷切地呼唤九州生气。羽琇山馆的原房主，是当过礼部侍郎的徐秉义，徐秉义的舅舅顾炎武，为明末清初著名学者、思想家，也是诗人。龚自珍与顾炎武在很多方面是相通的。

陈益男，昆山市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学术总监，苏州市作家协会散文分会副会长。著有长篇小说《天吃相》、散文集《我的先祖是蚩尤》等。

苏州的端午龙舟

III 陶文瑜



等候点睛的龙舟龙头排列在金鸡湖岸边

一年好比是一趟单程公共汽车，时令和年节就是一个一个停靠的站台。各地方的公共汽车是同一个时间出发，同一个时间到达，因为地域的关系，北方穿着皮衣还有点缩手缩脚，到了南方的海滨浴场，就只有打赤膊的份了。天气有冷热，衣服有多少，日子却是同一天，没有说这里在过元宵节，那里刚好是中秋。还因为风俗习惯的关系，有些地方的公共汽车只停靠几个主要站台，春节、清明、端午、中秋，差不多就这几个吧，有些地方的公共汽车几乎是逢站就停，没走多远就是一个站台，刚出一个站台，又到另一个新的站台了。比如苏州，生在苏州要有个思想准备，就是精神抖擞地迎接一个又一个时令和年节。

苏州像一个过节爱好者，或者是一个过节专业户，说到底呢，还是这方水土历史悠久物产丰富吧。因为历史悠久，留下了更多的风气习俗，照着流传下来的脚本过节，是纪念先人，是不忘根本。生在现代的苏州人，是接力赛中

的一棒，接力赛是两千五百多年前开始的，第一棒是泰伯，伍子胥也在这片赛场上跑过，现代人跑得好，非但脸上有光，还能很圆满地传下去，一直到源远流长。物产丰富是这方水土素质好，是大自然的恩宠再加上大家辛勤的劳动，然后一时有一时的特产，一季有一季的收获，所以过节是对这方水土的感恩，也是对自己的鼓励。

现在时代发展了，一些洋节也挤到日子里来，情人节啊，圣诞节啊，这是公共汽车增设的临时停靠站，不会影响原来固定站台的停靠，也不会冲淡大家对传统年节的感情，不少人过情人节或者圣诞节，几乎就是图个热闹的逢场作戏，心里在乎的，还是流传下来的逢年过节。

其实我是想说端午节的，原因有两条，一是端午节一项重要活动，就是划龙舟，好久之前，我就听说苏州的划龙舟与伍子胥有关。另外苏州人过端午各式各样的风俗习惯有好多，有的我也只是听说，有的我曾经亲身经历过，有的现在已经见得少了，有的现在还是这样讲究呢。我一直想将这些理出个头绪来，整理归纳一下，

越是上了点年纪，这个念头就越是强烈，因为原来过端午全是老人张罗的，后来由父母负责，现在父母老的老了，走的走了，一晃我就成了握着接力棒的现役运动员了，俗话说吃什么饭当什么心，我是做文字的出身啊。

二

有关历史文化的文字，也容易写也难写，说容易你就像一个开着东风卡车的搬家队，古人的书是一幢老宅，现在的书是一所新居，你就是将老宅里东西，擦一下灰尘，然后搬进新居就行了。但这样做大家还不如去看古书呢？至多将古书翻译成白话文再出版一下好了，所以就难了，因为谁也没有活过几千年呀，除了书本，有关从前的线索，上哪儿去寻找呀？

照这样说类似的文字就不能写了吗？不是的，首先主观上要知难而进，不能怕苦畏难。客观上也要做个有心人，比如说写到苏州端午的划龙舟，坐在电脑前面，将从前的文字，在自己脑子里变成画面，再把画面描绘出来，这是一种办法。到胥江的河边上或者觅渡桥去实地走一下，也是一种办法。古人们都走远了，但山水还在，眼前的流水，就是他们留下的线索，沿着流水顺藤摸瓜，你能看到从前的自己在水面的龙舟上划桨，或者在岸上的人群中呐喊。

说起来我这个年纪的人经历还是比较丰富的，几十年光景，陪着大家经历了太多的是非曲折千变万化，我看到和经历的东西，有一些前人想到了都以为自己在做梦呢，还有一些是前人想都没有想过的。但偏偏苏州的龙舟，以前却是没有见到过，千百年前我没赶上，现在，有关方面开始恢复苏州的龙舟竞渡，千百年后的我可不能错过了。

按说苏州是水乡泽国，划龙舟是很应景的项目，但这是一个集体项目，是兴师动众，凑成一条船还不行，还要找到对手，按照目前的建制，起码是区或者街道出面组织，才能搭起来像模像样的场面。

还有人说，苏州人比较温和，不太争强好胜，他们把龙舟改良了，改成画舫了，争先恐后变成悠哉游哉了。这个说法我是不太赞成的，苏州人的特点其实比较要面子，要面子说到底就是争强好胜，苏州有点像水上的潮头，表面看上去不是急急忙忙朝前面赶，其实却是名列前茅地汹涌澎湃着呢，所谓流水不争先，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再一点苏州是水乡，水到了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地步，大家自然会生出好多水上的花样来打发，龙舟是一样，画舫是另一样，一天到晚划龙舟，那是很蛮劲的事情，就像田径，如果三天两头开全运会奥运会，怎么受得了，龙舟是运动会上的田径比赛，画舫是平日里花前月下的休闲，这两样一个都不能少。

体育项目中，马拉松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所以现在的比赛，是比出一个名次，也是一次纪念，有了纪念更多的就是文化了。

划龙舟也是这样，有一些动人的故事，有一份美好的寄托，就是有一个纪念吧，有些地方纪念的是三闾大夫屈原，苏州纪念的是伍子胥，这样的纪念，是一方水土的冬暖夏凉，是一代一代心里不朽的生长。

三

我还想说两句有关纪念的话题，乍一看纪念是对先人的缅怀，是对自己的激励，仔细想想一个地方纪念越多，素质就越好，底气就越足。有了这么多的以古为镜，就能做到荣辱不

惊了，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插进去这么多的纪念，非但日子丰富，过起来也是不慌不忙了。比如生在苏州，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大户人家出生，不是虚荣，也不是爱富嫌贫的心理，跟钱没多大关系，或者说跟钱的多少没关系，跟钱的技术含量有关吧。有些人的钱，是做小生意挣的，有些人的钱是做大买卖挣的，苏州人的钱，好像都是从琴棋书画风花雪月中来的。当然这仅仅是我的一个感觉。说到底不管是挣钱和花钱，或者干什么别的事情，苏州人都有一种风度，别人似乎学不来的，苏州人似乎不学就会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苏州有了这么多的纪念。

划龙舟比较书面的说法是龙舟竞渡，龙舟竞渡是端午的重要节目，各个地方都是在端午前后举行的吧。有关屈原的说法是屈原投江之后，乡亲们划着船奋力去抢救，后来将船打扮成龙头龙尾，一划起来仿佛蛟龙出水，吓退那些啄食屈原尸骨的鱼虾。但是龙舟竞渡在早于屈原的很多年前就有了，春秋时候的青铜器和战国楚墓的帛画中，都有龙舟竞渡的刻划，《穆天子传》和《楚辞·九歌》中，也有龙舟竞渡的描写。《楚辞·九歌》的作者就是屈原自己呀，你总不能说屈原生前就知道自己将来要投河的，然后天下百姓为了纪念他会发明一项龙舟竞渡的活动的，这也太电视剧了。现在大家一口咬定说龙舟竞渡就是因为纪念屈原而诞生的，很大程度上，还是天下百姓的善良和真诚。

之前就有龙舟竞渡这一个习俗，屈原投江之后，大家就将两者比较合情合理地结合在一起了。同样的道理，苏州人的龙舟竞渡纪念的是伍子胥，而伍子胥之前，应该就有类似的项目存在，伍子胥之后呢，苏州的龙舟竞渡就有了旗帜鲜明的主题，就从春秋战国算起，这一项活动，已经延续了好几千年了，这样的坚持，

伍子胥苏州石刻像，刻于清道光七年（1827年），孔继尧绘，石蕴玉正书赞，谭松坡镌，为《沧浪亭五百名贤像》之一。



是对英雄的缅怀和赞赏，也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品德。现在苏州端午节要申报国家级文化遗产，其中就包含了对于这种品德的肯定。

苏州人对伍子胥这样满怀深情，一个原因是伍子胥和屈原一样，都是忠君爱国却受到陷害最后以身殉国的仁人志士；另一个原因还因为伍子胥对苏州的特殊贡献。当年伍子胥从楚国投奔到吴国来，吴国还是僻处东南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国，伍子胥对吴王说，你想称霸一方一定要先建立城池，然后完善守备，再有充足的库存，这样才能发展壮大。吴王听了他的话说，就照你的意思去办吧。伍子胥“相土尝水，象天法地”，并在公元前514年建造起了阖闾大城，也就是最初的苏州。

四

在苏州，伍子胥相当于一位长辈，一位经常走动的亲戚，或者就是住在隔壁的邻居。是

一堆人在一起，能说到一起的话题，而且老说也说不完，也还有兴致。

伍子胥是春秋战国时楚国大臣吴奢的儿子，春秋战国时期的秩序很乱，大家割据一方，国家多了国王也多，国王多了难免出些个鱼目混珠的领导，迫害忠良的事情就时有发生。伍子胥的父亲和兄长，就是这样被楚王杀害的，楚王当然也不想放过伍子胥，所以布卡设岗紧追不舍。伍子胥几乎是九死一生了，一路东躲西藏来到昭关这个地方，心里烧着复仇的火焰，眼前又是这样的生死攸关，这一怒一急，伍子胥乌黑的头发胡子，竟然在一个夜里全变白了。所以看守哨卡的楚国士兵，很例行公事地问了两句，就把伍子胥放过去了，也因此埋下了日后伍子胥东山再起杀回老家的后果。

伍子胥来到吴国之后，辅助吴王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这样的变革也是卓有成效的，几年之后，当时东南地区的一个小国，已经是兵强马壮雄霸一方，几乎有点超级大国的意思了。已经功成名就的吴王，对伍子胥说的一点也听不进去了，反而认为伍子胥是小题大做，是存心要和他过不去，再加上越国的特务间谍煽风点火，吴王竟然下了一道圣旨，要伍子胥自杀。待伍子胥死后，吴王还是一副余怒未消的样子，命人将伍子胥的尸体“盛以鸱夷之器，投之于江中”。

有关伍子胥生前的故事，言简意赅地表达，

就是这么多。其实说了这些前因后果，就是要引出“盛以鸱夷之器，投之于江中”这么一句话，因为这句话和端午的龙舟竞渡有关，伍子胥的尸体投到江中之后，老百姓就在江上划船打捞，之后每年端午，老百姓就丢下手头的工作，在水上划着船纪念伍子胥，这应该是最初的龙舟竞渡了。

五

有关伍子胥和端午时候的龙舟竞渡，还有一些其他说法，基本上是大同小异吧，大同全是因为伍子胥，全是为了表达敬仰和纪念，小异是出发点和契机不一样。

话说伍子胥屈死之后，吴王还有点不解气，将伍子胥的头割下来，挂在胥门口的城楼上，这时候攻打吴国的越国军队正好经过这里，他们猛一抬头，看到城楼上伍子胥孤零零的人头是巨大无比，而且目光炯炯有神，头发胡须也是一根一根松叶一般地竖在那儿，怒火中烧又威风凛凛，这些越国的军队吓得丢盔弃甲四处逃窜，按照文言文的说法是：“飞石扬沙，疾于弓弩，越军败坏，松陵却退，兵士僵毙，人众分解，莫能求止。”

但是越军马上站稳了阵脚，而且卷土重来，为什么呢？因为越军中有范蠡和文种，他们两人连忙赶到胥门口，拜会伍子胥，希望能够借



道通过，具体对伍子胥说了什么，历史上没有记载，可以想象的应该是，我们虽然各为其主，也都是成名的英雄，说到底我们这些英雄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希望天下昌明，国泰民安，我们这些英雄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顺应历史潮流，你说是不是？

话到这个份上，伍子胥目光垂下来了，须发也不张开了，他毕竟还是被范蠡和文种说服了。

历史往往会有不断的重复和惊人的相似，没过多久，文种遭遇到和伍子胥一样的命运，《勾践伐吴外传》中说道，“伍子胥从海上穿山胁而持种去，与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潘候者，伍子胥也，后重水者大夫种也”。

这时候伍子胥已经是担任分管水域的神仙了，作为具体分管的领导干部，他亲自去迎接文种，这也是英雄和英雄的惺惺相惜吧。

老百姓内心本来就与伍子胥很亲近，又听说他成了水上的神仙，祭祀和纪念就更是名正言顺了，苏州水上的龙舟，开始与伍子胥息息相关了。

当然这些有关伍子胥的传说，比较民间故事。民间故事是一些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文字吧，大家就通过民间故事来阐述一些东西，民间故事的表达，有两点很明显的特点，一是在思想和意志上，恩怨分明主题鲜明，二是在表现形式上虚处入手生动婉转。

六

古代两国相交，往往一方有这样的利用，另一方就有那样的缺陷，一方有这样的顺水推舟，另一方就有那样的半推半就。按说天上是掉不下馅饼来的，天上掉下馅饼来了，其中一

定有什么猫腻。偏偏捡着馅饼的人不这么想，捡着馅饼的人认为，天上就是会掉下馅饼来的，比如吴王夫差，一来二去的没多久，自己的国家，就成了越国的领土，自己也做了勾践的俘虏。吴王夫差发觉自己上当的时候，已经来不及迷途知返了，因为这时候伍子胥已经不在。吴王在大江边“临江作塘”，设奠祭祀伍子胥，希望死去的伍子胥看在从前的情义上，保佑吴国化险为夷，但有些错误犯了以后是可以改正的，也可以重新来过的，有些错误却是无法改正了。

《吴越春秋》说，吴王将伍子胥的尸体投到江中以后，伍子胥就化为神仙：“随流扬波，依潮来往，荡激崩岸。”老百姓本来就固执地认为，伍子胥已经化作水上的神仙，现在吴王设奠祭祀，就更加坚定了这个想法。

越王勾践呢，一开始有点挑拨离间，希望吴王去对付伍子胥，一旦吴王把伍子胥杀害了，他就面孔一板说，这样刚烈忠贞的大臣都杀了，吴王真是太昏君了，不讨伐他讨伐谁呀。范成大在《吴郡志》中说，越军进入吴国东南的江口之后，“立坛杀白马，祭子胥，杯动酒尽，固立庙于此江上”。这样的祭祀，老百姓也是看在眼里，对于伍子胥的信念是牢不可破，对于伍子胥的纪念也是一年一年地天长日久，具体的做法，就是五月端午的龙舟竞渡。

龙舟竞渡的船，一般都是隔年留下的，船不能放在水上，要搬放到屋子里，到了端午前的十来天，将船从屋子搬出来，翻倒着放在河边，然后给龙舟上漆。上漆的日子，一般是个阴湿天气，这样上好的漆，色泽鲜明厚实，而且不易脱落。

陶文瑜 男，《苏州杂志》副主编，著有诗歌散文集十余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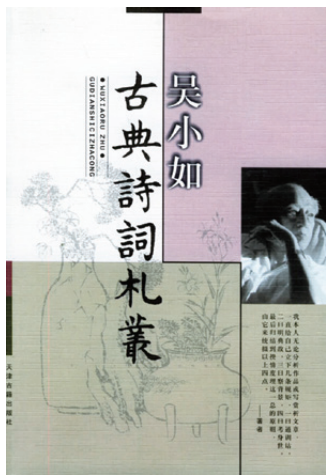
读书旧记四则

III 顾农



《古典诗词札丛》

本师吴小如先生的《古典诗词札丛》（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包括他先前出版而早已售缺的《诗词札丛》、《古典诗歌习作与鉴赏》两部



书中的大部分内容，又加上后来新写的谈诗词的赏析文章，凡一百二十余篇。集中起来重新学习一遍，又有了新的收获。

如果再加上《莎斋笔记》（“现代中华学人笔记丛书”之一，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7月版）第二、三两卷（即“读诗散札”与“读词臆札”）中那八十多篇，总计先生的赏析文章在二百篇以上。林林总总，蔚为大观。

四十年前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完整地听过吴先生两门课：中国历代诗歌选、中国历代散文选，后来能搞一点古代文学的教

学和研究，根本的基础在此。所以凡是吴先生新出诸书，必一一细读。这等于是继续听课，温故知新，大好机会断乎不容错过。

吴先生是诗歌鉴赏领域的前辈和权威，他的大量赏析文章不仅立说有据，言之成理，而且新意迭出，发人深思，在古典文学爱好者、研究者中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吴先生似乎一向很少谈理论讲规律，这次在《古典诗词札丛》的代序中则提出了一小段提纲挈领的要义云：

……至于我本人，无论是在课堂上分析作品还是写赏析文章，一直给自己立下几条规矩。一曰通训诂，二曰明典故，三曰察背景，四曰考身世。最后归结为揆情度理这一总的原则，由它来统摄以上四点。

一条原则，四个支撑点，这真是金针度人。回想吴先生当年给我们上课时大家听得那样入神，也正是因为他的内容既新鲜活泼，又完全合情合理，每树一义必有足够的训诂考辨为其依据，将文献研究与文学鉴赏结合得天衣无

缝，直指人心。现在重读吴先生前前后后所写的赏析文章，进一步感到非如此理解不足以与古人对话。微观研究而能做到通训诂、明典故、察背景、考身世，那还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吴先生的赏析诸作之所以那样引人入胜，百读不厌，根本原因正在于“揆情度理”，这四个大字实在是读古人作品的不二法门。

最近若干年来，宏观研究受到重视，长篇大论很多，这当然是很好的事情；可惜有些大著在涉及到具体作品时却每有硬伤，甚至闹些笑话。这种情形表明：无论用什么路径研究古代文学，对具体作品的准确理解乃是必备的前提。作品尚未弄通，什么微言大义崇论宏议都是空的。作品赏析、微观研究决非小儿科，而是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一味天马行空是干不成什么事情的。

《南国烟柳》

宋词先生的历史小说《南国烟柳》（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后来重印过多次，是一部很好看的书，故事生动曲折，人物把

握得很准确，行文大雅大俗，引人入胜。读此名妓艳史，人们不仅可以很感性地了解秦淮河上大明星柳如是一生极不平凡的遭遇，对明清之际历史一角的本来面目，也能够增加许多生动有味的认知，得到审美的享受。

不过其中也偶有出格之笔，姑举可以量化的一例来看。本书第二章“魂断西湖”开始的部分，写柳如是二十二岁那年应汪然明之约到

杭州，乘汪先生著名的画舫“不系园”游湖，于是介绍该船道——

“不系园”全部是木兰造成，无一杂木，可算是真正的木兰舟。船不大，长六丈二尺，宽五丈一尺，登上楼好像踏进小巧精致的庭院……（汪然明）在西湖上有许多游船，取了各种佳名，什么“团瓢”、“观叶”、“雨丝风片”、“随喜庵”，最名贵的当然是“不系园”。

长六丈二尺，宽五丈一尺，算下来面积超过350平米，这是很大很大的游船了，而且整个船体近乎方形，体制比较古怪。乘这样的方舟游西湖恐怕未必方便。名士汪然明何以干起这等煞风景的事情，很令人起疑。

查汪然明的材料，才知道“不系园”并没有这么大这么方，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中册引《春星堂诗集》卷一《汪然明小传》云：“创画舫于西湖，曰‘不系园’，曰‘随喜庵’，曰‘团瓢’，曰‘观叶’，曰‘雨丝风片’。”夹注中又引用《春星堂诗集·不系园记》载，“（天启三年）癸亥仲夏为云道人筑净室，偶得木兰一本，斫而为舟，四越月乃成，计长六丈二尺，广五之一，陈眉公先生题曰‘不系园’。”由此可知该船的宽是长的五分之一，即一丈二尺四寸左右——这才像个船的样子。面积80平米多，这已经要算是很壮观的画舫了。

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历来以资料丰富著称，关于该船，书中又引汪然明本人的《崇祯元年花朝题辞》云：“余昔构‘不系园’，有九忌十二宜之约。对骚人韵士，高僧名姝，啸咏骈集。董玄宰宗伯颜曰‘随喜庵’。”据此可知“随喜庵”并非另有其船，它就是“不系园”，只是先由陈眉公给它一个雅称，后来董其昌又给了它一个新的别号。



《南国烟柳》运用史料极见功夫，大处无一字无来历，小处移花接木，腾挪变化，尤多妙悟。历史小说非得有若干虚构不可，一切照本安排那就完全无从下笔，勉强写出来也是所谓“教授小说”，一定不会好看。但一条画舫的宽度，似无所用其虚构，一定要把它弄成那么方方的。我疑心这里乃是作者一时走眼，把“五之一”看成“五丈一”了。这种小小出入然完全无关全书宏旨，特别提出来无非聊资谈助而已。

《柳如是别传》也是很值得一读的好书，其征引之博雅，考据之精审，均前无古人；偶有议论，亦复精彩绝伦，益人神智。只是此书有三大本，枝叶纷披，又是用文言文写的，容易令读者望而却步；如果不怕费劲，硬读下去，那是很有兴味的。如果将小说《南国烟柳》与这部学术名著合并来读，打通文史，则尤为有益有趣。

译本《莫吐儿传奇》

姚以恩教授的中译本《莫吐儿传奇》一书，最初出版于1957年。近年来少年儿童出版社将这部儿童文学名著名译又重版了一次（2007年6月新一版），列入《双桅船经典童书》第三辑（每辑十种）。当年阅读初版新书的人，现在该全都退休了吧。

如果认为童话只适合儿童看，那是很大的错误。童书也很适合老年人看，如果我们不反对永葆赤子之心或返老还童的话。这几天我一直在看这本书，看得很起劲，仿佛回到了不识

愁滋味的少年时代，更完全忘记了窗外似火的骄阳或如绳的豪雨。

《莫吐儿传奇》的作者、俄国籍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赫姆（1859—1916）是一位讲故事的天才，也是一位幽默大师。他很早就被称为犹太的马克·吐温，而马克·吐温却说自己是美国的肖洛姆·阿莱赫姆。

肖洛姆·阿莱赫姆虽然出生在乌克兰，去世于美国，却一贯用本民族的口语意第绪语（Yiddish）写作。《莫吐儿传奇》是他晚期的作品，全书用一个可怜的孤儿莫吐儿来讲自己的经历，反映在沙俄政府多重压迫下犹太人的悲惨生活，但其中充满了天真的童趣，有许多带着辛酸的笑容。在这个小顽童眼里，许多悲惨和不幸，都是很好玩的事情。莫吐儿后来跟着家人偷越国境，打算到美国去淘金，在漫长的途中，他和家人颠沛流离，得不到安宁和幸福；但这小家伙依然一直很快活。

高尔基读过这本书以后写信给作者说：“您的书我收到了，读过以后我笑了，也哭了。真是一本绝妙好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再说一遍，这是一本了不起的好书。整本都洋溢着对人民的深厚、亲切而真挚的爱。”（转引自姚以恩《“‘P生’即是我”——记茅公给我的一封信》，《文学报》1996年7月4日）

肖洛姆·阿莱赫姆是个喜爱欢笑甚过眼泪的人，他一向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揭露社会的黑暗和不公，讴歌人间的友爱和互助。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希望世界变得和谐幸福，而且相信这样的时代总会到来。

姚先生的译文生动流畅，曲传原作风趣，而且琅琅上口，在翻译界读书界历来得到很高的评价。萧乾先生说过，《莫吐儿传奇》“对我却像是浓缩的狄更斯或马克·吐温，也那么幽默、



真实、感人。而且姚以恩的译文又多么上口啊！”
（《漫谈读书》，《瞭望》周刊 1985 年第 1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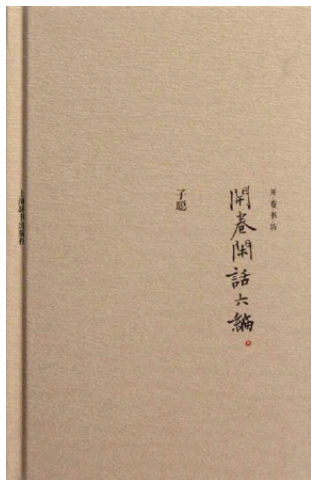
我手上的这一本是译者惠赠的。我同姚老先生邂逅于一次本来与我无关的饭局，比邻而坐，酒没有怎么喝，却很谈得来，可算是一见如故。他没有半点前辈的架子，乐呵呵的非常健谈。活得很快活很潇洒，实为养生长寿之道。在赠我的这本书上，除了题赠的签章外，还有一枚闲章，文曰“不厚鲲鹏不薄乌”，刀味十足，不知出于哪位名家之手。不厚不薄，以平常心平常心看世界——这大约是这位八十多岁老顽童觉得这世界很好玩，因此能够健康长寿的一大原因吧。

《开卷闲话六编》

新世纪以来，各地涌现出不少民间读书刊物，又有以报纸或以书代刊形式出现的，因为没有什么官气，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在这些刊物中，南京的《开卷》大约是资格最老，出版最正常，水平也最高的一种。

该刊每月一册，篇幅无多（只有一个印张），形式简朴大方，内容丰富多彩，读来很有趣。每卷之末总有编者子聪先生的《开卷闲话》，将读书界之种种记录下来，其中该刊作者、读者的来信与日记占了很大的篇幅，读起来很好玩的。

过一段时间，子聪就把先前陆续刊布的《开卷闲话》汇编成册，正式出版。最近的一册《开



卷闲话六编》（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 年 7 月版）收录 2009 年 6 月至 2010 年 12 月的“闲话”，附以《开卷》创刊十周年座谈会发言纪要。这个座谈会是在 2010 年 4 月召开的，事先我也曾得到通知，因为内人生病，又一向怕开会，就没有去，当时想：反正稍后在《开卷闲话》里总会了解到会议概况的。每期《开卷》寄到后，正文我一般只选读几篇，而卷末的《闲话》是一定通读的——这是我情报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每一次的汇编前皆有多篇序言。为这《六编》作序的是黄裳、钱伯城、罗飞、文洁若、陈学勇、汪家明六位，阵容之豪华，颇不可多见——这也可见《开卷》的人脉和人气都相当了得，非同小可。其中陈学勇先生是我五十年前的同窗，可以无话不谈的。但他这序言中却有我不敢苟同的地方。他说：“现在的‘民办’——之所以打上引号，是因为完完全全地由民来办，很难的事——读书刊物越来越多，亦不乏颇具特色者。”（序言第 15 页）这话有点费解，世界上自然有官助民办或官督商办的刊物，但也确有完全民办的，《开卷》即是如此。刊物背后需要有经济上的支撑那是当然，但这不妨碍仍为民办——除非官方忽然给子聪阁下拨来一笔办刊专款。

《六编》正文中也有令人不敢苟同的意见，例如有人写信给子聪说：“近两年来，‘闲话’越来越趋于资料化，而少了趣味性”，对于“闲话”中记载若干与该刊有关而新近去世之文化老人的信息尤有微词，说是“那些资料，网上一搜一大把，而且远比你的详尽。基于对老知识分子的尊重，讪闻不是不能发，但总该有些特点，可以换个角度嘛”（第 81、83 页），如此等等。多一点趣味性当然很好，但讪闻而讲趣味实为

人情之所难，何况资料性似亦无可厚非。我读《闲话》，就一向看好它的资料性。学勇兄序言中有道：“《开卷》的文章我未必篇篇寓目，后面的‘闲话’则一段不漏。它有许多信息，特别希望从中获悉熟人的近况，我平素慵懒，疏于联系，借这里见上一面，得些愉快。这些信息，零零碎碎，断断续续读来，也许不很起眼，汇集成一册数册，若干年后，有心人会发现它的史料价值。”（序言第17页）此乃见道之言，极得我心。鲁迅先生1935年10月29日致曹聚仁的信中有云：“近人印古书，选新文章，却不注意选报，如果择要剪取，汇成巨册，若干年后，即不下于《三朝北盟汇编》矣。”按《三朝北盟汇编》一书，南宋徐梦莘编撰，250卷，记北宋政和七年至南宋绍兴三十二年之三朝（徽宗、钦宗、高宗）四十五年（1117—1162）间南北战争与和谈的情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有些内容亦颇细碎，而且并不追求趣味性，但此书一向得到高度重视，尤为治宋史者案头所必备。

在《开卷闲话》及其汇编里，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这又是它的一大价值。

《闲话扬州》的闲话

III 丁帆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化界曾经发生了一场震惊全国的“学案”，这就是被称作“龙阳才子”的易君左写了一本《闲话扬州》的小书，而引起的一场官司。扬州的各方贤达组成了“扬州究易团”，不仅对易君左进行了声讨，而且官司一直打到省法院。就因为易君左在书中写了扬州的妓女，扬州人就以“龙阳余孽”污蔑扬州和扬州人为由，进行了鞭挞。到头来易君左在强大的地方势力压迫下，不得不在当时的首都南京登报致歉并离任了江苏省教育厅编审室主任之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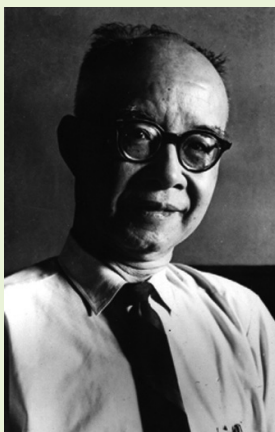
如今，此事已过去80年，但凡一些在八九十岁以下的人，很少有人知晓此事，知其一二，亦不过道听途说而已。20多年前，朋友找来扬州古籍书店经销的，由黄山书社1993年3月出版发行的《闲话扬州》一书，一口气读完全书，便感觉到传统文化教育下所产生的素养认知的错位，实乃民族文化的悲哀。有些话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我并非扬州人，但我客居扬州14年，将青春时光全都消磨于斯，扬州在我的一生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读了易君左的《闲话扬州》，我并不认为它有何“丑化扬州风土，侮辱扬州人

顾农男，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闲话扬州》旧书影



易君左

人格”之处。正如鲁迅先生写了《阿Q正传》，我们不能认为鲁迅先生就是侮辱了绍兴人，尚且还是一种精神“自宫”。褻渎了中华文化，污蔑了中国人的人格一样，这种文化上的引喻和比附完全是一种堂吉珂德与风车作战的战斗精神。倘若不是一种闭关自守式的文化盲动行为，那么，就是缺乏一种大度的城市精神。在这本小书中，所引起争议的，无非是易君左以一个当时生活在南京的“外乡人”（湖南人），一个散淡的文人眼光审视了扬州的风物人情以及人文环境，其中《扬州人的生活》最为“犯忌”。原因就在于易君左说了“全国的妓女好像是由扬州包办，实则扬州的娼妓也未见得比旁的地方高明”之类的“闲话”。然而，考察全书，若没有了这些“闲话”，此书不就变成了“扬州风物志”之类的技术性读物了吗？而删除了“闲话”，作为散文小品，其人文精神文人审美情趣又着落于何处呢？！

作为一个文人，易君左在文章中完成的自我文化批判定位以及民粹意识的社会自省，应该是无可指责的。他对“精神萎靡，烟容满面，放鸽看戏，随处小便”的某些国人陋习的概括，应看作是对整个民族文化心理一个缩影的自嘲；

他对“满眼土地庙，垃圾成堆，污水横流”的“乌烟瘴气”的扬州人文环境作出的批评，应看作是对整个中华文明背景的反省。即便是对某地的人文精神的环境作出实指性的文化批判，亦是无可指责的，何况我们绝不应该将作者的文化批判视角硬行拉入道德评判的范畴。退一万步来说，即便易君左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但他也有表述自己观点的自由，我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我们应该坚持维护他说话的权力。

我不能用“遗老遗少”这个词来形容当时参与“扬州究易团”的各方贤达，但我以为这场“闹剧”的成因却是由于对文明认知的错位而引发的，而这种错位，则又是因为当时文化教育中的文明而决定的。

作为历史名城的扬州，自有她的文化魅力；而作为这一城池文化保守劣根性亦是显而易见的，她亦不是易君左一部小小的《闲话扬州》所能概括的。郁达夫、朱自清这样的大文人同样也在自己的散文中对扬州的人文环境和人文精神颇有微辞。作为这块古老土地的历史见证人——知识分子，应在这历史文化的钩沉中，找到其今天文化的脉络与正确走向。只有完善一种文化和文明的批判功能（哲学层面的），才能完善知识分子自我，才能完成启蒙大众的文明教养职责，尽管如今这种“布道者”的鼻子上被抹上了白粉。只有完善国民文化素养的提升与开放，最终才能完善文化城池的净化。

作为闲话的闲话，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果然也引起了南京和台湾的扬州同乡会一些人的诟病，为此，我仍强调一句：此乃闲话，但非闲话也。

丁帆 男，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红豆树下

III 邬丽雅



“红豆树下”，不是个方位词，它是个名词，说白了，它是个村子的名字。

有人跟你说红豆村的时候，你要问明白，是说的自然村还是行政村。其实，当地人是知道的，说“红豆村”是说行政村，说“红豆树下”是说自然村。

饶舌了半天，我们可以去红豆树下了。这样的说法，是不是还是觉着怪怪的。对，我们要进村去！

进村，你会先触摸到她的名字。这是个太诗意的村名了，一千三百年前，王摩诘就给诗化过，一直诗化到如今，红豆的百姓就是这么认为的。“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豆最相思。”不管王维当初是在哪棵红豆树下生发了诗情，这棵在“南国”纬度最北的红豆树，一定还是“南国红豆”。只可惜，跟我们的方言一结合，好多人却听不懂去了。我小时候也老是弄不明白，怎么一个村子就叫了“红豆乳腐”呢？不是我年幼无知，确实有那些不识字的老叟老妇这样以讹传讹地叫着。红豆树下，就成了红豆乳腐。及至成年，方知“树下”非“乳

腐”。但，仍然觉着古怪，怎么一棵树下就是一个村子呢？我们这里的村名多“庄”、“家堂”。庄，好理解，村庄啊。家堂，指的是祖宗呆的地方，一个村子，常常只有一个姓氏，或以一个姓氏为主。这样，“家堂”做村名也能理解。再多的，就是跟水相关的名字，什么桥，什么坝，什么河，什么渡，什么湾、什么泾等等等等。这里很少用树来给村子命名的，除非那颗树无比奇特。

在我的印象中，只有三个以树命名的村子，红豆树下、银杏树头、皂荚树头。银杏树，本来就是植物中的活化石，且在我们这地儿，往往跟佛家道家的院落紧紧相连，农家庭院，一概不兴种银杏，巨大银杏，一定会有来头，这内中情由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表明。这样，一颗参天的银杏命名一个村庄，便是这个村的善缘。皂荚树，大概因为是江南人孤陋寡闻，难得一见此树，抑或皂荚树头本来是个袖珍小村，一棵树就完全覆盖了它，就用那村里最大个头的东西命名吧。而红豆树，是怎么地呢？说她如银杏似的积淀了诸多文化，不尽然。说它和皂荚树一样难得一见，也不尽然。直至现在我终

于想明白了，它是集了“难得一见”和“文化积淀”于一身的奇树！那么这个村子即使不用红豆树命名，坊间俚语口口相传也一定会叫出这个名字，这是铁定的。

因为方言“下”与“坞”音近，有点文化的人，便自作主张将“红豆树下”写成“红豆树坞”，仿佛这样可以增强它的诗意或者文化内涵似的，真正的画蛇添足。红豆树下，就是水乡平原上红豆树下的一个诗意村庄，她自己的诗意，自己的文化已经足够丰富了，不需要任何牵强附会的拼接和粘贴！

进村去，你不能不触摸红豆树。红豆树，就在村口。我们去的时候正是农历六月，也正是满树盛花的时节，这时，红豆树宛如深居简出丰韵万方的少妇，静驻红豆院，蓊郁的树冠上，缀满未熟的豆荚，碧绿碧翠，阳光投去，晶亮晶亮，宛如翡翠雕成。红豆院原本是村民周家宝的家。据周家出嫁在外的女儿说，红豆树后来曾与七家人家有关系，到现在，她只属于一家，那就是国家。周家女儿说这些话的时候，平淡而坦然。村里已经弥漫着午饭的馨香，她依然

快活地跟我们讲述幼时在红豆树东洞里躲猫猫的经历。

江阴市里给红豆树的名头叫“奇树”，跟奇人徐霞客、奇碑心经碑并列为“三奇”。村民不关心这些。村民说红豆树是“仙树”。仙在哪里？

首先，村民说，树是仙人种的。历来的文字记载相传为梁昭明太子萧统所植。昭明太子为何回来顾山镇，是因为到顾山香山寺编修《昭明文选》。当时的香山观音禅寺，香火鼎盛，太子既是代父出家诚心礼佛，又是来修《文选》的。那么怎么会修《文选》修到这个小村里来的呢？据说是和一个尼姑有段恋情。当时，太子得空闲在古塘集市视察民情，偶遇漂亮尼姑慧如。两人谈佛论释，甚是投机，这样，慧如的美貌和才思动了太子心境，太子跟踪慧如到草庵，谈佛论释变成谈情说爱。但是最终，殊途不能同归，一个太子，一个尼姑怎成眷属呢？尼姑相思而死，太子悲恸不已，遂种下双红豆，并将草庵题名为红豆庵。至于萧统的红豆从何而来，并为何可以成活，那已经不得而知了。

但是，文字记载的都为“相传”、“据说”。

千年红豆树，花开满枝桠。



只有村民说的是肯定的，仙人种的！对的，即使是萧统，那也是仙人，他早已仙逝登天啦。不过，这只是玩笑。村民说的“仙”，还另有更深意义的，那就要说到其次了。

其次，是树仙。

红豆树本来是热带植物，而顾山红豆偏偏就长在亚热带，一长就是 1400 多年。其植株形态以及豆粒形态与别处的红豆树迥异，故世界植物学大字典中，将顾山红豆单立一种，为：“江阴顾山戴氏红豆树”（由戴氏引荐）。

红豆树，在元朝一度枯槁，到清乾隆年间重新萌发，在老根旁生出四株，成如今的状态。从荣到枯到再荣，奇迹复生，这着实是一段让人匪夷所思的漫长时光啊！就算是元最末一年，到乾隆登基，粗粗算来也要 360 多年啊。人说，中国历史康乾盛世算得上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日子，这红豆树是不是真的是徵候之物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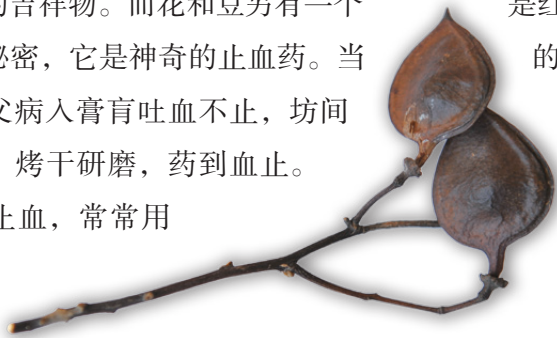
说到徵候，倒是不假，它徵候的故事确实太多。红豆树并不每年开花结果，开一次花，很可能隔很长时间。它每次开花结果的日期表，红豆人都有记载。它的开花状态居然常常和年岁丰歉有关。花开方向，或满树开花，往往伴有灾荒。

至于它的豆子，那是任何地方的红豆不可比拟的，在玩者手中，它就是一颗美丽的假宝石。故我曾经撰文《顾山红豆甲天下》，这绝非吹牛。红豆籽，颗颗心形，鲜红欲滴。而且，经年不蛀不烂不霉不变。做女子饰物，竟然越带越鲜艳。所以历来文人认为是爱情的象征，坊间认为是趋利避害的吉祥物。而花和豆另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它是神奇的止血药。当年，本人老父病入膏肓吐血不止，坊间求得豆与花，烤干研磨，药到血止。不过，红豆止血，常常用

作重病急用。后看到一则资料，方知“红豆因”虽有止血功效，却有毒性。

不过，一直让我弄不明白的是，红豆花开的预测灾荒，与红豆树红豆籽所承载的文化寄托总是相悖。要么就要换个思维方式，徵候，就是对人类的友善提醒了。或者就是应了那句，叫做，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了。总之，徵候是真的，吉祥也是真的。村民言之凿凿说，40 年前，苏北信徒辗转过来祭树，临走时竟忘了带来的酒壶呢，一把酒壶就这样挂在树上好久好久哎。苏北信徒为何祭树，得了红豆什么恩惠，不得而知，但是到了红豆结籽收获时，远近乡邻前来觅请红豆的很多。那时，经济滞闭的时候，红豆树下的人家，随要随给，比不得现如今，出了钱，你还一豆难求。而红豆树下的村民，祖祖辈辈教导孩子，那是仙树，要护着它，不能损害它。

树仙，还有说头。一般树，结籽就是繁殖，而相传萧统用两颗红豆种下的红豆树，满树殷红晶莹的豆豆却一粒都不肯发芽。而且，不仅种子不芽，压枝也不芽，总算蔓出的老根生出新枝，移植却又不能成活。这就奇了去，怪不得坊间传说，是仙人种豆时念了谶语。当然，那只是亦真亦幻的传说，如果没有了传说，生活大概就没有了诗意。仙人的谶语，哪里架得住现代科技，最近几年，红豆的后代颇有几棵成活的，包括我所属单位的适园亦成活一棵，长得还算茂盛。但是，要它开花结籽，大概必须要望穿眼底，据记载，顾山红豆，最早开花，是红豆 57 岁那年。哟，那看来是下辈子看得见的事情啦。不过，又一想，57 年，虽不算漫长，但其中的不确定因素，却是不可小觑，那么柔柔弱弱的红豆小苗到底是沿着仙人的谶语走呢，还是沿着现代科技走，



看来还要看她的造化呢。所以，说红豆有后代，还太早。

再次，就是关于它的传说，都亦仙亦幻凄美飘渺。而种种传说中，要数现代天才诗人刘大白“双红豆”故事最为缠绵悱恻。

1924年元旦，顾山周水平赠刘大白一双红豆。诗人敏感，于是他写《双红豆》诗三首，并在题记中详细叙述红豆来历：

今年元旦，江阴周刚直君，赠我一双红豆。过了几天，他又对我说：“此物是我故乡乡间所产。老树一株，死而复苏，现在存活的，只有半株。有时不结子，有时结子仅十余粒或百余粒不等。如将此豆作种别栽，又苦不容易活；即活，也不容易长成；望它结子，更不知须等几何年。所以此物颇不易得，实是珍品。”我细玩此物，颜色微紫，形状颇类心房，古人以它为相思底象征，大约不是无故。近来和周君相别，已将匝月，睹物怀人，相思颇苦；因作双红豆三首，以代缄札。

将《双红豆》诗寄给周水平后，他又去考证红豆诗文，找出了清代文人万红友的《红豆词》和《红豆赋》。由此可见，他对这双红豆相当重视爱惜。

后来，他先将这双宝贝红豆赠给爱妻何芙霞。刘大白和何芙霞是在一场中秋女子赛诗会上认识的。作为新女性的何，据说当年亦是才情横溢，两人一见钟情，闪电成婚。婚后育有一子三女。刘大白对妻子一往深情，赠红豆，自然是以物寄情，表达对妻子一片真情了，正如《双红豆（其三）》所言：“豆一双，/人一双，/红豆双双贮锦囊，/……似心房，/当心房，/偎着心房密密藏，/莫教离恨长！”

早在赠送红豆之前，他就为何芙霞写过《爱》、《她不该给我啊！》、《霞底讴歌》、《邮吻》、《我愿》等情诗，将一片痴情完全倾注在妻子身上。他的情诗，是自己爱情实感的直接表现，爱得强烈，感得深挚，往往顺情感的急泻畅流自然成篇，有兜底吐尽为快的特点。他的诗，特别是爱情诗，真的就是浑然成篇妙章。

虽然，刘大白如此真诚地爱着妻子何芙霞，但是，妻子并不像他在诗中所讴歌的那样纯洁。她毕竟不是真善美的化身，她辜负了刘大白的一片痴情。事情就发生在当年：1924年，刘大白应邀出任复旦大学文科教授，兼授上海大学的中国文学课。离开杭州前，他将妻儿寄托萧山沈玄庐处。沈玄庐是刘大白的至交好友。刘大白早年因撰文著诗痛斥袁世凯复辟，在赣宁讨袁失败后，不得不避祸日本。在日本，他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因而结识沈玄庐。两人谈论国事，慷慨激昂，志同道合。1916年夏，袁世凯一命呜呼，刘大白返回祖国，在山明水秀的杭州住下，由沈玄庐推荐，短期出任过浙江省议会秘书长之职。后来，沈玄庐与戴季陶创办《星期评论》，刘大白在该刊发表过新诗，还与沈有唱合之作。将妻儿托付给这样的要好朋友，他自然是再放心不过了。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最放心之处，竟然出了意外：他走后不久，何芙霞便同住处附近的衙前小学一位姓高的教员相识，两人一见钟情，不能自拔。

萧山衙前小学本是沈玄庐所创办的一所新式学校，何、高二人热恋的事情传扬出来，不但舆论哗然，沈也深感内疚，觉着有负好友重托。迫于道义上的压力，高某离职回老家。而就在此时，高妻突然病亡。几重打击，他便去了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

高某出走后，何芙霞迁怒丈夫，非但旧情

难续，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无奈，刘大白只得忍痛从她手里索回那双艳若朱丹的红豆，与之分手。一双红豆，往日传挚情，今日成遗恨。但是，事情到此，并未完结。

与何芙霞离婚后，刘大白虽然在仕途上一帆风顺，由浙江大学秘书长进而到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但心中始终闷闷不乐，常常是“朋筵赌酒偶成狂”，一半是看不惯黑暗的世事，一半是孑然一生不畅快吧！1930年他决然辞职，居家著述。两年后，骨结核病发，医治无效，长逝于杭州。

那双艳丽可爱的红豆哪里去了呢？自刘大白向何芙霞要回了代表自己一颗挚心的红豆后，再也不曾提起过它，更不曾为之赋诗，似乎它已沦落尘寰，不知所终了。不料，刘大白病逝后，停柩治丧时，突然从南京来了一位女郎，抚柩致哀，泪如雨下。周围的人，均面面相觑，疑惑不解。女郎不待人问，自报家门，声称是刘大白的情侣，并出示两颗红豆为证。

一双红豆，竟联系着两场爱情纠葛，亦可谓奇豆了。刘大白一生所写的爱情诗，不下数十首之多。但是，写得最好的一首，应推这“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一双无字红豆。它饱含着刘大白的一泓深情，道尽了他在爱情上的阴差阳错，挫折坎坷。因此，它是一首真正的爱情诗。

进村，我们终于可以踏踏实实走进红豆树下。这个小村，大都姓周，也有陆姓。而周家与红豆树更是联系紧密。红豆院曾是周关宝的家。1982年上海电视台来这里拍摄关于红豆树的专题片，播出以后，古树名声大振，前来观赏的游客逐年增多。为保护红豆树，有关方面考虑建设红豆院，当周关宝得知这一消息后，他既为保护古树高兴，又为自家的房屋要拆迁

而犯了难。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老周从大局出发，说服全家在没有任何补贴的情况下，主动拆除了祖传的3间平房、2间院堂和2间草屋，腾出场地让新建红豆院的工程顺利实施，如期竣工。老周为红豆树无私奉献的精神在红豆故里传为美谈。不仅如此，对红豆一往情深的周家，即使红豆树给有关部门接管后，依然悉心关心着古树。施肥、松土、开花、结籽，他们一一做好记录。令人称奇的是在千年古树的南面，分别于1982年8月20日和1983年8月22日长出两颗小树，看见老树“分娩”小树，村民和老周都欣喜若狂。眼前，小树长势良好，已经有钵口粗壮了。红豆一家两代，蓬蓬勃勃，兴旺发达。而村口为红豆看门守院的，也已经从周关宝一人，变成了全村人了，人们一波一波自觉轮班看护着他们心中的神树。

离开村子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银杏树下，已不见了古树，皂荚树头，也没了皂荚的踪影。唯有红豆树，1400年苍然挺立，难道它不神吗？我耳边响起进村时周家女儿神神叨叨对我说的这句话：“红豆树的根长得很远很远，一直远到江北，你信不信。”当时，我感到她的话很梦幻很诗意，现在，我突然明白，那根何止长到江北，早就绕着地球长去，深入人心长去了。

有故事的村庄，一定是个美丽的村庄，更何况一个讲了1400年的故事呢……

郭丽雅 女，原江阴市文联副主席，著有散文集《片羽》、《知秋》、《瞬间》、《江南绝唱》，语言类文集《江阴方言集》等。



兴化水乡（王发国 摄）

菱

故乡河汊，野藤般乱缠。每至夏季，乘船而行，水面上满是菱蓬，傍着堤岸，铺向河心。几丈宽的河面，仅留下船行道。菱蓬长得颇旺，挤挤簇簇的，开着四瓣小白花，远远望去，绿绿的，一大片，一大片，随微波一漾一漾的，起伏不定。

白白的菱花落了之后，嫩嫩的毛爪菱便长出来。故乡一带的菱角，种类单一，多为四角菱，当地人称为“麻雀菱”。是何道理，弄不清楚。间或，也有两角的“凤菱”。红红的颜色，颇好看的。至于那瘦老、角尖的“野猴子”菱，

则是野生的，没人喜欢。故乡人种菱，喊做“下菱”。上年备好的菱种，用稻草缠包着，在朝阳埂子上埋了一冬，早春挖出来，到河面上撒。大集体时，一个小队几条水面；分了田，便是几户人家合一条水面。下了菱种的水面，在端头的堤岸上，做起两个土墩，扑上石灰，行船的看那白石灰墩子，晓得了，这河里下过菱了。罾泥罾渣的，便不在这儿下泥罾子、渣罾子了。

翻菱，是件颇需本事的活计。胆子要大，手脚要灵。翻菱，多是妇女所为。想来，菱蓬水淋淋的，与女子更相宜吧。故乡的女孩子，多是翻菱好手。一条小木船，前舱横搁上船板，窄窄的，颇长，似飞机翼一般，伸向两边。翻

菱人，蹲在船板上，墨鸭似的，后艄留一人撑船。这前舱的人，上船板要匀。否则，船板一翘，便成了落汤鸡。后艄撑船的，讲究船篙轻点，不紧不慢。快了，菱蓬翻不及，慢了，又费时。试想，绿绿的河面上，五六个女子，定然是色彩斑斓，簇在一条小船上。流水潺潺，菱蓬起落，嬉笑不断。

这情形，不见有些年了。分了田，下菱也是各家各户自己的事，翻菱时，很少撑船了。几张芦席大的水面，家中姑娘媳妇，多是划了长圆形的澡盆翻菱。人蹲在里边，双手作桨。这种翻法，更需本事。稍一歪，便翻入河中，小木盆停在菱蓬上，翻过一阵，再划。用不了多少工夫，便翻遍了。只是河面上，难有笑声漾出了。

刚出水的菱角，汰洗干净，漾出浮在水面的嫩菱，之后便可下锅煮，好了便吃。那菱角剥出米子来，透鲜。一夏总要吃上好几回的，倒是上好的零食。菱角甬煮，剥成米子，亦可做菜。故乡人，每至中秋，多有鲜菱米子烧新公鸡仔的佳肴。这里头，出水菱，自然活鲜；刚会打鸣的小公鸡，亦是鲜嫩。这道菜，占全了鲜、嫩、活三字，在城里则难矣。

河藕

家乡一带，有河塘的所在，不是菱蓬，便是河藕，荒废不掉。生长着河藕的塘，看上去，

满是绿。圆圆的荷叶，平铺在水面上的，伸出水的，蓬蓬勃勃的样子，挤满一塘。偶有一两滴水珠，滴到荷叶上，圆溜溜的，亮晶晶的，不住地转，或滑到塘里，或停在叶心，静静的。不留意处，冒出朵荷花来。粉红的颜色，一瓣一瓣，有模有样地张开着，映在大片、大片的绿中，挺显眼的，也好看。

顺着荷叶的杆儿，往下，入水，入淤泥，方能得到藕。从河塘中取藕，得“歪”。“歪”藕，全靠腿脚的功夫，与“歪”茨菰、荸荠相仿佛，只是更难。河塘，多半不是活水。久而久之，便有异味，淤泥亦变成了污泥。荷花早出了水面，不受水污，用不着奇怪。从污泥中“歪”出的藕，一节一节，白白胖胖的，婴儿手臂一般，着实让人感动。

八月中秋一到，河藕便贵起来。乡间，到了年龄的青年男女，正月里想办“大事”，男方得让女方心中有数，有个准备。于是，备了月饼、鸭子之类，其中，少不了一样：河藕。在中秋节前，由女婿送到老丈人家里，这便叫“追节”。“追节”的河藕，颇讲究，藕的支数得逢双，藕节上，要多杈，且有小藕嘴子，万不能碰断的。断了，不吉利。

常言说，藕断丝连，真不假。家乡人做“藕夹子”，便得将藕切成一片一片的，藕切开了，那丝拉得老长，依旧连着。切好的藕片，沾上调好的面糊，丢到油锅里煎，一刻儿便熟。煎“藕夹子”，香、脆、甜。考究的人家，两片藕中



间夹些肉馅之类，再煎，味道更好。用河藕做菜，真正考究的，是做藕圆子。用芝麻捣成馅子，做得小小的。藕，不是现成的藕，得用藕粉。有了芝麻馅子，有了藕粉，再备一只开水锅，便够了。做的程序如下，将做好的芝麻馅儿，丢在藕粉里，轻滚。藕粉最好放在小竹匾子里，好滚。滚，讲究的是轻，是匀。不轻，散了架；不匀，不上圆。滚过一层，丢进开水锅里煮，一刻儿捞起，凉干，再放在藕粉里，滚。如此反复。一层一层，滚得一定程度，藕圆子便成形了。做成一道甜菜，远在桔子、蜜桃、菠萝之类罐头之上。那藕圆子，香甜全俱，自不必说。轻轻一咬，软软的，嫩嫩的。

街上常有的，是煮河藕卖。大铁锅，老大的，支在柴油桶做成的炭炉上，立在路旁。卖河藕的，边煮边吆喝，“熟藕卖啦”！上学下学的孩子，挺喜欢买熟藕吃，没见过藕孔里有糯米。听老一辈人说，早先卖熟藕，藕孔里灌满了糯米煮的，那该又是别一番味道吧。

“高瓜”

兴化水乡，出门见水，早年间无船不行。乘一叶小舟，傍河荡缓行，便可见堤岸边，水面上，碧青的“高瓜”叶儿，一簇簇，一丛丛，蓬蓬勃勃。偶或，微风吹拂，便飒飒作响，随波起伏。

“高瓜”，在乡里孩子的记忆里，总是和一

头大水牛连在一起的。耕地靠老牛的岁月里，哪个农家孩子没有干过放牛的营生。大水牛，黑黑的毛，黑黑的眼睛，黑黑的牛角，长长的，弯弯的。骑在牛背上，好威风噢！单靠在田埂上放牛，想喂饱牛肚子，难。于是，一边放牛，一边割牛草。顶来得快，易见分量的，便是河岸、荡边割“高瓜”叶儿，牛挺爱吃的。这一带，水多，“高瓜”多，且多为野生，有力气割去好了，没人管的。偶尔，也会有意外收获。或是在“高瓜”叶丛之中，发现了野鸡野鸭子之类的窝，拿上几只小巧溜圆的野禽蛋，也是颇叫人高兴的事；或是割“高瓜”叶时，割出几支白白嫩嫩的“高瓜”来，嚼在嘴里甜丝丝的。说实在的，野鸡野鸭、野禽蛋之类不是常能碰上的，倒是那长长的、白嫩的“高瓜”，时常割得到，掰上一个，咬一口，脆脆的，甜甜的，颇解馋的呢。

晓得“高瓜”正儿八经的名字叫茭白，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念书识字，之后在城里有了一份工作。上班下班，老听见巷道上有人吆喝：“茭白卖啦……茭白卖啦……”，走近看时，但见十来根一扎，净是“高瓜”。说是按扎数卖，其实，每扎斤两都差不多，卖主先前搭配妥了的。按扎卖，卖起来爽手，便当。别小看这“高瓜”，儿时割了喂牛的玩意儿，一扎也几块钱呢。

“高瓜”切成细丝子单炒，鲜嫩，素净，蛮爽口的。若是切成片子与蘑菇木耳之类配成一道炒三鲜，完全可以代替竹笋儿用的。只是“高瓜”一老就不易做菜了。切开之后，发现“高瓜”



里有较多的黑点子，密密麻麻的，颇难看，那便是老了。弃之，甬可惜。

好在隆冬一过，春风绿了田野的时候，那河荡又会有许多新鲜的“高瓜”叶儿窜出水面，碧绿绿的，成片，成簇，生机盎然。用不了多久，又该有鲜嫩的“高瓜”上市了。

荸荠·茨菰

荸荠、茨菰，均需育秧子，但育法则不太一样。育荸荠秧子，先做好秧池坂子，之后，栽下留种的荸荠，待破芽长出圆圆的莖子后，便可移至大田去栽。育茨菰秧子，一样得做好秧池坂子，栽下的，则不是留种的茨菰，而是从茨菰上掰下的茨菰嘴子。茨菰嘴子栽在秧池坂子上，颇密，用不了几日，便会破芽，生出阔大箭形叶子来，亦能移栽了。

荸荠与茨菰，形体稍异。荸荠，呈扁圆形，嘴子短，皮色赤褐，或黑褐。茨菰，则呈椭圆形，嘴子弯且长，皮色青白，或黄白。

深秋时节，白汪汪的水田，渐渐干了，圆圆的荸荠莖子，阔阔的茨菰叶子，渐渐枯了，该是收获荸荠、茨菰之时了。村上，成群的青年男女，听了小队长的指派，扛了铁锹、铁叉，背了木桶，散在田头挖荸荠、茨菰。荸荠、茨菰均在泥底下，翻挖起来颇费力。这等活计，多为小伙子所为。姑娘们多半蹲在小伙子的铁锹之下，从翻挖开的泥土上，拣荸荠，或是茨菰。自然也有大姑娘不服气的，偏要与小伙子比个高低，拿起铁锹，憋着劲儿挖，惹得一帮子男男女女，在一旁看热闹，看究竟谁给谁打下手。

收获荸荠、茨菰，翻挖较常见。然，终不及“歪”，颇多意趣。刚枯水的荸荠田，亦或是茨菰田，除了零散的枯叶，似无长物。或有一

群男女，光着脚丫子，踩进田里，脚下稍稍晃动，“歪”上几“歪”，便有荸荠、茨菰之类，从脚丫间钻出，蹭得脚丫子痒痒的，伸手去拿，极易。那感觉，给劳作平添几多享受。

“歪”荸荠，“歪”茨菰，青年男女在一处，有些时日了，于是，就有些事情了。有小伙子盯着黝黑的田泥上大姑娘留下的脚印子，发呆，心热。便悄悄地去印了那脚丫子，软软的，痒丝丝的。

荸荠、茨菰去皮之后，肉色均白。荸荠可与木耳、竹笋之类炒菜，可煮熟单吃，亦可生吃，甜而多汁。农家孩子，时常在大人翻挖的田头，随手抓上一把，擦洗一番，便丢进嘴里。茨菰生吃，则不行。用其做菜，可切成片子、条子、块子。茨菰片子，可与大蒜、精肉小炒；茨菰条子，可与蛤蜊、鸡丝之类白烧；茨菰块子，可与猪肉红烧。整个儿的茨菰，烧煮后过掉一回苦水，之后，加冰糖熬，便可做成一道冰糖茨菰，亦极有味道。另有一道菜：茨菰烧水咸菜，早年间，在家乡较常见，挺下饭的。

刘仁前 男，泰州市文联主席，著有长篇小说《香河》、《浮城》等。

西渚的果

三 徐风



七月或八月，在宜兴西渚山乡腹地，骄阳炙人；一路走去，空气里却有清新的甜香，隐隐约约。有些小小村落，有名或无名，都不重要。它们就在绵延丘陵的皱褶里，与万物一起，春华而秋实。那些无法用文字表达的芬芳，常常漫过我的衣衫，让我沐浴在一种曼妙的境界。山渐深，草木泉石渐幽，空山无人，水流花开。远远望去，沉甸甸的果实缀满枝头。仿佛丹青高手，逸笔草草。夏日金色的静谧已经悄然飘远。

桃

人在日月山川里行走，不只是磨难与曲折。栉风沐雨之后，总会遇到艳阳高照、山花烂漫。三月里，去西渚，一路桃花细雨。走进那桃树林里，无数山野气息与朵朵桃花随风扑来。人

与桃花两两相对，脉脉相望，无限情语不着一字，天地间风光从此便永驻心间。春风桃花里的西渚难得地这般多情，它的每一个村落都缀满了桃花的笑脸。有时你在村外的土路上走着，不远处是蜿蜒的山溪，清亮的溪流，浮着桃花叶瓣，执拗地陪着你，不紧不慢地流淌。忽然就起了风，纷纷扬扬的桃花瓣，雨一般飘过来，那粉红的花雨里还夹杂着山妹子爽朗的笑声，你抬起头，寻找那张笑脸，她就在桃树的背后笑着，似乎对着你，其实根本不是对着你笑。再看时，那笑靥一闪，让天光都黯淡下去。仿佛那桃林里，到处都是笑脸。走着走着，脚底下都是灿烂阳光，猛然感到，这日子真是奢侈。

七月流火的季节，西渚的友人捎来一篓桃子，满满的一篓山野清香。想起三月，想起山谷里飞扬的桃风，飘拂的桃雨，舒曼的桃云。

友人说西渚的桃子有一个美号：“大红袍”。它饱满、丰盈，白里透红。轻轻叩齿，鲜甜的汁便溢出来，吮一口，果然是鲜红，一如西渚夏日晚霞之绚烂。汁如泉涌，又如甘霖一般清甜。其肉质脆爽，软润，清纯。与无锡的水蜜桃比，它的体态不那么肥硕，嚼起来却有一种筋道，不单是清甜，还有韧劲；那是山川的气韵，是一方水土的结晶。捧着一颗西渚的桃子，心里早已蜜成一团。遥想那白云苍狗，追忆那淳朴乡情，隐隐觉得山歌在耳，余音悠悠，衷曲难忘。

翠冠梨

唐代有个名叫殷璠的文人，写过一首咏梨花的诗，读来难忘。“云满衣裳月满身，轻盈归步过流尘。五更无限流连意，常恐风花又一春。”那股先生，想必是把梨花比拟成一位体态轻盈的美女，着一身缟素，在皎洁的月光下，款款而行。

梨花似静女。梨在北方，貌如佳人。它跨过长江，水土不一样，果实也变了种。早先，宜兴丘陵山区也出梨。果体黧黑，表皮粗糙；如壮硕而粗笨的樵夫。口感木然，寡淡而无味。于是这里的人称其为“木梨”。

西渚山里，新近出一种翠冠梨。甜，脆，口感清冽。那里的山泉甘甜清冽，土地肥爽透气，空气清新。兹梨在手，沉甸甸，轻盈盈，恍然在握，甘甜在心。想象那枝头上的每一个梨果，都在日夜期待着秋天的来临，因为那是它们生命中最完美的一段路程，成熟、幸福和快乐才是它生命的终结。而采摘过后的果园，像一个刚生过孩子的少妇，宁静、幸福而慵懒。你随便推开一户山里人家，主人会端出一大盆梨请你品尝。不过，如此美妙的翠冠梨，似应在月下品赏，

邀三五知己，赏梨作诗，正所谓：满院轻素媚秋光，透骨浓熏百花香。消得太真吹玉笛，聚贤西渚月如霜。

板栗

秋天，行走在西渚的板栗园里，板栗树冠丰满，果实累累，令人感到一种质朴而安静的气息。安静在这里是一种力量，像坚实的栗果，它让人听到来自大山深处的深沉与共鸣。

“板栗成熟了，栗色的果实从球刺里爆裂开来，一阵风过，板栗就掉下来了。在树下寻找板栗，一颗一颗的惊喜。”这是一位朋友写板栗的文字。很多时候，我被这样明润而清澈的文字感动。在西渚，我穿行于一片一片的板栗林，重温那些文字，有一种浸透心灵的温暖。

板栗长在西渚的深山里，沐浴山风，浸润于山村的炊烟朝露之中。西渚山明水丽，板栗种植历史悠久，其中以果红板栗品质最好，其果皮呈赤褐色，光泽油亮，粒大饱满，肉色嫩黄，糯性强，不沾内皮。可生食，极甜脆；若熟食，则粉甜清香。古代名医孙思邈曾说：“栗，肾之果也，肾疾宜食之。”李时珍则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栗果（仁），栗扶……都能入药，治多种疾病。栗果能补肾、益气、原肠胃，治疗筋骨断碎，化淤血，消肿痛。”

在西渚，板栗炖草鸡是道家常菜。你尝一口汤就知道，其色泽，颤人地金黄。那板栗，粉而绵，却又不失筋骨风度。一种本分的香，有草木气息，在舌尖回荡。

葡萄

我曾经陶醉于西渚的无边绿色。一点点、

一丛丛、一树树、一排排，铺天盖地，顷刻便衍生成一片绿色的湖泊。忽然有些凉爽的风拂面而过，风里隐含着一丝水的湿润，舌尖也沾上了甘甜的气息，远远地有芳香的果味淡淡飘来，仙乐似的稍纵即逝。丝毯一般的绿墙，屏风似地挡了去路，穿行于那绿色团团簇簇之中，人便感到自己也变绿了，成为一张小小的绿叶。再往前，绿色已凝固成一片屋顶，架起一座绿色的长廊，九曲回旋，一道道重重叠叠没有穷尽；脚下的光影是墨绿的，踩着绿色的波浪在走；头顶的天空是翠绿的，披着绿色的云在飞——西渚也有绿色的云么？这令我想起吐鲁番的葡萄沟。那是一座真正由葡萄构筑的绿色宫殿，绿荫下随意散落着一张张圆桌长椅，摆满了美酒佳肴。宫殿的墙是柔韧而密实的葡萄叶做的，却有大理石般的质感；宫殿的穹顶上缀满了珠珠串串的无核小绿葡萄，像夜空闪烁的星星，但它们亲切平易，唾手可得，不似星星那么遥不可及。你若向着宫殿的任意一个方向伸出手去，除了葡萄以外，指尖不会再碰到别的；你闭上眼睛，那绿宝石的莹莹亮光依然穿透黑暗，

为你导引西域之路。

可是这里毕竟不是吐鲁番，而是江南一隅的西渚。味觉告诉我，这里的葡萄，几可与吐鲁番的葡萄媲美。紫玛瑙，绿翡翠，黑珍珠，那究竟是葡萄，还是玉石深处潜藏的一汪水胆呢？度过了炎热干旱的盛夏，它们如今已经真正熟透，身体中饱含的新鲜汁水，即将把它稀薄而透明的皮肤胀裂，只须轻轻一碰，它内心喷薄欲出的激情就要爆发出来。那激情是清澈而又粘稠的，能把人的心粘留在一个名叫西渚的地方。它几乎不是被你送入口中的，而是像一勺琼浆玉液，轻轻地滑过咽喉，你甚至不忍用牙齿伤害它，只用舌头迎接它，它便像雪花似的融化了。那分明已不是叫做葡萄的平常水果，它是一个个透明的水球，一粒粒晶莹的水珠，披一层白银似的霜花，珠珠串串，凝固着悬挂着，随时都会坠落下来。

都说云湖的水好，清澈、甜美。原来西渚的葡萄，是用云湖水做的呵。

徐 风 男，宜兴市文联主席，著有《公民喉舌》、《绝技》等。



美在云湖山水间（黄富民 摄 引自宜兴网）

文学、启蒙与图书馆阅读推广

III 赵普光



——

每一位现代读书人都是在图书馆的哺育下成长成才的。我不是图书馆学专业出身，对于图书馆学，我是一个门外汉。但是，作为一个现代的读书人，流连于各种图书馆中，是我生活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与图书馆的不解之缘，让我也常常思考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最核心最根本的功能等问题。

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图书馆理应成为最有文化的地方。曾有人提出图书馆应是“文化湿地”，这个提法当然很新颖，很必要，但是未免过于消极了。图书馆，特别是公共图书馆不应该满足于做一个文化湿地、文化绿洲。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这片湿地、绿洲迟早会消亡，而成为高楼林立的一部分或者是戈壁荒漠的一部分。那么图书馆要成为什么呢？要成为文化传播的阵地，要成为一个文化高原，要去滋养化育图书馆之外的荒漠，从而去丰富和完善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体系。

那么，如何衡量图书馆的文化层次的高低，

这里就有一个标准（当然标准很多，这里指的是标准之一了），那就是，看经典文学书籍的藏书量、流通借阅的频率、借阅的人群主体等。这里的文学是大文学的范畴，非狭义的纯文学的范畴；换句话说，这里所说的文学是 art，而不是 literature。如果经典文学书籍的馆藏量大、流通频率高、借阅人群覆盖面广，则说明这个图书馆的文化内涵深厚，文化功能发挥得充分。反之亦然。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其实就涉及到了文学的功用和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的功能问题了。

二

对于文学功能的认识，历来有一个误解，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就中国而言，至少从孔子开始，就特别强调文学的功利性，即对社会的实际作用。孔子说诗可以“兴”、“观”、“群”、“怨”，可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圣人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



1934年，清华大学图书馆阅览室。（原载《故时风物》，冯克力主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

将文学与国家、民族、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直接对应起来，片面地强调了文学的直接功利性。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文学的社会功能就被强调得更为明显和直接了：“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这种文学功利观，成为中国几千年社会的主流，支配着人们对文学的衡量标准，一以贯之。以至于，柳永因为他的创作无关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科举之路上就被判了“死刑”。殊不知，柳永的诗词，正是一个人情感的真实流露，正体现了文学的心灵功能呢。所以，几千年来，只有文人失意之后才会在文学中流露出心灵的一角，这种珍贵的“真”人、真性情，则往往又被压抑与掩盖。到了晚清，由于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文学的工具性和实际功能再次强化，被赋予了救国救亡的使命。如梁启超就强调文学与新民的作用。任公所谓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法不够精确，行文中也过于武断，没有认真地分析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到底与人心之间有怎样复杂微妙的关系。这种粗疏的提法容易产生流弊，事实上也产生了很

大的弊端，为文学的工具化功利化张目。

“五四”时期，现代化的极端焦虑也对文学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期待和强迫。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异军突起，文学的工具化被突出地强调，有文学家就明确宣称文学要成为普罗大众斗争的工具，文学就是阶级的传声筒。君不见，“匕首”、“投枪”一度成为对某些文学作品最高的评价，最高的赞誉。抗战军兴，文学自然被要求成为抗战的武器。这种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功利传统延续滋长，发展到极端，就出现了“文革”期间的文学荒漠化。“样板戏”“一枝独秀”了，文学则完蛋了！

对文学的看法，中国如此，那么西方又如何呢？在西方，“摹仿说”与“反映论”一直在文艺观念中占据着支配性的地位。从古希腊的“摹仿说”，就强调文学艺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摹仿，强调现实对文学发挥的主体性作用。后来发展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提出的文学的能动“反映论”，认为文学是对现实的能动性反映。直到20世纪的中国，被极端化和庸俗化的反映论甚嚣尘上，一度被奉为圭臬。这种直接将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对等起来的做法，占据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部分时间。

二者的根源是相同的。无论是中国传统的文学社会观、功利观还是西方的“摹仿说”主流观念，都强调文学是现实的直接反映，强调文学对于社会的直接功用，这种观念必然导致将文学作为认识和改造现实的工具，使得文学承担起本来无法承担的重任，进而也导致对文学创作的控制，文学失去了自由。社会和人就彻底失去了文学。让文学归位，就成为必要。

那么，文学到底功用何在？如何理解文学的功用？

三

文学本无用。没有现实的直接的功用，才是文学的显著特征。真正的文学归根到底是为自我的。文学创作是作家情感思想的自然流露和表现，文学更无关于经国大业，只是人在得意时的自鸣，失意时的慰藉。她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是必然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而进化，因为文学与进化论最无关系。她不是救世良药，不是匕首投枪，更不是洪水猛兽。文学说到底，是人的“心”的外显。

在我看来，文学是人文学科的最核心的门类，通过文学，人类能够不断地意识到人的存在，她是在通过自己的方式完善人的心灵，使人意识到一种健全的感性的丰富的完整的心心的可贵与可能。比如历来认为最具战斗性的鲁迅的作

品，人们一直存在严重的误读。鲁迅自己认为最满意的作品不是《狂人日记》，不是杂文，而是《孔乙己》，原因是这部作品“从容”，有大家气象，不似其他作品那样峻急。为什么鲁迅有这种看法？这恰恰也就说明了鲁迅心目中的真正的文学不是“呐喊”，不是直接的功利，不是迫切的战斗。《孔乙己》与鲁迅其他很多战斗性的作品不一样，表达的其实是一颗心灵向另一颗心灵靠近而又不能的悲哀感。这种悲凉与无奈何尝不贯穿鲁迅其他作品中呢？《狂人日记》充溢着的是“己”和“群”的对立紧张，说到底这种对立紧张还是源自于人和人的心灵世界的隔绝，《故乡》、《孤独者》以及鲁迅的《野草》集中还原的是心灵的焦虑，一个心灵与其他心灵无法沟通的焦虑。

所以说，在我看来，说到底，文学的本质

南京图书馆（吉强 摄）



并不是反映人、反映现实，而是建构人、建构世界。天生一个一个的人，未必长成一个一个的我。从人到我的完成，关键在于心的丰富与健全，而不在身体或者说躯壳。那么，这“心”的丰满，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学阅读关系极大。文学是建构人的，文学是化人的，是健全人的心智，安顿人的灵魂的。所以，文学与功利是根本矛盾的。

现代都市化的进程的加快，各种媒介技术的运用，使得人们生活的节奏加快。如手机、飞机、高铁、网络等等，表面上看是便利了人的生活，但是这些现代化的设备快捷的方式，按说可以给人们腾出更多的时间来，但是不幸的是，我们发现人们的生活反而更加紧张更加繁忙，人们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现代社会就像一个加速器，人在这个大机器中也随之不断加速，人的心灵空间逐渐被挤压得越来越逼仄。甚至可以说，在加速的过程中，人逐渐地被抛到人之外。这个加速的过程挤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被工具化的过程、机器化的过程、非人化的过程。难怪有人断言“本质上机械的世界是一个本质上无意义的世界”。^[1]

而文学阅读，尤其是充满人文氛围的公共图书馆的文学阅读，则让人静下来、慢下来、从容下来。这其实就是在抗拒越来越加速的现代社会，抗拒越来越严重的人被工具化机器化的趋势。弗洛姆很早就提出的警告“人创造了种种新的、更好的方法去征服自然，但却陷入这些方法的罗网之中，并最终失去了赋予这些方法以意义的人自己。人征服了自然，却成为自己所创造的机器的奴隶。”^[2]所以，必须要搞清楚图书馆搞阅读推广的根本任务最重目标，不仅仅只是增广知识、不仅仅是专业学习训练、不仅仅是提高人们的知识文化水平，最根本的

是化人，是人成为真正的人的存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与图书馆关系密切，文学的阅读成为衡量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的重要指标，甚至是衡量图书馆功能发挥的重要指标。

四

既然文学阅读及图书馆进行阅读推广活动最根本的是实现人的发展和健全，使从人到我的过程的重要完成力量。那么从更广更深的层面看，这又说明了阅读推广活动的启蒙价值，应该从启蒙的高度去认识和要求阅读推广的开展。

启蒙（Enlightenment）的根本目的是立人，康德写于1784年的著名论文《论启蒙运动》（What Is Enlightenment?）认为启蒙是“将人类从他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状态中解放出来”，完成“不借助外人帮助而运用（他自己的理解力）进行独立思考的决心与勇气”。归根结底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人。

然而，我认为启蒙的途径或曰立人的途径则是“化人”。阅读推广的目的也应该是立人，其途径方式则也应该是化人。

说到启蒙，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尤其是在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着绝大的误解。因为误解，走了很多弯路，直到现在依然行进在误区中。中国的启蒙、立人的思想脉络，早就断了，亟需重新接续起来。所以理清这个脉络，接续这个传统，认识启蒙、立人在中国百年当中的挫折，才能澄清启蒙在中国的必要性，以及图书馆的根本任务，阅读推广的价值和目标才会凸显。

说起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的开展，自然至少要追溯到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发起之初，其确立的思想文化启



五四运动时的北京街头。美国摄影师西德尼·戴维·甘博（1890 - 1968）摄于1919年。（原载《逝鸿片羽》，冯克力主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

蒙的方向是可贵而且正确的，那就是立人，通过思想文化的启智普及渐进的方式，提高人的素养和文明程度。这种渐进的普及、启智的开展方式，其实就是运用文化的力量、引导的途径、化育的方式来使得国民公众具有科学、理性的观念和自觉。这里面的所谓的“人”，是新的“人”，非旧的“人”，更多地是指的人心、人的精神心灵的状态。它至少包括两个层面：理念的开明和心智的健全。以《新青年》同仁为主力和核心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自觉采用这种涵养、化育的方式来推进新文化运动，推进启蒙的开展。他们相约“二十年不谈政治”，他们采用这种看来过于迂阔的，但却是最根本的路径试图解决人的问题，这也是社会的根本问题，解决人的内在的灵魂心智的问题。应该说，这一方向是正确的，如果坚持下来，我们可以想象，今天的中国人早已非目前这种混乱状况了。然而，“五四运动”的爆发，打断了刚刚开始不久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的进程。历史的发展往往

是偶然中转向的，自发的群体性学生事件“五四运动”的开始意味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流产。在以往的几乎所有的历史教材及其他的现代文学史教科书中都无一例外的将“五四运动”的历史功绩推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往往将“五四运动”的影响的评价远远高过新文化运动。特别令人哑然失笑的是，远早于“五四运动”的新文化运动，却因后来发生的“五四运动”而得名——“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很荒唐的。其实这是一种有意的建构和想象，造成了近一百年的历史误会。

所以首先要理清楚“五四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其实，“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无关，而“五四运动”却与新文化运动关系甚大，不能颠倒二者的影响关系。我们知道“五四运动”是一场青年学生自发的爱国示威活动，其目的是抗议政府的外交政策，而其采取的方式是和平游行示威。这种非暴力的和平的方式的选择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非常

重要的，意义非凡的。传统中国没有和平游行示威的传统和惯例，这种惯例来自于西方现代社会，这是民主自由的理念支配下的民众表达抗议和意愿的方式。既然中国本土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过这种传统，那么这些学生为什么会采取这种和平方式呢？说明自由、民主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深入到了当时青年学生的思想意识当中。是谁播下了民主自由的种子呢？是新文化运动。也就是，前此的新文化运动在当时的青年人心中起到了极好的思想启蒙作用。

然而，不幸的是，“五四运动”的爆发打断了已经初见成效的新文化运动的进程。青年人的巨大的群体力量开始显现，这就引起了不同的政治力量和派别的关注。再加上当时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的巨大压迫，整个社会的主导思想文化趋向转向了政治。相约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新青年》同仁们也分化乃至决裂了。于是，试图用政治去改变中国的现状是人们不约而同的选择，尽管选择的政治道路、理念相异，但采取的方法则一。于是，试图用文化的力量、启蒙的方式来立人、启智的新文化运动流产了。

五

借用资本的概念，社会历来至少有三种资本力量组成：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及现实层面，政治资本最显赫，最有力，经济资本次之，但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商品经济时代，经济资本的运作能力越来越重要，甚至会超过政治资本。最无力，最不被人关注和看好的，就是第三种资本力量——文化资本。

从这个意义上讲，图书馆与其他机构不同的，就是拥有文化资本、文化资源。尽管说这

种资本是最无力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最无力的文化资本，它的作用却往往最长远的，恒久的。文化资本运作的力量不是像政治、经济资本那样大开大阖、暴风骤雨、摧枯拉朽式的。它的运作和发生方式是春风化雨，是涵养熏陶，是润物细无声。这种方式恰恰决定了它的作用的发挥，无力而长远，非速成却根本。因为文化的“化”，已说明了这种方式是“化”，化的必然是人心，改变的是内在的心灵、深层的思想意识，从而实现“人”的确立。“是人，而不是技术，必须成为价值的最终根源；是人的最优发展，而不是生产的最大化，成为所有计划的标准”。^[3]在这个意义上讲，图书馆发挥的作用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理路应该是一致的，那就是运用文化的力量、涵养的方式实现对人的培养确立。立人，立的是人的内在灵魂，而非外在的物质躯壳，即人的理念开明、心智健全、个性独立。

天生一个个的人，未必长成一个个的我。从“人”到“我”，这中间有着相当遥远的距离，有着根本的差别，我是自觉的人、健全的人、丰富的人、独立的人。实现从“人”到“我”的转变，这个过程中，是启蒙的任务，是文学的根本，也是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根本目标。只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只有明确了这个根本性的目标，图书馆阅读推广才能走得下去，走得长远，走得成功。

注释：

[1] 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256页。

[2] 弗洛姆：《为自己的人》，孙依依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25页。

[3] E. Fromm, The Revolution of Hope: Toward a Humanized Technolog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8, p.96.

赵普光 男，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五行试读

III 张正海

研究中华文化，博古并不是目的，重要的是益今。

中华文化如同古董，需要有心人读懂她，读懂她才能给你价值。五行理论就是一件值得读懂的文化瑰宝。

五行的误判

五行，很多人认为就是“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小学生都知道世界的构成不止“金木水火土”，因此，五行理论饱受诟病，被认为是错误、稚拙的理论。有人把五行归纳为“朴素的唯物主义”。朴素的意思是说古人知识缺乏、比较原始的意思。

清末以前，古人对五行多为遵从和应用。三千多年，中国始终坚持应用这种学说，并对

后来科技文化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如古代的天文学、气象学、化学、算学、音乐和医学，都是在阴阳五行学说协助下发展起来的。

五行首次记载在《尚书·洪范》中，周武王十三年（公元前1122年）灭殷后，殷遗臣箕子与周武王阐述天人关系时提出了治理国家必须遵循九条大法，又称《洪范九畴》。其中提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穡。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穡作甘。”注意，这个三千多年前的论述并没有把五行简单定位为“金木水火土”，而是定位为“润下”、“炎上”、“曲直”等五种性质。

据《孔子家语·五帝》记载，孔子曾经详细地谈论过五行。季康子问于孔子曰：“旧闻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实，请问何谓五帝？”孔子曰：

“昔丘也闻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

《黄帝内经素问》中将五音和五行相配，将角、徵、宫、商、羽分属木、火、土、金、水，从而五音与五脏相通，有了“五脏相音”学说。在《左传》、《国语》、《管子》等史籍中也可看到五音与阴阳五行的关系。

著名学者顾颉刚说：“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系统的信仰；三千多年来，它有极强固的势力。”（《古史辨》）英国学者李约瑟说：“五行说的影响之大，传播之广，使它遍见于中国古代及中古的一切科学和原始科学领域。”

清代末期至近现代以来，受西方影响，一些人逐渐对五行思想开始产生信任动摇。如梁启超说：“阴阳五行说，为三千多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阴阳五行说之来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文革”以后，阴阳五行理论受到较大冲击，处于不断衰落中。

当代，只有中医等少数领域还在恪守这一理论。但由于误会很深，深受质疑。

我们祖先真的认为世界就是“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成的？认为水是由金生的？木是水生的？

我们可能把古人想得太简单了。举个简单例子，顺着金生水的思维，如果水是金生的，那海洋的那么多水需要多少金？世界上所有的山脉变成金山也不会生出那么多水！实际上，自然界很少能找到一块天然形成的金属块。那么海洋的水从何而来？如果认为是金生水，古人一定没有见过大江大海、或者睁眼说瞎。

正因为存在这些明显的、不符合逻辑、常识性的错误，所以，我们应该坚信“金生水”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也蕴含着中国的五行文化。

一定不是物理化学的表述，一定不是世界物质变化规律的表述。而是一种哲学理念的表现，是表达事物联系的一个理论。

中国传统哲学建立在古人与自然漫长的斗争实践中，在长期观察归纳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其独特的科学内涵。中华哲理从来不拘于象，而是寓意于象，以象来解释道的。这在中国文字上有无数例证，具有巧妙的类比性、会意性。如拘泥于具体之物就大错特错了。

所以“朴素的唯物主义”对五行的定义是不够准确的。正确的理解应该为：五行是反映复杂系统发展变化客观规律的哲学理论体系。

当你认识到五行（包含阴阳理论）是系统理论的时候，你就会理解了中华文化为什么处处有它的身影。可以说，读懂中华文化的这一庞大的理论体系，你就读懂了中华文化之本。

当我们不是把五行作为“朴素的唯物主义”看待，而是作为系统论看待时，你就会惊讶地发现，三千年以前，竟然就存在着这样一种先进的系统论。

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才提出系统理论思想，提出生命现象是不能用机械论观点来揭示其规律的，而只能把它看作一个整体或系统来加以考察。现在系统思想形成了一股重要的思潮，日益发挥重大的影响。与之对照的是我们本土的系统论却日渐

衰落。

现代西方系统论和中医系统理论同出一辙，也是起源和启发于生物系统。无独有偶的是，两者都是主张整体或系统来加以考察生命体。

三千多年过去了，以阴阳和五行为理论基石的中医依然散发青春活力。需要指出的是，五行理论不是为中医而制定和产生，中医只是五行这一系统论的应用。

古老的系统理论

按照中华文化的思维，“五”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数量概念，而是五种性质、五种类型，更延伸为种类繁多、纷繁复杂的意思。《说文》：“五，五行也，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五字的上下两横象征天地，中间是交错的阴阳爻，也就是阴阳在天地之间“跳舞”，极其形象地表达了万物种类繁多、生机盎然之意。

“五”这个数字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五行为什么不是三行、四行、六行？

在搞清“五”这个数字来源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看看“一”和“二”的来源。“二”是怎样来源于“一”的？

“二”，是阴阳，是一个事物的两个面。通过辩证思维，可以把任何一个事物划分为两个方面。在复杂系统中，个体和其他个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同样也可以把这些联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与我相利的；另一类是与我相害的。分好这两类关系，就是由“一”变“二”的过程。

我们再看看由“二”变“四”的过程。

与我相利的关系也分为两类，一类是利我的，如父母生我、朋友帮我；另一类是我利他的，如我生子女，我帮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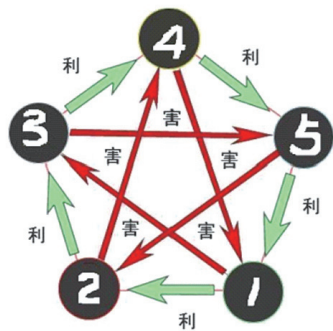
与我相害的关系也分为两类：一是害我的，如比我强大的对手敌人、制约我的其他人；另一类是我害的，例如比我弱小的对手敌人，受我制约的其他人。

这就是“四”的来源。

上述四种关系对应着除了我以外的四个人，再加上我，就变成了五个个体。即我生、生我、我克、克我和我本人，这就是“五”的来历。

“行”的意思是相生相克的关系，以及系统运行的规律。

我们把上述的四种关系、五个个体，组织一个循环的系统，必然会得到这样一张“五行”的图案。（图一）



（图一）

从科学的、几何的角度出发，这是表现上述四种关系、五个个体最简约的图案，是复杂系统分类的最简约的关系。古人填入“金木水火土”，那就变成了五行图；中医填入人体各个器官，就变成了医学图；古代风水学填入地理，就变成风水图。

哲理是需要检验的，我们需要证明五行图能够反映复杂系统。

钱学森认为：系统是由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且这个有机整体又是它从属的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贝塔朗菲指出了系统的三个特性：一是多元性，系统是多样性的统一，

差异性的统一；二是相关性，系统不存在孤立元素组分，所有元素或组分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三是整体性，系统是所有元素构成的复合统一整体。

我们综合上述和其他一些系统规律的概念，复杂系统主要包括以下特点：一是整体性，所有系统元素构成统一的整体；二是多元性，系统各个元素的特性具有明显差异，形成多元化分布格局；三是相关性，系统内部元素之间具有普遍联系，彼此形成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四是循环性，系统在宏观上可以形成周期性循环，通过循环形成动态平衡，维持系统的基本特性；五是稳固性，系统不易被轻易摧毁，除了根本性毁灭，单个元素受到损害，会有修复弥补手段。形如网状网络拓扑结构（其中任何一条通信线路发生故障时，均可以通过其他通信线路保证通信畅通）；六是可控性，可以通过调节单个元素的特性，达到改变系统性能的目的；七是不确定性，个体相互之间的利、害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力量的改变而不断发生改变，力量强者主导系统。

在分析完复杂系统的特点之后，我们来分析五行图的特点。

一、五行图具备复杂系统整体性特征。五行图五个元素构成了统一整体。

二、五行图具备复杂系统多元性特征。五行图五个元素有明显差异。

三、五行图具备复杂系统相关性特征。五行图五个元素之间具有普遍联系，彼此形成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我生（利）、生（利）我、我克（害）、克（害）我四种关系。凝练概括，无所不至。

四、五行图具备复杂系统循环性特征。五

行图五个元素可以从相生的角度形成周期性循环。

五、五行图具备复杂系统稳固性特征。五行图形成的系统具有稳定性，缺少任何一点，彼此联系依然存在。

六、五行图具备复杂系统可控性特征。可以通过调节五行图中某个元素的特性，来影响其它元素的特性，达到改变系统性能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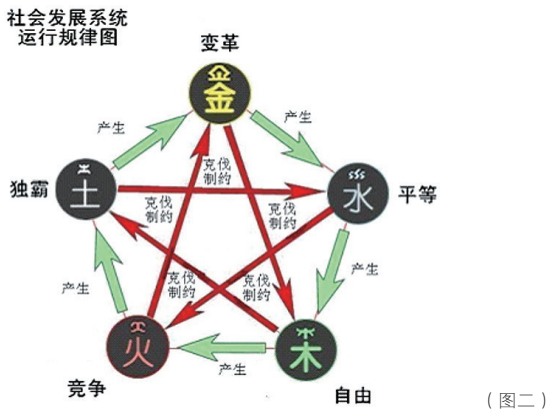
七、五行图具备复杂系统不确定性特征。五行图五个元素相互之间的利、害关系，可以随着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力量强者主导系统。

综所上述，五行图和复杂系统相比，简约概括，是一个微缩复杂系统的模版。

五行图的功用

当我们实践应用时，会发现穿越三千多年以后，五行理论依然鲜活。

我们画出社会发展系统运行规律图（图二）。



上图基于五行生克关系画出，五个元素之间都有着类似于“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的关系。

在人类社会发展系统中我们列出了这样几个循环相生的力量：自由、竞争、独霸、变革、平等。这五种力量主导着社会的脚步。

当然，除了这些元素，也还可以列出其它



团圆有余图（作者自绘）

元素，选什么作为研究对象不受任何限制，只要符合相生相克的循环关系就可以。这里只是举例。

这个五个元素是左右社会发展的五种力量，也可以叫五种需求。这个五种需求也许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但是各有不同。有人需要自由多一些，有人需要独霸多一些，有人需要平等多一些，有人需要变革多一些，有人需要竞争多一些，不一而足。每个人同时也可以具备两三个需求，并不影响我们宏观上对社会需求的划分。

我们阐述一下为什么这样分。

自由属木。根据五行学说，“木曰曲直”，凡是具有生长、升发、条达、舒畅等作用或性质的事物，均归属于木。因为自由有舒展、生长的特性，所以把自由定位木的属性。

竞争属火。“火曰炎上”。炎，是焚烧、炎热、光明之义；上，是上升。炎上，是指火具有炎热、上升、光明的特性。引申为凡具有温热、上升、光明等性质或作用的事物和现象，归属于火。竞争显然符合炎上、向上、进取的特征。

独霸属土。“土爰稼穡”，凡具有生化、承载、受纳作用的事物，均归属于土；独霸（专制和垄断）有聚集、承载、受纳的特征。

变革属金。“金曰从革”，有改变现状的特征，凡具有清洁、肃降、收敛等作用的事物则归属于金。变革属于金的特征。

平等属水。“水曰润下”，凡具有寒凉、滋润、向下运动的事物则归属于水。平等的需求是除了独霸之外的普遍需求，有润下的意思，因此可以把平等归于水的特性。

这五个元素相生关系为：

自由生竞争。自由的环境会产生竞争。原因：人人希望自由，在一个普遍联系的社会群体中，人人自由必然会影响到他人，因此自由会产生竞争。

竞争生独霸。竞争的环境会产生独霸。原因：竞争总有胜利者，胜利者必然击败其它竞争者，形成独霸胜利成果的局面。

独霸生变革。独霸的环境会产生变革。原因：独霸者必然引起矛盾，或者时间久了独霸者将不适应时代发展，必然发生变革或者流血的革命。

变革生平等。变革的环境会产生平等。原因：变革之后社会利益重新分配，形成平等局面，或者相对平等局面。如中国历代起义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均贫富、等贵贱”为主要起义口号。

平等生自由。平等的环境会产生自由。原因：人人平等，权力相同，表达不受限，可以形成人人自由的社会。

这五个元素相克关系为：

变革克自由。原因：变革（革命）是推翻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建立新秩序必定要限制一部分自由。

自由克独霸。原因：自由是人类的天性，人人都喜爱自由，但是自由的言行会影响独霸的话语权、决策权，因此自由是独霸的天然克星。

独霸克平等。原因：由于独霸主宰分配，天生喜欢是垄断一切，因此独霸天生克制平等。

平等克竞争。原因：相对弱势方更渴望利益均等。弱势方一般不愿竞争，比如老弱者避免和青壮年竞争，残疾人避免和正常人竞争。

竞争克变革。原因：在有序竞争的环境，汰弱存强，系统整体上性质是积极健康的，健康的局面就不需要变革。

上述图整体反映了人类社会这个超级系统发展的一般规律。

我们拿中国的封建社会作为辅助参照。

中国封建社会总是在不断上演朝代轮回的悲剧，劳动人民饱受压榨，困苦不堪。究其原因，是中国社会这个五行之中缺水、缺木，火弱，导致土、金横行，轮流戕害。缺水、缺木也就是缺少平等、自由。封建社会儒教立国，三纲五常，没有平等可言，自由更加无从谈起。火弱不是竞争少，而是不正当竞争多，导致变革力量集聚，不能通过有序竞争来疏导。避免流血革命，无非要强力配置水和木（平等、自由）的存在，通过遏制土（独霸），来消除金（革命）。五行图为我们探讨历史社会提供了一个思维方式。

五行在中医是为了治病。医生通过望闻问切，由表及里，便可以诊断出病人的病情，开出合理的药方。

我们设立各个复杂系统的五行运行规律，目的也就是为了了解系统内部的运行规律，摸清这个规律，就可以给系统“治病”。

五行理论自创立至今的三千多年里，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在实际应用中已经形成了十分完备的“诊疗”体系。

对于系统各个个体的“病理”和“治疗”，古人早就归纳总结了完整的“药方”。如下：

五行生克制化宜忌：

金：金旺得火，方成器皿。

金能生水，水多金沉；强金得水，方挫其锋。

金能克木，木多金缺；木弱逢金，必为砍折。

金赖土生，土多金埋；土能生金，金多土变。

……

我们继续用图二来说明。

例如，怎样才能使变革走向正确的道路？

我们参照“金旺得火，方成器皿”，意思是说，猛烈的变革中必须引入竞争机制，变革才不至于走入不可收拾、或者误入邪途。

那么变革什么时候不会产生或者停止呢？我们参照“金能生水，水多金沉”的意思是说，变革能够产生平等，当平等足够多的时候，变革就自然不会产生或者停止了。

其它的都可以如此类推。

实际上，只要画准五行图，也就是把对应关系搞准，诊疗就变得异常简单，完全可以按照现成的公式，开出一剂剂面貌不同的良方。所有的复杂系统领域都可以按照规律画出五行图，画出五行图后就可以对照研究和“治病”。这就是五行图的功用。

五行的历史定位

五行至今没有人知道来历，我们现在只知道周武王十三年(公元前1122年)箕子提到五行。三千多年过去了，五行怎么来的依然是谜。

虽然我们不知道开始，但是我们知道结局，结局无非有两条，一是彻底消亡弃用，二是长久保存和应用。

实现第一条彻底消亡弃用，前提是必须有一个理论能够超过五行的系统理论，可以成为包括中医在内的超级系统的理论基石。到那时，五行理论会消亡弃用。目前看，现代的超级系统、或者复杂系统的理论摸索了不到一百年，和中华三千年的积淀比起来微不足道，不论其实用性，自身条理化都很难。而在中国，五行理论系统的应用已经三千多年了，典籍案例数不胜数。

在没有找到更加先进的理论时候，我们应用祖先的积淀未尝不可，因为检验一个真理有

时需要数以千年时间。

实现第二条长久保留是可能的。长远来看，包括五行在内的中华文化衰落只是暂时现象，只是短期的阵痛，中华文化在现代科学迅速发展的过程中肯定要有所调整，一些属于不科学的、迷信的东西确实需要根除，但是我们不要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中华文化几千年来哲理不会随着科技时代的到来而消失。每当人类发展产生困惑和迷茫的时候，古人是与我们同在的，古人的部部经典，就像父母关照一个孩子的温暖絮语，给我们留下许多走好人生之路有益的教诲。当代的国人需要做的是继承中华文化，而不是全盘否定中华文化；需要做的是敬畏、思索、发展中华文化，不是无视中华文化。

诚然，古人在应用和解读五行理论中有许多迷信、错误的地方。有的把每朝每代都标上“金木水火土”的属性，有的应用五行来给人算命，有的装神弄鬼、骗人钱财。我们不能光看到负面的影响，貌似腐烂的水果，里面往往有上好优秀的种子——要看到五行理论的内核。

三千年之路不算久远，五行理论发展仍旧有广阔空间，通过我们努力，完全可以去伪存真、剔除附庸，保留和强化其系统理论的核心，把这个土生土长的理论体系加以发展，用以指导我们的社会管理、环境管理、人体健康。愿更多的人接过古人的接力棒，继续前行。

作为完整、缜密、科学的哲理体系，五行必将成为人类文化遗产中的一颗明珠，重放光芒、熠熠生辉。

张正海 男，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教务处于部。



一哥面

III 谢舒

纽约勿街1号赖神书馆旧址

纽约的外送中餐馆菜单上有一道汤面：YatGaw Mien，用粤语发音，听起来像“鸭高面”。这种汤面的做法非常简单，面上盖一层杂菜加鸡片或肉片，杂菜是胡萝卜片、白菜帮和雪豆，汤是白汤，只放盐。

我曾在纽约中餐馆打工，不喜这清汤寡水的面，但是点“鸭高面”的美国吃客却不少，可能因为这是最早从域外引进美国的中国汤面，被美国人认为是正宗中国汤面。

后来得知，YatGaw Mien 在广东话中叫“虾伊面”，或“伊面”。

2010年圣诞前夕，从《世界日报》的一个寻人启事上，得知还有另一个译法：一个面。

这个纽约中餐馆再普通不过的“一个面”，竟和孙中山先生有着关系。

寻人启事登在《世界日报》C3版面的纽约社区新闻一栏，占右下角一方版面，大标题是加黑粗体《超级寻人 找黄二嫂后代》，附小标题：孙中山当年来埠，吃面免费。

华文报纸在美国寻人，超级寻人，寻一个叫黄二嫂的女人。黄二嫂，这是旧时家庭主妇名字的叫法，我奶奶外婆那辈人多用。这个说

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新闻看似不会有惊人之处，仔细读下去忽然惊心动魄。

文章说这个黄二嫂，是民国革命的滋养人，恩人。1896年孙中山先生走避清廷抓捕，来到纽约住在唐人街，期间天天早晨到黄二嫂经营的面店吃面，吃饱了出去宣扬革命，矢志推翻清廷。店主黄二嫂不收孙中山的面钱。

小小一篇寻人启事承载着巨大的历史和巨大的人物。启事中提到：

……

有老华侨指出，黄二嫂曾在华埠宰也街（Doyer St.）9号开面馆，面馆的名字没有人知道。后来由鹤山公所的员工接手，开了一家“双英斋”面食店，曾经是华埠很有名的面食加工厂。后来“双英斋”搬走，有人说曾搬至披露街12号，最后搬至市政厅（City Hall）的瑞德街（Reade St.）。大约十年前“双英斋”结业关门。

……

当时孙中山被清廷通缉，凡是明哲保身的人都不敢和孙中山来往，但黄二嫂对孙中山竭诚招待，免费让他吃面，黄二嫂让孙中山多吃一点，他总是说“一碗已够，不能多吃”。黄二嫂后来于1909年11月加入纽约同盟会，是当时17名会员中唯一的女性，人称“黄蔡氏”。黄二嫂的面店1904年出让后60多年，至1970年左右该行仍沿用YatGaw Mien（一个面）的英文名称。

启事表示，黄二嫂当年滋养革命的年代离现在太久了，很多知情人士都已经相继去世，希望老华侨能够互相传递消息，查询是否有人仍与“双英斋”的业主有联系或知道他们的消息。并留下了联系方式。

这篇启事我看了很多遍，心潮难平，于是遐想这段与我完全陌生的旧事，并且上网搜索有关黄二嫂的一切。从12月23日这则消息来看，超级寻人的提出有些日子了。而根据网上



纽约宰也街，一扇半卷的小铁门上有一个9字，这个地方就是黄二嫂面店旧址。现在顶上有一个牌子写着：chemist（化学）。

的讯息，月初就由台湾“立委”周守训提出动议，立即得到与会全体人员热烈响应。讯息还提到一个细节，当时孙中山先生去黄二嫂面店吃面，黄二嫂总是给他的面条里加上馄饨，所以新闻报导用了这样的句子：免费在国父面中加馄饨。

这个鲜为人知的陈年往事，早被时光的烟尘淹没，可是读来却仍旧能闻到“一个面”加馄饨的鲜味，也能想见孙中山先生用筷子夹面条吃的样子。

翔实的历史资料记载，孙中山先后一共到过纽约四次。

1896年9月，他第一次到纽约，住在勿街1号的赖神书馆，这是一栋三角型的建筑，狭长的小楼空间有限，床位不够，孙中山只能打地铺席地而睡。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孙中山在纽约到处奔走，宣扬革命。披露街21号浸信会，是孙中山经常停留的地方，后来在勿街7号至9号的中餐馆“旅顺楼”成立了纽约兴中会。

孙中山第二次来纽约是1904年，他和两个留学生一道以美国《独立宣言》为蓝本，撰写了一篇向欧美各国阐述革命党斗争的起因、宗旨和外交政策的文章。当年10月，在纽约发表的英文版《中国问题之真解决》，正式向国际社会公开了革命党的政治纲领，痛批清朝政府260余年的罪恶，指出中国到了非革命没有出路的十字路口。在此次停留纽约期间，孙中山多次造访纽约洪门致公所，宣传革命并且募款。这个情景，在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中就有生动的演绎。我在纽约多年，去过很多次唐人街，却并不知道孙中山到过纽约，在唐人街募款。一百年来尤其近二十年，华人在唐人街为中国各种事务无私募捐的事情数不胜数，数目庞大，场面感人。

第三次也就是1909年11月，孙中山先生在纽约逗留了将近两个月，当年圣诞节，他在勿街49号的“溪记号”二楼成立了同盟会纽约分会，也就是今天的联成公所所在地。旅居纽约的华人对这个公所十分熟悉，遇到难以解决的困难和问题，无论大小都会求助于它，仿佛是海外的一个故乡。

孙中山第四次到纽约，则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前，那是他最后一次造访纽约。联成公所的黄玉振老先生，至今保留着当年公所事务记录的复印件。其中一份1911年3月29日的文件，上面记载：“是晚，孙文先生到公所开谈话会……必要扫除专制积弊，光复汉族，使我中国世界共和，人人得享自由幸福。”

半年后，辛亥革命爆发。

从1896年到1911年，中国正经历走向共和的时代。

黄二嫂开面店、出让面店、到加入同盟会，正身处这个变革动荡的大背景，那些年纽约的唐人街就是推翻清廷的海外革命基地，充满令人激动的气氛。虽然历史记录十分有限，但是线索和脉络十分清楚。黄二嫂的面店于1904年盘给了别人，新店主为其取名为“YatGaw Mien（一个面）”，这个店名用了60多年，1970年关张，其后被鹤山会所接手。“一个面”遂改名为“双英斋”面食加工厂，一做30年到2000年结业关张。

黄二嫂是在卖掉生意之后五年的1909年，加入纽约同盟会的。那是孙中山第三次到纽约。根据记载，黄二嫂是同盟会十七位成员中唯一的女性，可以说是共和革命的先驱。1909年，以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日来说，那是102年前的事情。要是从1896年孙中山先生在黄二嫂的面店吃馄饨面算起，就更长了，有115年。

115年，若照每二十二三年一代人算，差不多有五代人。黄二嫂的第五代或者第六代传人，有没有在世的？有，在哪里？没有，为什么没有？会不会后来离开纽约去了加州或者其他的州？或者整个家族离开了美国？回到中国大陆？迁去台湾？香港？一切都没有人知道，报上寻找也没有蛛丝马迹，好像整个家族烟消云散。

令人不得其解。

最令人不得其解的，还数黄二嫂，这个有情有义有肝有胆的女人。黄二嫂娘家姓蔡，嫁给黄姓的男人，所以这里说人家只叫她黄蔡氏，连做姑娘时的名字都没有留下来。这样一个女人，无法推测她的身世门第。想来她不是来留学的世家小姐，不然不会以开面店为生。在一百多年前的纽约唐人街开面店，那么是从什么地方、怎样到的纽约？随移民的父母从中国到的纽约？还是出生在纽约？

一个开面店的华裔女人，如此深明大义，不怕让清廷通缉的孙中山天天早上到自家店里吃面，吃面还不收钱，不收钱还要加馄饨，后来竟自己也加入了纽约同盟会，参加革命。黄二嫂是如何理解辛亥革命的呢？难道孙中山在她的面店吃面的时候，跟她细说过三民主义？在同盟会中她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担任什么职务？会不会由于参加了同盟会而献出了家庭？甚至失去了性命？

再有，面店是1904年卖掉的，在加入同盟会之前的五年里她做什么？以什么为生？会去读大学吗？研究政治科学？真是迷雾重重的一段历史，令人肃然起敬，令人无从抽丝剥茧。这样一个有着戏剧性生命情节的女人，最后却了无踪迹可循。唯一的线索应当是在“双英斋”。因为这个面食加工厂不过是十年前才关张，照

理至少能够打听到当年在双英斋做事的老人，即便退休了也总有丝丝缕缕的哪怕传说留在唐人街的大街小巷里。可竟然一无遗迹，不然《世界日报》不会发超级寻人启事。

由于后来报纸上也再没有跟进新的报导，我上网寻找相关消息，也是不果，想来没有寻到黄二嫂的后人，或许需要更长的时间？要坚持找，期望着总有一天黄二嫂的后人会被找到。

辛亥革命百年之后的寻找恩人，是吃水不忘挖井人，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一百年前的一碗面条，就算是滋养了革命，列黄二嫂为革命的恩人，令人感怀万端，肃然起敬。

我的感怀还来自母亲的一段经历，说的也是老百姓养育革命，我顺着黄二嫂的思路揣测，这样的老百姓有没有可能登上寻人启事？

1969年前后，江苏省级机关干部绝大部分下放劳动，分别去干校、苏北农村，母亲到的是镇江乡下的一个蚕种场。

有一天，女队的队长朝母亲喊道：邓洁！有人找你！

母亲诧异，这种时候怎会有人找？

队部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白头发的大娘，穿着简素，她身边站一个小伙子，腕上挎着篮子，盖着一块布。母亲走过去小心问：大娘，你是找我吗？

大娘答：我不知道是不是找的你，我找邓洁。

母亲说：我就是邓洁。

大娘问：你是不是那一年在我家躲过一些日子的邓洁？

大娘说的是1941年“皖南事变”那年。母亲当时是新四军军部医院的教导员，事变发生后女兵和伤病员以及家属最早撤退离开军部，在撤退途中因时有战事，很多人走散了。母亲头上包一块粗布扮作农妇，一路行走竟就走到

了镇江这一带的乡下，被一个农妇收留藏起来多时，直到安全了母亲才重新出发去找新四军。当她出现在军部驻地时，邓子恢他们都吃惊不已，以为母亲已经牺牲。

母亲激动地说：我就是那个邓洁啊，大娘你怎么晓得我在这里？

乡下的消息也快，干校的人事没有不透风的。如何一传十，十传百传到大娘那里，翔实的经过也已无从说起。总之大娘知道附近这个蚕种场有个女干部叫邓洁，不知道犯了什么错下来劳动改造。老人家坐不住了，跟家人说，要去蚕种场看看，这个邓洁是不是二十多年前在她家藏身过的那个年轻女兵，那一年我母亲27岁，而大娘也还正在好岁数上。

大娘带着儿子，挎着篮子，篮子里放着鸡蛋和馒头，步行十几里路到蚕种场。她为什么会在那样的时候去看母亲？为什么不听劝阻非要去不可？全国的动乱难道她一无所知？镇江不是天高地远的荒僻之地，城里被整肃的人的命运她们都会知道。

母亲和这位老人久别重逢时都说了些什么，不记得母亲是怎么对我描述的了，只是提到大娘指着小伙子告诉母亲，这是我的儿子。

母亲推托着老人家送去的鸡蛋和馒头，说我不能收，收了也吃不到。老人家说：你不要怕，我家是贫农，我送的东西她们不能没收。

分别时母亲叮嘱老人家日后不要去看她，会连累她的。

后来大娘又带着儿子去看望过母亲一次，仍旧送去鸡蛋和馒头。

母亲离开干校回到南京，复又与父亲赴中央党校赴新任，再也没有见到这位大娘。多少年中凡提到“文革”，都会对我讲起这位老人家，对自己两次被大娘照顾，言语中充满感动感慨。

滴水之恩，没有相报，滴水再滴，滴水成川。

收留一个走散了的新四军女兵，恩重如山。

带着鸡蛋和馒头探望这个再次深陷危难的女人，恩重如山。

我奢望借这篇短文，替过世的母亲寻找镇江乡下的这位老人，告诉她几十年来母亲对她记忆犹新，念念不忘。这个想念，传给我，不敢忘。我知道再也找不到她了，正如黄二嫂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献身之后就隐匿在茫茫人海和历史烟霭中。

然而，黄二嫂这个名字经由《世界日报》的超级寻人启事在世上流传，并被奉为革命的滋养人。“黄二嫂”这个名字，普通，伟大。

《超级寻人》的消息读完让我感叹不已，思绪绵绵。先生听了我的叙述，说：“一个面”应该叫“一哥面”。

孙中山先生是“中华民国”第一哥。

在这个第一哥身后身边，有无数海内海外的黄二嫂竭尽绵薄之力。

1941年不顾自家安危掩护新四军女兵的农妇，1969年拎着鸡蛋和馒头带着儿子去干校看望母亲的老大娘，是我们的“黄二嫂”，于共和国是恩人，于我家是恩人。这样的“黄二嫂”在中国大陆千千万万无以计数，她们是地，是天，是山，是海。

谢舒女，现定居美国，翻译并发表《女性与美》、《全美中学生获奖作品选》、《陪读太太》、《华尔街石漂》、《海外寻奇》等。

你一定要读香港

III 刘鲁会



除了自己生活工作的城市，香港是去过较多的地方。听过梁振英讲“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深刻含义，曾宪梓谈返乡济宁的寻根祭祖，蒋震回想当年从当兵到创办震雄机器，臧健和说起湾仔码头水饺的艰辛经历。香港是什么？有说她是现代化大都市，繁花似锦，高楼林立；有说她是世界经济中心，金融贸易，日流万金；也有说她是文化沙漠，商业至上，人情冷漠；还有人说她是殖民土地，西方影响，无处不在。香港回归十几年了，面对前些日子发生的两地“口水仗”和港人的国民教育风波，有人百思不解地说着那句老话：香港真是一本读不懂的书啊！

读读这部老书

先穿越一下历史时空。香港是古代越族聚集地，战国时期属于楚国。秦始皇派兵南下五岭，正式划入中国版图，属南海番禺。东汉时，港岛还很荒芜，几千渔民分散在几个小渔村，靠打鱼为生。香港现在的赤柱、黄泥涌等地名，就从那时有了历史记载。不过，那时世界各自封闭，香港尽管地处南海要地，但还没与什么西方国家发生联系，更没有什么世界意义。到大唐帝国，这里已是一处繁盛港口，有官府驻军，属东莞宝安。经济的繁荣，带来了中原人口的大量南迁。宋朝的时候，中原文化就随之安家

落户深入人心，儒释道皆存。到现在，香港的香火还很旺盛，逢年过节或心里有事，都愿到黄大仙庙里或妈祖面前烧上一香，祈求祖宗保佑一切平安。学校里上课，还都教孩子们读“四书五经”遵守儒家传统。两个人遇到纠纷，相互起誓，还有走到庙里“烧黄纸、斩鸡头”的古老传统。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给东方王朝一片震惊。西方帝国打上门来，迫使东方王朝分三次或割让或租借了今天的港岛、九龙界限街以南和以北的新界，真让人体会到“弱国没有外交”、“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也看到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闭关自守没有出路。从那以后，风水轮流转，世界变化越来越快，相互联系也越来越多，你昨天地处边疆，今天就可能变成中心。香港就是这样应运而生，顺势而起。

香港是一块风水宝地。一是天然良港，港口水深，可泊大船。二是地理位置显赫，紧靠广州，进而岭南，辐射中原。三是军事战略关口，南向南海，北扼珠江，一夫当关，万众莫开。香港现在能够成为世界金融、贸易航运和旅游购物中心，确实与它的经济地理位置紧密相关，用老百姓话说，这里干什么都很方便。比如，经济全球化使整个世界成为地球村，金融流、经济流、信息流一刻不停地运转，你的夜晚休息就是别人的白天工作，世界金融按24小时的时空，分为时差各8小时左右的三个时区，每个时区自然形成一个中心，保证金融货币流动不息运转不停，于是有了今天的纽约、伦敦和香港。我们不是“地理决定论”者，香港能有今天，离不开亚洲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崛起，离不开香港优越的商业服务环境。但也要看到，英国人当初看中香港不是巧合，地缘确是一个优势。



香港旧影



香港新貌

旧书还有新版

进入二十世纪，香港这部老书又出新版。众所周知，英国人占了香港以后，日本人打进了中国。香港作为英国地盘，尽管一时沦陷，还是成为内地人士抗日和避难的“孤岛”。直到五十年代，香港一面迎来八方来风，一面又云集文豪墨客，文化精英济济一堂，文学艺术风云激荡。香港成了文化重镇。

有这么一幕场景。当年号称香港师爷的《大公报》、《新晚报》总编罗孚，先是发现培养了梁羽生，写出了第一部连载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一发而不可收。后在梁羽生临时停笔之时，找来金庸捉刀代笔，竟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一下出了两个大家。当时金庸正着迷剧本甚至芭蕾舞，压根就没想到《书剑恩仇录》等篇篇著作能够横空出世。据统计，梁羽生写了30多部，金庸写了15部，估计在港澳台和内地印书7亿本，他们在华人世界影响之大，不可低估。

我们不是文学家，不在这里评论梁金两人，谁优谁劣，谁长谁短，香港其他文化现象也一概不提。仅仅是说，只几个人几张报纸，就能勾画一幅鸿篇巨制，开一时风气之先，领一代几代潮流，难道还反映不出香港文化的根深叶茂，反映不出文化的潮流演进？这一点上，舍香港还有其谁。

现在香港文风很盛。不要多说，仅去书店里随便转转，学校里随便走走，再看看香港高校的世界或亚洲排行榜，就会感到香港文化中西融合、底蕴深厚。如果再说香港只有商业没有文化，就有点门缝里看人，误读了香港这部老书。

实际上，说香港有商业没文化、有现代化没有传统，是“沙漠论”者强加给香港的一顶帽子。好像出书看印数，报纸看广告，电影看票房，一切追逐流行，温情脉脉的商业外衣背后，散发的都是追金逐利的铜臭。其实不然，这是一个只知其表不知其里的假命题。一是商业成功的根本是文化。“君子言利，取之有道”。信义既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市场交易的原则。商业越发达，传统文化就越根深蒂固。诚信是商业发达的基础，真善美的沃土，是假恶丑的天敌。这就是你在香港，为什么能享受到无微不至的服务，却很少碰上内地常见的假冒伪劣的原因。二是经济发展促进文化繁荣。人的物质生活的提高，必然带来精神文明的提高。强大的经济实力必然转化为强大的文化力量，来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的文化需求。在香港，大学

中学最好的大楼和最好的文化设施，往往是香港老板的慷慨给力或政府兴建。三是文化助推经济。文化日益成为新兴产业，亦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发动机，香港也不例外。

文化是软实力，这不是钱的事。怪不得罗孚先生在八九十年代到京小住，就大声疾呼：你一定要读董桥！罗孚是董桥的伯乐，董桥的《中年是下午茶》等一系列文章佳作从香港传入内地，一时间脍炙人口，在思想文化界的湖面荡起了层层涟漪。你听听董桥怎么说，“大陆前面几十年政治运动毁了很多东西，把那一代人也毁了一半，现在是时候赶快去恶补，因为那些东西你不能断掉。”老师罗孚把学生董桥搬出来，其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想告诉“文化沙漠论”者，与内地相比，香港大有文化，亦没有丢掉传统，是值得一读的老书新版。

品一壶粤式早茶

在香港，特传统的和特西方的东西到处可见。粤语和英语都很通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香港属岭南，有喝早茶的习惯。说来也是，南国天热，早上起来，喝壶早茶，消凉去火，提提精神，好再去打拼，与西方喜欢喝咖啡大同小异。

早茶是香港文化的缩影。香港人吃早茶，早上八九点钟起来，收拾干净，家人朋友，三三两两来到酒楼，先点上一壶普洱或铁观音热乎乎的喝着，再点上几样粤菜小吃慢慢吃着，手拿当天报纸，耳听电视新闻，关心着天下大事，议论着身边小事，商量着买卖生意，把休息当成工作，寓工作于休息之中，多么悠闲自足。如果没有要紧事，一壶早茶，就这么喝着，茶味越喝越淡，人情越来越浓。从早上到午间，



香港兰桂坊

熙熙攘攘的酒楼上，你既可以感受香港浓浓的市井文化，也可从中领略香港人的一种精神气质。对此，作家刘心武说，在香港，我只看到了文化，没看见沙漠。

香港有早茶也有酒吧。到了晚上，华灯初上，灯红酒绿，西式的酒吧就派上了用场。外国人有他们喜欢去的地方如湾仔的骆克道、九龙尖沙咀，中国人有自己中意的兰桂坊。其实，咖啡酒吧来到中国，也已入乡随俗。喝咖啡还要喝啤酒红酒白酒，还要有好吃的中餐烧烤，结果，西方的氛围淡了，中国的人情浓了。所以，文化都是土生土长，不管东西南北什么文化，到了一地，早晚要与当地文化融合。其中，外来文化不过是一种营养成分，骨子里还是我们的灵魂血肉。

就说兰桂坊吧。一天晚上，香港的山东老乡请我们去兰桂坊小酌。席间，说起了兰桂坊的创始人。这是一个德国犹太人的后代，自幼丧父，跟妈妈到加拿大打拼，十几岁来到香港做服装生意发展起来，结果爱上了这个地方，就一来不复返了。八十年代，为了接待到香港做生意的加拿大朋友，他们抱怨在香港找个酒吧真不方便，非要去大酒店不可，就瞅准机会在兰桂坊开了一家酒吧接待朋友，结果生意兴隆，一口气在这条街上连开了十几家，随后引

来酒吧越开越多，形成今天这个规模。每当夜幕降临，人们纷纷聚到这里开怀畅饮，其乐融融。这里成了香港融汇中西文化的乐园，也谱写了一段美丽的都市神话。

1997年香港回归，开始实行“一国两制”，有人惶惶不安。许多外国记者找兰桂坊的这个老板采访，希望他谈谈香港是否完了，你人跑还是不跑。结果事与愿违，碰了一鼻子灰。这个加拿大人说，我在香港已经37年，喜欢香港，这里就是我的家，香港就是回归也会成功。结果他看得很准，香港回归十多年了，比以前发展得更好。现在又有人问他眼光独具的奥秘，他说很简单，因为我了解大陆，中国实行“一国两制”，说话算数。你看现在香港背靠大陆，面向世界，大陆“自由行”像打开了水龙头，让内地财富源源不断流入香港。比如兰桂坊的消费群，回归前是外国人多，现在是内地人多，真是新旧两重天。如今他干脆加入港籍，又依托香港反过来大举进军内地，在成都等地开办兰桂坊，也大获成功。他说，文化问题，了解比什么都重要，文化差异可以逐渐融合。成都人喜欢喝茶，吃火锅，打麻将，那就得适应这里的文化习惯和生活方式，然后再加进一点西方的东西，慢慢消化结合，这就是我的成功之道。

听朋友这么一说，不禁在想，这是在说兰桂坊的成功之道吗，这不正是香港政治乃至文化百年变迁的剪影？

尝尝香港这杯咖啡

在香港，两个人打交道，喜欢开一句玩笑：小心被廉署叫去“喝咖啡”，就是被廉政公署叫去说清楚，足见廉政意识深入人心。我多次去著名的廉政公署听课参观，知道它的一些来世



香港特区政府廉政公署大楼

今生。

想想过去，香港被连续评为世界上最廉洁的地方之一，是多么的来之不易。五十年代，香港就有了反贪的法律，可法律是一回事，实现法治是另一回事。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是腐败的重灾区，尤其是警察队伍，腐败像吃饭睡觉一样自然。腐败蔓延，像黑洞一样吞噬着人们的公平正义信念。1971年开始，香港试图建立反贪机构，遭到了警察和黑恶势力的抵制。1973年，港督宣布另起炉灶，建立新的独立反贪机构——廉政公署，并对总警司葛柏开刀，坚决查处他的巨额贪污，把溜到英国的葛柏押回香港审判，打赢了首场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以后几年，有几百名警员被廉政公署叫去“喝咖啡”。从此，廉署既打老虎，也打苍蝇，荡涤一切污泥浊水，一举成为天下英雄。

香港是世界著名的自由港，法治是自由的铁布衫。最好的自由必须与最好的法治相辅相

成，缺一不可。香港廉署做到了这一点。2012年，廉署高调出场，充分显示它至高无上的威力，在宣布对新鸿基地产集团进行调查的同时，历史上第一次宣布对特首曾荫权立案。事情发生后，特首难过之极，几度潸然泪下，表示没有违法之事。但法律不相信眼泪，廉署之所以30年治好积重难返的腐败痼疾，就是认法不认人，靠严格有效的制度而非人情。廉署还以此昭告世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香港没有绝对的权力。廉署相信，几十年建设起来的廉政体制铁律严密，廉政宣传深入人心，所作所为不是美丽幻影，廉署是为洁净的香港打扫卫生，以切实维护香港的美好形象，树立公平正义的崇高权威，这是全体港人的精神寄托。

廉政是香港社会历久常新的核心价值，港人对公务人员的廉政表现为“零容忍”，体现了香港文化的黄金成色，对我们也有启发。不仅如此，香港文化也值得我们学习。早茶也好，咖啡也罢，香港能喝，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尝尝呢？

人生难得是精神

在香港，每天看到路人，都是一路小跑，那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我经常看到，在香港的自动扶梯上，大家都是自动站在右侧，把左侧让给急着赶路的人。在香港的街头避雨，总有身后店铺里伸出的援手，给你递上一把雨伞，说声“请用，可不必还了”。在香港商店购物，经常有人端上茶水，说句“请喝口茶水，可以不买东西”。在香港中环湾仔铜锣湾，在地铁出来赶路的，很多都是老板，很少有开私家车上班。这种勤奋、节俭和温馨，体现着一种纯粹的职业精神，有人称之为香港成就的基石。

香港山多，其中有座“狮子山”，坐落九龙，山高五百米，山下几万人，见证了香港由一个小渔村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艰辛历程。1973年，香港电视台开始播放一部电视剧《狮子山下》，至1994年，前后跨度21年，讲述的是香港底层市民逆境自强的励志故事。电视剧起始国共打仗，主人公从广东潮阳顺海岸线一路走到深圳走到九龙，与庞大的难民潮一起在这里砍树搭屋安下身来，从一个潮阳人变成一个香港人，狮子山下也逐渐变成一个庞大的贫民区。后来，贫民区随香港经济起飞不断改造为高层公屋，狮子山下的九万多人也同时成为周围几千家工厂的工人，他们加班加点拼命工作，在改变自己生活的同时，撑起了香港经济的昨日今天。

香港难得是精神。进入新世纪，香港工厂大部分迁入内地，成功转型升级，实现华丽转身，一跃成为世界经济金融中心，靠的就是香港人这股子浑身透着的“不死就要拼”、“爱拼才会赢”的绝地求生精神。无论回首七十年代的经济起飞，还是九十年代的经济危机，非典时期的经济萧条，还是近几年的金融危机，每每遇到困难，香港人就喜欢集体高唱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让“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追，同舟人誓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天涯海角，携手踏平崎岖”的歌声激发出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

香港还有“做好这份工”的精神。有个老港人讲了个真实故事，美国纽约一位63岁的老人，要走路去几千里外的迈阿密，最后达到了目的地。有人问这位老人为什么能够做到，老人讲，很简单，我就是一天只关注一步，走完一步，走第二步、第三步，就这样走完全程。老港人说，这个故事激励我，自己几十年做工，每一天都是那个第一步。就连香港特首竞选，也要打出这样的口号：“我要做好呢份工”，才

能赢得人心。做工精神词浅意深，里面包含好几层意思，一是全力去做，二是做到最好，三是做事即做人，也都是儒家的东西。香港人喜欢这样告诉孩子，“努力加上一点运气，不会不成功，就像李嘉诚。做不了大老板，退一步，至少做一个出色的马仔”。

香港经历辉煌之后，也面临经济社会的转型和价值观的转变。港人面对陈冠希裸照、青少年吸毒等事件担忧：下一代再不努力，香港精神就会慢慢丢失，狮子山就永远不会看到。这担心不是小题大做，不只香港，内地也有。可我深信，香港精神是香港的灵魂，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大地土壤，置身于中华文化的血液命脉，她像世界文明王冠上的东方明珠，永远照亮人间之路，又像钢筋铁骨，奋力支撑香港儿女踏平崎岖勇往直前。有此等精神，说香港明天更加美好，就绝不是一句空话。

到此，老书读了，早茶吃了，咖啡喝了，精神也领会了，你说，香港还是一本读不懂的书吗？

刘鲁会 男，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山东中华文化学院）副院长。

拜访周勋初先生

——关于《雅集》之六

III 周和平

3月30日下午，和南京大学党委统战部部长王云骏教授等人，应约前去拜访周勋初先生。

周先生是南京大学教授，长期担任江苏省文史馆馆长。

作为我国古代文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周先生以其“专通结合，又专又通”（卞孝萱先生语）享誉学界。他的学术成果之多，质量之高，让人为之惊叹。

刚一落座，周先生便讲开了。在两个多小时里，他论人叙事，娓娓而道，妙语迭出，表现出一位文史大家的眼光和气度。

难忘师友

当年，他在南京大学读书时的老师，都是些卓然大家，其中有胡小石、陈中凡、汪辟疆、罗根泽、方光焘、张世禄等著名学者。周先生对他们始终怀有深深的敬意。

他说，胡小石先生“清高孤傲”，同国民党没有什么关系。他字写得好，但同于右任也不来往，因为他认为于是官僚。解放前夕，国民

党要把中央大学搬到台湾去，胡先生和梁希、潘菽是护校委员会的三个负责人。后来，国民党要抓梁希、潘菽，他们跑掉了，就剩下胡先生，他护校是立了大功的。胡先生学问好，文学、艺术什么都懂，后来要写他，别人不太清楚，很难动笔，周先生就写了。还有罗（根泽）先生，是个老实人，对他也很好，也没有人能写，后来也是周先生写了。“他子女对我感谢得不得了”，周先生为此很是高兴。

我说看过周先生写胡小石先生的文章，真是大家手笔，把一个学者一个书家一个宽厚长者写活了。

在谈起一段段历史、一个个人物时，周先生会把我们引入那个时代，引入到某种情境里面去。他的语气中，也便会多了感情，其中有钦敬、有惋惜、有品评，有时候讲到他们的遭遇时，便会带着悲天悯人的激愤，这与我平时所见的性格沉静的周先生有许多不同，这也许才是真正的他。

作为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老人，周先生有着太多的感慨。他提到不肯去台湾的陈寅恪，



本文作者（右一）与周勋初教授夫妇合影。（潘庆磊 摄）

却被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封建余孽”。谈起他熟悉的上海的王元化先生和夫人张可，说王先生学问好、人耿直，五十年代被打成“胡风分子”，改革开放以后又启用了，当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他夫人英语好得可以翻译莎士比亚，可惜因为丈夫老是被整，高压下的她在“文革”中中风了。他屡屡提到在“左”的思潮下许多师友同事的不幸遭遇……，也因此，他说不想多回忆，怕触及这些隐痛。

书生本色

周先生会客厅的书柜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他的著作，可谓洋洋大观。他的学术研究时限上起先秦，下迄近代，涵盖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典文献学和中国古代思想史诸多领域。2000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7卷本的《周勋初文集》，其中收录了他的16种著作，但这仅仅是他的学术成果的一部分。他的大部分成果，都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取得的，当然也有例外。

他从书柜里拿出一册《韩非子校注》说，这本书产生于“文革”“批林批孔”运动的“评法批儒”阶段。当时南京大学负责《韩非子》注释。正在上海参加《辞海》编写的周先生也被叫回来参加由工人、学生、教师组成的“三结合”编写组，要他做顾问。这个顾问，其实就是做最实际的工作，具体任务就是负责全书的文字统一和校勘审定工作。他和参与其事的教师是以严谨的学术态度来做这项工作的，除了完成了本职工作外，他个人还完成了《韩非子札记》一书。时过境迁，当时出版的所谓“评法批儒”著作大都作废了。只有这部《韩非子校注》留了下来，而且还很有影响。2009年，经过他修订后的《韩非子校注》再版，并获得了江苏省新闻出版政府奖。为此，他在修订版的后记中以《疯狂的年代，理性的思考》为题，写了一篇长文，记录“文革”时期编书的难忘经历。

这件事情可以见到周先生的学者本色，我后来仔细读过这篇长文，还从中读出了作者心中的凄凉。他不惮其烦地写下这一段史实，同时也是在还原历史的真相。

成才之道

周先生从韩非子谈起了先秦诸子，也谈起了治学和人才培养，谈了“钱学森之问”，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个问题，周先生很有心得，并进行过专题研究，他曾经开过“近代学者方法研究”的课程，还在一些文章中从学习方法、考试制度和文学流变等方面作了探讨，认为学问之道，贵在根底深厚，博学多能，才能纵横驰骋，触类多通。



《韩非子校注》后期编写人员合影，后排左一为周勋初先生。

今天谈起这个问题，周先生仍然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钱学森讲的是事实。原因何在？主要是在于要开放，闭关自守必定要衰败的。没比较没竞争没交流，必定失败。为什么出先秦诸子，像韩非子这样聪明的人，主要是先秦时期搞起了百家争鸣。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进来了，像释加牟尼有非常强的思辨能力，对我们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再如北洋时期，胡适、陈寅恪、傅斯年这些人，他们家里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从小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去了欧美留学，回来后又能自由发展，后来都成为杰出人士。他说，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这条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又可以睁开眼睛看看外面是什么样子，能够取长补短。要真正培养出人才，还要让人家独立思考，这样才能发展出各种不同学派，才能出人才。

这次拜访周先生，最为直接的是为《雅集》

的事，是想听听他的意见，并约稿。

周先生接过刊物，称赞装帧设计很好。他随手一翻，是一篇介绍钱穆的文章，他便随口说起了钱穆、钱钟书、钱伟长……

他还邀请我们看了他的书房。书房简朴素雅，整洁有序，书桌上放着他的书稿，还有一份当天的《参考消息》。他说手头还有三部书稿，完成了就可以歇歇了。

周先生身材高大、气宇轩昂，讲话中气十足，完全看不出已是84岁的老人。他的太太祁老师，自始至终陪坐在旁，给我们倒茶续水，让我们感到温暖。

与周先生谈话，不觉时长，不觉身累，这就是智者的力量吧。

周和平 男，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江苏中华文化学院）党组书记、本刊总编。